

仙居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仙居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624

中史

《仙居文史资料》第六辑

审 稿：金烈芳（政协常委、群文馆员、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沈在秀（政协委员、副编审、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任婉萍（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委员）

黄冬初（政协委员、编辑、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委员）

陈汝源（文史员）

编 辑：吴 巍

校 对：金烈芳 吴 巍

仙居文史资料

第六辑

(人物专辑)

一九九三年四月

文
史
全
地
展

洪显周

中共仙居县委书记洪显周题字

实施“人才强县”战略。

加速发展仙居经济。

应一民

仙居县人民政府
县长应一民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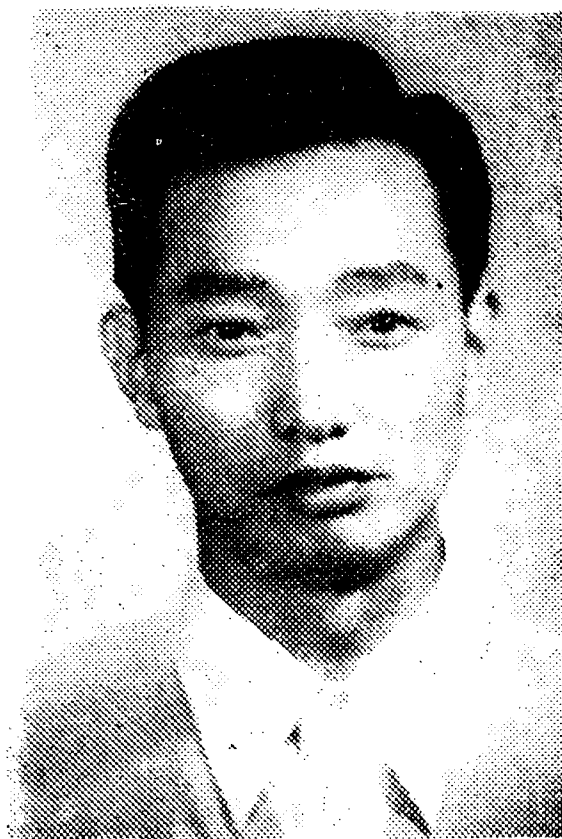
机电部电子工程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叶公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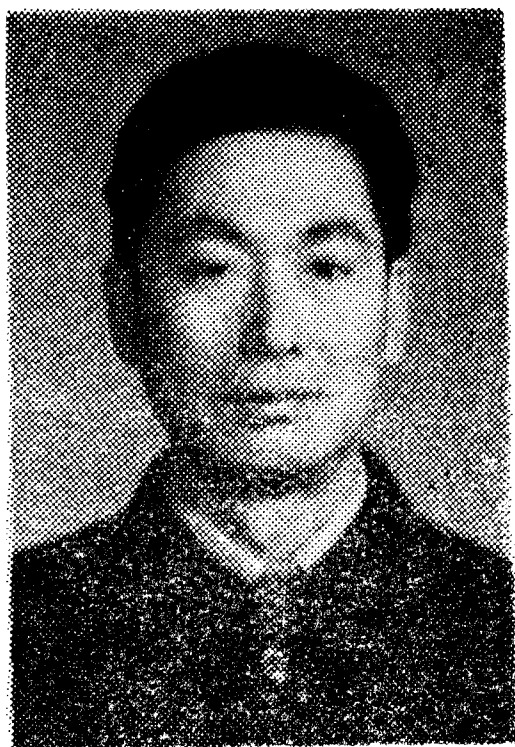
国防科委第10研究院
第14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张梅娥



南京有线电厂
高级工程师 华文长



浙江省电力局
高级工程师 徐柳生



水电部第十二工程局
高级工程师 应景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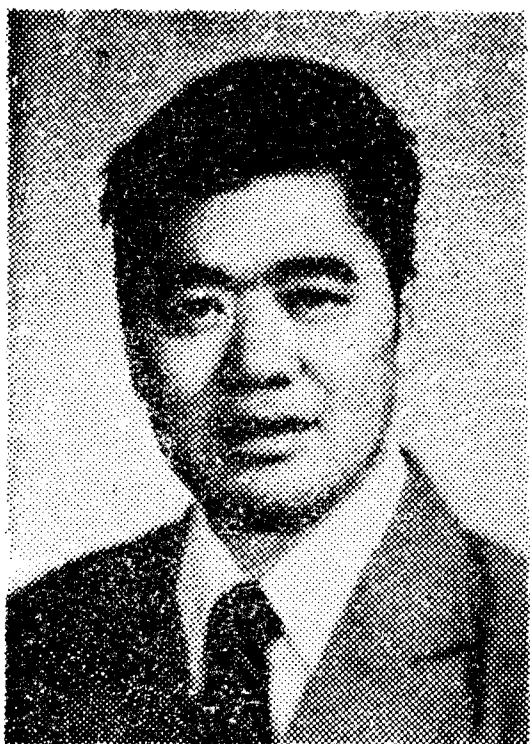
化工部第八设计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子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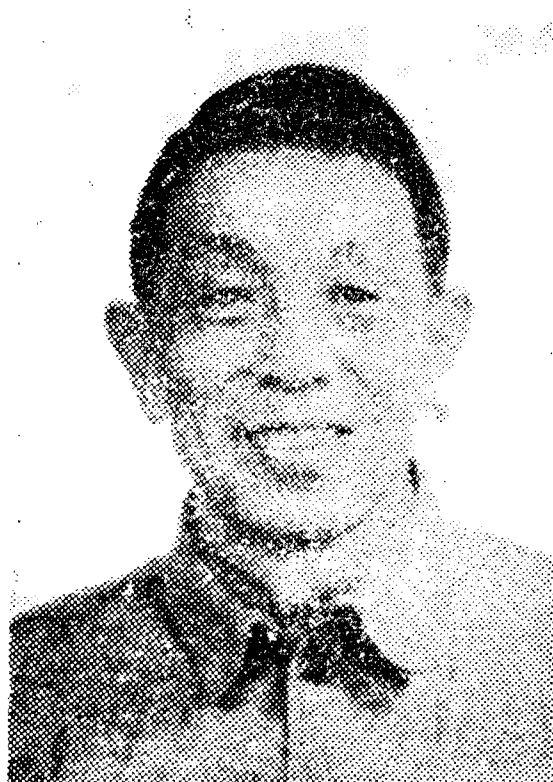
宁波水表厂
高级工程师 叶显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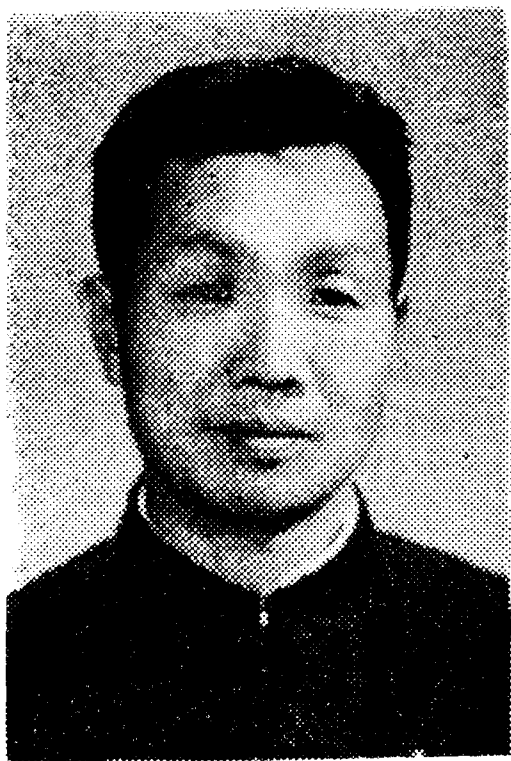
高级工程师 王焕德



新疆电力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朱向明



广西电力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沈在俭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
高级工程师 陈淳福



通化铁路分局
张光央



浙江省建筑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王东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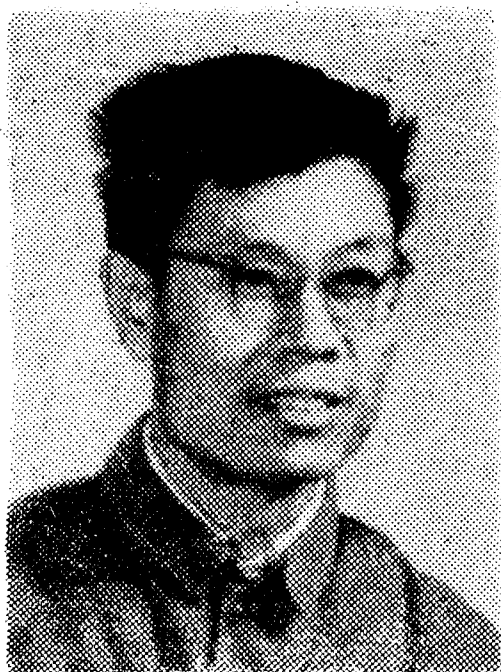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李汝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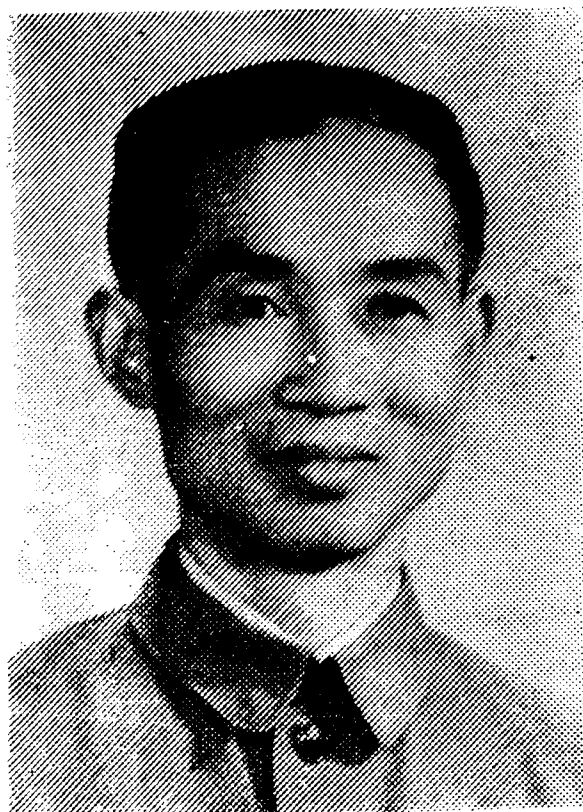
成都科技大学
教授 张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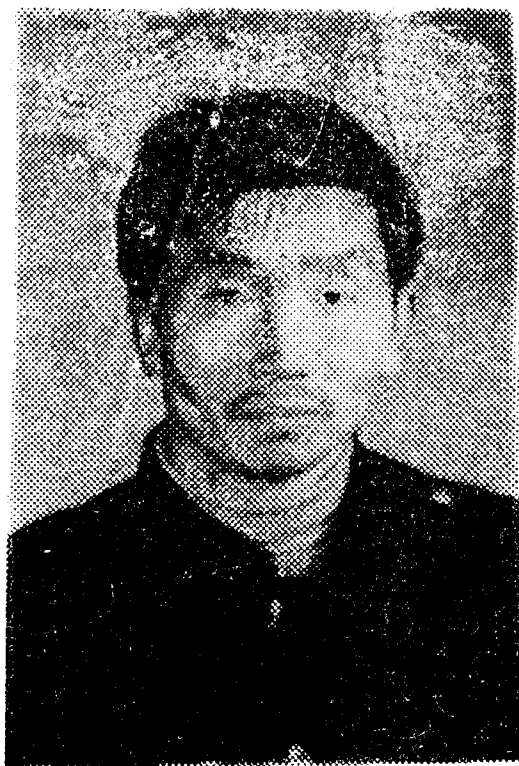
绍兴市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郑纪明



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陈赫西



浙江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高级工程师 徐顺宝



江西省万年县林业局
高级工程师 王均淦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 吴金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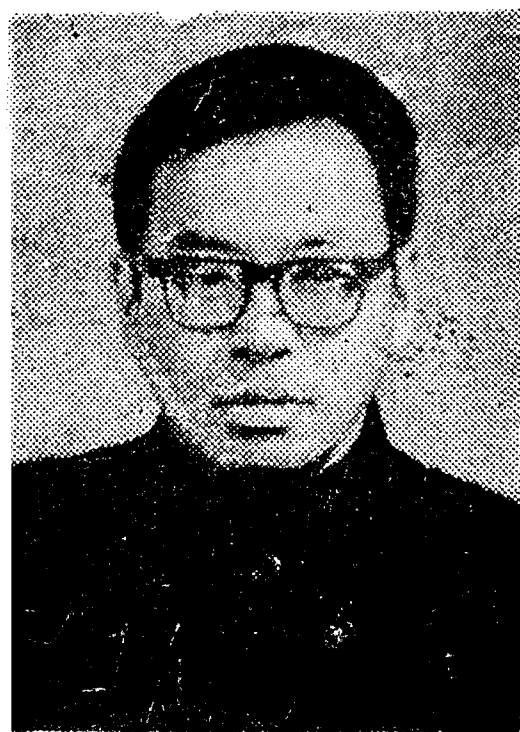
华东冶金学院
副教授 杨声



浙江大学
副教授 项保华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副教授 李石民



上海医科大学
教授 张光健



唐山华北煤炭医学院
附属医院
副教授 王相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应云和



东海舰队第 4 1 3 医院
副主任医师 徐顺土



高级工艺美术师
崔沧日

编 者 的 话

素有“仙子宅第”美称的仙居，山川秀丽，地灵人杰。勤劳朴实的乡风，熏陶着奋发向上、为国为民的历代子孙。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新人辈出，奋斗者的足迹遍及神州四面八方，辛勤的汗水洒落在祖国建设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有的在高科技领域独领风骚，有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呕心沥血。“仙居人”的风采和才华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为故乡赢得了自豪。

为了使文史资料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萌生了拓宽文史题材、编辑人物专辑的新思路。四年来，发出征稿信数百封，进行了两次“万里行”的实地采访，在各方的支持协助下，终于使“人物专辑”陆续与读者见面。

编入第六辑的45篇，近10万字，连同四、五两辑，共达112篇，31万字。绝大部份是仙居籍在外地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学者，也有少部份是外地籍在仙居工作的知名人士（第四辑）。由于多种原因，尚有部份约稿没能入编。各辑的编排及目录，大致按成稿时间先后并分类排列，没有主次之分。

我们希望通过编辑人物专辑，能在促进经济建设，以及回顾历史，教育后人等方面起一些作用。

最后，谨向支持此项工作的领导、同志们和撰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编者的话

漫漫人生路 悠悠赤子情……………王天真 (1)

青春易逝 壮志永存……………叶公荫 (5)

与电波打交道……………张锦基 (12)

从事军工研究的女专家张梅娥……………吴 巍整理 (16)

从战士到高级工程师

——记南京有线电厂高级工程师华文长

……………吴 巍整理 (19)

献身于光明和温暖的事业……………徐柳生 (21)

我的历程……………应景良 (24)

电气专家张子南……………吴…巍整理 (30)

高科技应造福于人民

——记杭大光电机械研究所副教授应成仁

……………应建红 (32)

我的简述……………叶显苍 (36)

三十年如一日

——记高级工程师王焕德……………王仁臣 (38)

新中国培养了我……………朱向明 (41)

我的测量生涯……………沈在俭 (45)

踏遍千山万水……………陈淳福 (47)

誓为四化建设贡献毕生……………张崇法 (53)

在铁道线上奔忙……………张光央 (58)

历经坎坷路 拳拳报国心

- 记省建材设计院主任王东章……胡铁云（60）
甘当绿叶扶红花……李汝火（65）
皮革专家张扬……吴 巍整理（69）
为石油工业建设奋斗终生……郑纪明（74）
心，永远憧憬着明天

- 尹相泉和他的追求……管 乐 张良铎（78）
化工行业高级工程师陈燕西……吴 巍整理（88）
春蚕到死丝方尽

- 悼念亡夫陈封亮副教授……应桂华（90）
生物学家王焕校……吴 巍整理（95）
生长在山区 服务于农业……徐顺宝（97）
崎岖奋进的路……王均淦（100）
人权理论新秀——董云虎……应建红（102）
平凡人的路……陈乾翔（109）
孜孜游子念乡情……吴金荣（113）
往事回忆……王纪中（122）

奋斗的足迹

- 记台州行署副专员李相缪……吴 巍整理（127）
从事冶金建设管理工作的回顾……杨 声（132）
项保华副教授简介……浙大教师科供稿（138）
吴森林副教授简记……应建红（140）
自学成才的副研究员李福民……应建红（142）
柳暗花明又一村……李石民（147）

红色学者

- 记杭州市委党校方荣湘副教授……应建红（153）
骨科教授张光健简介……吴 巍整理（157）

潜心探究 妙手回春

——记宁波三医副院长、主任医师王文敏

.....	吴 巍	(158)
几度辛酸几度甜.....	王茶仙	(161)
人生“之”字路.....	王相水	(164)
把毕生献给边疆卫生事业.....	应云和	(167)
扎根海岛 潜心医道.....	徐顺土	(170)
艰难求学 献身广播电视.....	朱寿亮	(173)
做大自然之子.....	崔沧日	(176)

漫漫人生路

悠悠赤子情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王 天 真

1939年11月我出生于仙居县城内当铺巷，小学中学都就读于仙居。1959年，作为仙居中学，也是仙居自己办的高中的第一届毕业生，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我们这届毕业生的高考成绩较好，与台州地区一些老牌学校毕业生相比毫不逊色，总算为仙居人争了一份光！

仙居这生我养我的地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朴实。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阻隔了仙居和外地的交往，使这块并不贫瘠的土地，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我早就有一个朴实的心愿，憧憬着家乡能有高楼大厦和宽阔的林荫大道。自幼我就比较爱好美术，总想长大了能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正是怀着这一美好的愿望，报考大学时，我选择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作为我的第一志愿。

来到同济——我向往的校园，这儿有良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有众多具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遨游，抱负和求知的欲望占据着我的整个心灵。五年的大学生活，就在教室、图书馆、宿舍的轮迴中匆匆而过。流下的辛勤汗水，使我在求知的领域中获得了丰收，担任班干部，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我怀着丰收的喜悦和一颗红心，等待着祖国的挑选。

1964年，正是我国核工业起步之时，急需大批的人

力和物力来充实这一新兴的事业。国家核武器研究设计院派专人来同济大学挑选部分骨干教师和应届毕业生，我有幸被选中。当时系主任只讲我被分到位于边远地区的绝密单位，要我一定服从分配。我觉得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祖国的挑选，二话没说就上了西行的火车。后来又转战三线，为军用核工业奋战了18年。1984年，核工业部给我颁发了为核武器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和一枚金质奖章。在1985年又给我颁发了长期从事核工业建设的荣誉证书。

随着核工业军转民步伐的迈开，核电站的建设很快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国家从核工业系统的各军用部门抽调了一批技术骨干支援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我和我爱人都入选。1982年我们全家从四川调入上海，从此开始了我的新事业——直接为民谋福利的核电事业，做一名光荣的核电战士。

到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后，我负责的是浙江海盐秦山核电站的主厂房——反应堆安全壳的设计。安全壳是核电站的最后一道屏障，它能承受反应堆在发生失水事故时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并阻止放射性物质的外泄。有了安全壳，即使核电站发生最严重的事故——堆芯熔化，象苏联契尔诺贝利核电站一样的事故，也会把事故产生的危害包容在安全壳之内，对周围的人民生命财产不会带来任何损害。由此可知安全壳在核电站的安全体系中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苏联的契尔诺贝利核电站正是由于没有建造安全壳，才发生了核电历史上最最惨重的悲剧。

设计和建造一个合格的安全壳难度很大，几乎要用尽建筑工程全部的尖端技术。安全壳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秦山核电站的安全壳是一个直径38米、高7.3米、筒壁厚1米的带半圆球形穹顶的、巨大的予应力圆筒形压力容器。应力分

析时要考虑地震、飞机撞击、龙卷风袭击、事故压力、事故温度的作用，而且按国际惯例、要做空间模型的动态分析，这在工程结构分析中，无疑是尖端学科之一。为了使安全壳能承受巨大的压力，筒体上布置了上千束的予应力钢索，每束钢索拉力达300吨，这样的予应力体系在国内是领先的。安全壳内设有起重量达270吨的36米直径迴旋吊车，它的钢结构支承体系在国内也是罕见的。除此之外，这么庞大的安全壳，其内表面是一个整体全封闭、平整的钢衬里，它的设计和制造之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系列的难题，在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资料或经验可借鉴，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解决。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系列的试验分析，终于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完成了设计，并于1989年全部施工完毕。经国务院组织多批专家组的反复审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的检查确认，秦山核电厂安全壳的设计是先进的，建造的质量是优秀的。

目前，秦山核电厂的调试已近尾声，并将于今年“十·一”前正式并网发电。现在我们正忙于秦山二期核电站设计和为巴基斯坦设计一座核电站，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核电这一当代既安全又干净的新能源必然会显示出它巨大的优越性。我们台州三门县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屹立起一座核电站，到时，我也愿为我们台州地区自己的核电站贡献我一份微薄之力。

除了核电站的设计，我们还利用空隙，为地方做了不少的工程设计，由我担任结构负责人的项目计有：上海市虹桥开发区37层高的扬子江大酒店；浙江岱山火电厂；江苏太仓热电厂等工程，这些工程都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几年来，我在有关的专业杂志及全国性的地震年会、反应堆结构力学

年会上发表过的论文有七篇（其中有我单独完成的，也有与别人合作完成的），1987年5月，我被授予高级工程师职称。

转瞬间，我大学毕业已27年了，一直在核工业战线工作，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成长为核电建设的高级技术人才，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每一步历程，所做的每一点成绩，无不是国家和家乡父老心血培养的结果，我的知识是属于祖国、属于生我养我的故乡——仙居的。虽然我尚未能有机会为家乡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点滴力量，但我相信，来日方长，总会有机会让我为报答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而做点什么的，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为家乡设计一幢几十层的高楼大厦，但愿这心愿能够实现，因为家乡永在我心中！

青春易逝 壮志永存

机电部电子工程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叶公荫

从1954年到1987年30多年里，我的年华都是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战线上度过的。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曾多次调动，先后到过一家国防工厂、四家研究所，从普通的技术员到副总工程师，目睹了国防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防科研事业才得以迅速发展，国家才得以强盛。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

1954年，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当时正逢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的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上马，因此需要大批经济建设人才，我有幸被分配到156项之一的785厂，从心底里感到光荣和骄傲，但一出校门就遇到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因为785厂是一种新型军事装备生产厂，大学里还没有设立与之相关的专业。从干中再学是当时的一大特点。我决心不辜负党的培养和信任，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新的理论和知识。1956年冬，我被选派赴苏联学习，赴苏前，到北京俄语训练班学习。1957年秋，第二机械工业部筹建电子计算机研究所，决定从俄语训练班中选拔几名技

术人员加入电子计算机的研究队伍，我是被选中者之一，从此，我走上了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工作。电子计算机从1946年在美国问世以来到1957年的10年中，发展不算太快，还只有美、英、苏、法等几个国家能生产，数量也很少，局限在科学计算领域中应用。美国正着手建立一个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战略防空体系。对这种尖端边缘科学真有点神秘感。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我国计算机事业研究发展的中心。当时，各部委、大专院校、解放军等各部门选拔了共1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集中到计算所，全部技术人员中有四、五位放弃美国优越条件毅然回国的爱国专家，二、三名国内无线电技术老专家，还有几位中年大学教师。绝大多数是从工厂抽调来的由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年龄在30以下。除从美国回来的专家和少数到苏联实习过的以外，都没有见过计算机是什么样，也没有学过计算机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为了适应计算机技术发展需要，清华大学在计算所支持下率先开设电子计算机训练班，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我们也参加训练班旁听（那时到大学去听课，只要有介绍信，说明工作需要，是不用花钱的）。学习计算机原理、脉冲技术，计算数学等课程，另一方面计算所内组织讲座，消化苏联提供的大型计算机资料、图纸。边工作，边学习，边讨论。我被分配到外部设备组，这可能是我学通讯的缘故吧！全组一位工程师，一位交大讲师，两位1956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三位清华大学第一期计算机训练班的学员。那时的工作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天，也不知道休息。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心里装着一个共同目标，即早日研制出计算机，为国争光。在整机联调的大半年时间里，为了提高调整机器的效率，决定减少班次，保持思

维的连续性，每天两班制每班13个小时，其中一个小时是交接班时间。真正的实际工作时间还远不止13个小时呢！领导和大家一样，经常深夜到机房看望大家，炊事员把热腾腾的夜餐送到机房，整个集体充满真挚、友爱、和谐协调气氛，谁也不计较报酬，谁也不搞技术保守。1958年底，我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投入运行，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向世界宣布中国研制成功大型电子计算机的消息，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证明没有中国人不能做到的事。

飞 跃 与 挫 折

1959年5、6月间，大家写完了总结，修改完图纸，先后离开科学院计算所，回本单位工作。这批人是计算机事业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不久，计算机研制工作在全国掀起高潮。我回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15研究所，担任外部设备组组长，参加小型电子计算机磁鼓存贮器的研制工作。1959年冬，我被推荐出席北京市工交财贸系统群英会，还列席全国工交财贸系统群英会。转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为了加强国防科研的领导力量，加快国防科研建设，国防部决定组建六、七、十研究院，将原工业部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划归研究院领导，并从几个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抽调一批军官加强研究所的政治思想工作。第十五研究所划归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领导，这样进入一个飞跃阶段，首先是科研队伍的迅速壮大，我所在的十多人的外部设备组很快就发展成20多人的外部设备研究室，下设四个研究组，我被任命研究室技术副

主任，主持工作，至1962年发展到60多人。新的研究课题也增加了十多个。技术人员还进行军事训练，以提高组织纪律性和思想觉悟，为部队服务的思想更明确了。我体会到我们这样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只有依靠集体力量，才能把科研搞上去，因此我致力于抓科研管理，建立技术档案，提高管理素质，举办学术讨论会互教互学提高技术人员的技术素质等工作。1962年国家恢复了停止8年之久的职称评定工作，全所有五、六个被授予工程师称号。我是其中之一。

1963年我带着两篇论文参加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电子计算机第一届学术年会，其中一篇是外部设备与计算机标准接口电路，可以说是我最早的一次设想和尝试。

1964年7月，我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磁记录学术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我国代表一共有三个人。这是我国首次对西方电子计算机工业进行的考察，除参加会议活动外，还参观了英国主要几个计算机公司，並到曼彻斯特大学参观了该校研制的代表国际水平的每秒100万次运算速度的大型计算机。在我执笔的考察报告中汇报了我国计算机与西方计算机的差距。

1965年国务院决定组团从西方引进电子计算机以加快速度缩短差距。引进小组一共五人，我作为引进小组成员参加选购工作。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禁运政策，所以引进工作十分困难，此项引进任务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关怀下进行的。在考察、选型到与外商谈判等过程都通过大使馆向总理汇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从英法两国签订了五台能代表第二代计算机水平的中小型机及部分先进的外部设备。周总理指示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要“一用二学三创”。

1966年1月电子工业部决定成立接收小组，並拟成立计算中心，让这几台机器，面向社会服务，提供观摩学习，指定我负责组织接收和筹备计算中心的工作，地点设在北京有线电厂，技术人员来自15所、北京有线电厂、南京有线电厂。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验收小组中一部分人起来“造反”，要砸烂这个验收办公室，批判“引进”是“爬行主义”、“崇洋媚外”，把国家科委三局局长、电子部计算机处负责人揪来批斗。当时刚验收完一台机器，其他机器还没有到。电子部机关逐渐陷入瘫痪。电子部决定放弃成立计算中心的设想，把这几台机器分别调拨给需要机器的单位使用。1967年夏天有两台机器运到大连港，货物压了一个月，没有收到提货单，电子部在得到消息后要15所负责组织验收。由于派性作怪，在争夺验收权的问题上又耽误了一段时间。最后，领导班子由所长出面要我负责验收。当时90天的验收期，只剩下60天，而且机器在那里尚未查实。如果不能如期完成验收，万一机器有问题，其后果不是坐牢也得蹲牛棚。这一次参加验收的两派群众都能顾全大局，配合默契，验收工作进展顺利。1968年向航天部某研究所移交並帮助安装直到投入运行。

三 线 建 设

1973年，为了支援三线建设，组织上调我到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16研究所，担任科技处处长。我和爱人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小孩来到陕西省略阳。16所是低温超导和低温电子学研究所，当时的现状是只有一位负责行政的副所长，没有总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以67届大学生为主体，少数一部分是从科学院调来的1962~63年毕业的

大学生。真是新技术、新人才。我一面学习低温物理和低温技术，学习超导的基本原理，一面搞调研，寻找实际应用课题。我把低温、超导、低温电子学比作一个屁股两个拳头，即低温是基础，是屁股，一定要坐稳，然后两个拳头才能有力。因此首先抓低温技术，依靠有经验的工人师傅，调整好大型制氧机，稳定生产氧、氮气和液氮。1974年自行研制的每分钟20升的氮液化器正常运转了，为超导试验准备好条件。在当时，国内能稳定生产液氮的单位不多，像这样规模更没有，所以北京、武汉、成都等很多从事超导研究的单位跑到山沟里来做试验。从1973年到1979年我们还组织开展了超导隧道二极管、核磁共振、强磁体、超导电机等多项超导原理性及应用的研究。由于超导材料的临界温度是绝对温度4度，实际应用是不可能的，研究超导材料的单位都明白这一点，因此都在致力于提高材料的临界温度的研究。在低温方面，我们研制了低损耗的液氮、液氮容器，在国内最先研制了低损耗的100升液氮杜瓦瓶，为汉中种牛研究所研制10升广口贮存种牛精子的杜瓦瓶，在此以前生物研究用的这种杜瓦瓶都是靠进口的。在低温电子学方面研制出77K低噪声宽频带放大器，用于卫星接收的前置放大。

在三线搞科研其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材料缺乏，还有“斗、批、改”的任务。回想起来，能做出这些成绩，真算不容易。1979年我被选为知识分子代表出席勉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我很想为地方做点有益的事，但我们的技术与当时地方需要相差太远了。

生 命 不 息 弄 潮 不 止

“四人帮”粉碎后，1979年党和政府颁布了落实知识

分子政策，要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归队。我被调回到电子工程研究所。该所是1965年开始组建，当时是第15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不到100人。1966年正式成立研究所。到这个研究所工作的人员，政治条件要求很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到1980年全所发展到800多人，其中500多科技人员以60年代初大学生为主体。主要研究方向是为陆海空三军研制战略性作战指挥系统，称之为C³系统，是现代通讯、计算机指挥综合性的尖端科学技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西方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计算机已进入了第四代。我们的差距拉大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科技工作带来了活力，高新技术的大量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改变了科学技术与生产脱节现象，改变了单件研制方式，提高了生产加工自动化程度，从而提高了高新技术的研究效率。从1980年至1987年，我先后担任科技处副处长、副总工程师，分工负责部分电子设备研制的组织工作和产品经营管理工作，並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我今年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心里尚不想退休。解放前，我有过失学、失业的感受，上大学更是不敢想。解放后，是党的培养，我才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祖国的召唤便是我的理想，我要将文化大革命失去的时间争取回来，1987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有机会来到深圳特区，参加了密封免维护固定式铝蓄电池技术的引进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产品已投产並得到推广使用。1991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新产品开发证书，。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再为祖国作一些贡献。

与电波打交道

国营第九二四厂高级工程师 张锦基

1935年10月，我出生在仙居城关迎春巷西宅里的泥水匠家中，兄弟五个，我最小。当时，由于国民党抓壮丁，我两个哥哥被抓，还有一个逃到天台县。父亲不愿为国民党埋死人，受到侮辱、折磨，一气而死。那时我才7岁，刚开始懂事。此时家中除我和10来岁的小哥外，其余都是女的，无劳力，生活十分贫寒。后来，母亲觉得我一字不识总不是办法，就咬紧牙关省吃俭用给我上学。我一边上课，一边利用中午和晚上为家中干活，如割牛草、放牛，星期天跟大人到孟溪坑里砍点柴等。就这样，终于读完小学，1949年底毕业。

1949年夏天，仙居解放了，也给我带来了希望。当时小学校长动员我上初中，我于1950年春考上仙居中学。由于家境实在困难，尽管学校已免了我的学费并给了助学金，家中还无力供我上学。我被迫停学了，但人民政府十分关心贫下中农子女学习，学校主动来动员我继续上学，并增加助学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顺利地读完初中，1953年毕业于仙居中学。

那时仙中还没有高中部，我考入了天台中学。仙居到天台当时没有公路，主要靠两腿走。大约有一百七、八十里地。每逢学校开学，我们担着大米、干菜，早晨三点钟出发，从白水洋进去，走到晚上十一、二点就能到天台。夜晚

行路。又是在高山峻岭之中，我们十分害怕野兽，几个人一边走，一边大声说话，有时唱歌，甚至有时大叫几声，来壮壮自己的胆。尽管很辛苦，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我们虽然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一切生活都要靠自己，但都能自觉地把生活安排好。

1956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几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学会了军事上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也使我在思想上、生活上、纪律上、身体上等各方面都得到教育和锻炼，为我今后的生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部队期间，我亲身感受到，我国老一代革命家、军事家对部队建设都十分关怀。如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元帅，甘泗其、肖克上将等均来部队看望过我们。

军事学院毕业后，由于国防工厂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我就转业来到了国营第九二四厂。

到厂后被分到设计科技术情报室搞科技情报的翻译。我译了几篇有关侦察接收机方面的资料，刊登在《超高频技术》杂志上。

1966年为支援越南，某军情报部急需一种侦察接收机，在我负责下，突击奋战9个月，完成了研制任务，送到前线，部队反映使用效果很好。

1968年某市接到部队任务，急需一种侦察接收机来搜集美国阿波罗登月的情况，由于时间紧，他们得知我厂有这方面的研究，要求支援。我组织人员与他们一起进行紧张的研制，很快拿出了样机，顺利获得阿波罗登月有关资料。

多年来，为截获有关敌人军事动态方面的情报，我参与

并负责研制成功了不同频段的接收机，为保卫祖国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1972年，我担任厂设计科副科长。在此期间，我带领我厂的同志，参加了通讯部、四机部、邮电部、航天部等十几个研究所、工厂、部队单位参加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站的体制、通信方式、跟踪等总体方案的论证会议。

尼克松访华时赠送给我国一个“十米”卫星通信地面站。为了掌握卫星通信地面站的技术，我厂由我负责组织解剖地面站的核心技术——氦致冷参量放大器，获得了成功。

1976年根据市场需要，厂里决定我去组建民品科，主要研究空调器、电视机、牙科治疗机和仪器设备。到1979年初具规模。

1979年我任总装总调车间副主任，负责车间技术工作，以加强电子产品的质量。

1985年为援助地方工业，我被调往南方电冰箱厂任技术科长。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经营销售工作已不可忽视，因而我又被调到了经营处系统工程部任主任。

从我的一生中，我深深地认识到，我的一生是党给的，是人民培养的。如果1949年全国不解放，我最多读到小学毕业，根本没有上中学的条件。只有解放后，我才有可能上中学。又如1955年底，我高中快毕业时，全家生活的支柱——我的小哥突然去世，我又无法继续学习，可党和政府又一次帮助我克服困难。学校知道我经济困难，家有老母，在选专业上为我费了很多心。开始时，让我参加飞行员挑选，后又给我介绍考军事院校。现在的年轻人都可能不会

相信，当我考上军事学院，临走时母亲从邻居家借了5元钱给我作路费，我身上只穿一件自制的运动衣和一件衬衫，唯一带的行李就是母亲给我做的一双布鞋。

我有今天完全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应核为党为人民献出一切。

从事军工研究的女专家张梅娥

张梅娥同志是仙居城关镇人，1937年11月出生。她小学与初中分别就读于仙居的安洲小学和仙居中学。台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1960年毕业。大学期间，她克服了因语言不通造成的学习困难，很快在各门功课上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并且还参加了许多实际工作，如长江三峡高压电压等级论证工作等，得到了锻炼。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科研工作，同年被派往国防科委第10研究院第14研究所参加高等院校大协作的110工程研究工作，后来就留在第14研究所工作。1970年内迁至贵州第38研究所，1985年调回第14研究所。1974年任技术员，1978年被评为工程师，1986年被聘为高级工程师。

张梅娥从事军工研究，三十年如一日。她曾多次担任过部、委、国家级重点工程课题负责人及系统负责人职务，完成研制任务30多项。在许多研究项目中，最重要的还是高精度、轻小型、多功能军用移动电站的研制工作，这几乎耗尽她半生心血。

六十年代，为满足特殊军用装备移动电站高静态移定度的要求，张梅娥和她的同志们忘记了休息，放弃了家庭，一身扑在工作上，经过了艰苦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可控硅自动调压机组。该机组的调压率、震动率优于当时日本防卫厅NDS·XC·4206规定的指标，而且体积、

重量均小于西德、芬兰的机组。尤其是重量，从原来的1700公斤，减到200公斤以下，可以4个人抬着走，适应实际需要。此外，还为大功率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动态过程无超调的直流稳压电源，动态指标超过英国“DEF—25A—1965、600伏以下电源系统”的军用标准。

七十年代，为适应武器装备的轻小型化、高机动性，张梅娥和她的同志们又研制成功了陆用高速燃气轮中频发电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该机组与普通同容量机组相比，重量只有它们的 $1/8$ ，体积只有 $1/4$ ，满足了实战需要。其主要技术性能达到同期美国海军兵械局和索拉公司研制的用于移动式中士导弹地面电源的燃气轮发电机组水平。

八十年代，为军用移动电站高功能化，她又参与研制成功低噪声双频方舱电站。该电站是我国独创产品，具有一机多用途，可以单频、双频、变频方式运行，同时解决了军用移动电站行业的关键技术难题——低噪声、双频并联，低温起动、高海拔等，从而大大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使用的经济性以及对恶劣环境的适应性。该电站结构新颖、转运方便，噪声指标达到国际ISO的规定值。与此同时，她还参与研制成功具有明显经济效益的大范围调压变频装置。

张梅娥同志除了主持和参与以上这些军工项目研制外，还从事精密跟踪系统非线性因素的分析研究工作；参加部、委关于国家重大技术开发项目中的子项课题的评价与分析工作；参加国家重点工程长江三峡水电工程高压输电电压等级的论证工作等。

目前，张梅娥同志和同伴们的研制成果除用于国内军事装备外，有的已打入国际市场；有的已列入国家定型产品系列；有的技术已使用在其他领域，如用于开发南极电站。

张梅娥同志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工作，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近年来，她的论文又在《移动电源与车辆》等杂志上发表。目前她表示要继续探索，不断开拓，多作贡献，报答家乡人民，报效祖国。

（吴 巍 整理）

从战士到高级工程师

——记南京有线电厂高级工程师 华文长

华文长同志是仙居县原怀仁乡下华人，1925年出生。任南京国营第734厂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在下张小学读书时，正逢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日机狂轰滥炸家乡土地、残杀同胞之时，华文长和他的同学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动。他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小伙伴们一起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后来，有关“三五支队”的消息传奇故事越来越多地传播开来，不断影响着、召唤着苦难的人们，加上家里穷，怕国民党抓丁，他也就自然而然地萌发出投奔三五支队，参加革命的念头。

1942年，他考入台州中学后（当时设在仙居三井寺），投奔游击队的念头愈来愈强烈。他与另二名同学一起组织了“永安通讯社”籍此寻找三五支队。那时中小学课本缺乏，他们以通讯社名义筹集了一些钱买书、借书，再转借给缺书的同学，这一行动受到师生的好评。初中毕业后，通讯社自然解体。其他二位同学先后找到游击队。他则继续就读高中。

1949年1月，他高中毕业。回家后，强烈的革命信念撞击着他的心灵，使他在家里再也呆不住了。他动员了二名小学教师一起直奔三门寻找三五支队。几经周折终于在宁海深山区找到共产党游击队，受到部队的欢迎。

他正式投身革命后，被安排在游击队联络站工作。主要

从事对上级领导、新参军人员和内部联络员的接待、安排工作，並负责一些信息传递。有空时则在山里染布——把白布染成灰色的军装布。不久，他被调入第四支队。

1949年5月29日临海解放，华文长参加了军需方面的接收工作。四支队整编入浙江省军区台州第六军分区。他被编入台州军分区后勤部军需股任会计。1950年2月，他到华东军政大学浙江分校学习。10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教导团任文化教员。1953年6月随军到朝鲜，任炮兵观察班班长。但因患肺病，不得不提前回国。

1954年夏，部队领导推荐他到南京工学院机械系学习。二年后毕业分配到南京有线电厂（即734厂）工作。从此，他正式开始从事技术领域的工作。他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1975年，该厂分设4个独立设计所，他在第二设计所负责该所新产品（主要是电子计算机和铁路运行自动化产品）研制的工艺技术工作。他在工作中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为厂里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如1975年，厂里接受了“北京地铁自动停靠启动仪器表示盘”的设计任务，这个表示盘由6块4mm×1.4m×2.6m板拼装而成，工艺相当复杂，研究所领导都感到难以完成。他却自告奋勇，接受了任务。在设备缺乏的情况下，他自己设计构思出一套机构，利用原有设备解决了面板冲孔难题，做到成本低，质量好，圆满完成了研制任务。后来安装时，他还亲自到现场指挥，取得了成功。

40年来，华文长在党的培养、教导下，从一个普通的战士到高级工程师，走过了一条艰难的路。

（吴巍 整理）

献身于光明和温暖的事业

浙江省电力局生技处主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徐柳生

我于1935年11月出生在仙居县城关镇市桥村，小学、初中均在仙居就读，高中则在临海的台州中学。195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工学院（现称东南大学）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经过5年的学习，1960年毕业，分配在浙江大学任教师。因电力工业需要，于1960年10月调入浙江省电力局任技术员。1979年6月30日升为工程师，1988年9月6日被批准为高级工程师。1991年2月被任命为省电力局生技处主任工程师。

我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1978、1979、1987、1990年，我先后被评为省电力局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评为华东电业管理局化学监督先进工作者；1991年能源部又从电力系统推荐我为全国钛推广应用先进工作者。

30多年来，我几乎跑遍浙江省的大小水（火）电站（厂）。跋山涉水，不怕山高路远，严寒酷热，心中只有一个为电力事业而奋斗的信念。我对各县的水（火）电站的运行、水力资源、煤资源的开发都进行了调研和普查，并在技术业务上进行指导。特别是对家乡台州各县（市）的电力事业作出了努力。我首先对仙居县、黄岩市提出发展热电联产，改善环境污染，为我省地方热电发展开拓了新的路子。我还

参加了台州、镇海、半山等大火电厂国产12.5万千瓦和2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试车及运行，为我省电力事业作出了贡献。

由于我对化学监督工作的努力，我省在1986——1988年3年中连续被评为华东电管局化学监督工作第一名。

1984—85年，我与上海汽轮机厂同志一起在半山电厂将波形伸缩节应用于同声12.5万千瓦汽轮机组上，消除了汽缸跑偏。后来又于1989—90年将之应用于镇海电厂的国产20万千瓦汽轮机上，消除了汽缸的跑偏及膨胀不畅难题。

1986年对台州发电厂1号机国产12.5万千瓦汽轮机凝汽器铜管泄漏进行改造，将之改为全钛管凝汽器，消除了泄漏，并提前完成改装工程，提早28天发电，为国产凝汽器的改造及钛的应用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获华东电力网局和省电力局技术革新奖，为国民经济增加了产值5亿元。

1986年4月~1987年12月，为了解决国产12.5万千瓦汽轮机调门横向振动难题，我日夜翻阅许多有关的书籍、资料，提出了加装稳流罩来改善汽流干扰的方案，在台州发电厂4号机上试验成功，消除了振动，提高了机组出力，并将改装图纸无价转送给上海闵行发电厂、半山发电厂，并推广到全国同类型机组上，这样消除了振动。此项改革获华东电管局技术革新奖。

1991年1月，我作为北仑电厂循环水泵质量验收工作者之一赴德国参加验收工作。

除上述工作外，我还注重理论研究，撰写论文。现已在

各级刊物上发表及在部级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有16篇。如《125MW汽轮机主油泵与调速油泵匹配问题的探讨》（1990年1期《华东电力》杂志）、《125MW汽轮机组使用波纹管防止高中压缸跑偏》（1987年12期《华东电力》杂志）、《背压、抽汽——背压汽轮机的清洗》（1985年《工业汽轮机》上发表）、《滨海电厂采用钛管蒸汽机的探讨》（在全国企业管理大会上宣读）……。

1990年，我还编写了《国产125兆瓦汽轮机检修工艺及质量要求》一书，于1991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电力事业是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的事业，我愿今后更好地燃烧自己，更多地给人们增加一份光和热。

我的历程

水电部第十二工程局高级工程师 应景良

1937年7月，我出生在仙居县埠头乡十都英村。时处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际，又是内战不息、民不聊生之时。佃农家庭出身的我，从5岁起就跟姊姊放牛，7岁开始，牧牛就成了我少年时期的主要职业。除此之外，还得帮父亲干农活。那时我家种有租田十几亩，大多在六、七里外的下抱、清水塘等村。那年头，大哥为逃“壮丁”，常年在外谋生，母亲终年磨豆腐养母猪。尽管一家人拚死拚活，辛勤劳动，秋收后除了交租、还债，所剩无几，生活还是十分艰难。父母为了我不当“睁眼瞎”，不得不将二哥（当时读小学五年级）停学，而后于1947年春，送我进十都英小学读书。其后，名为上学，实际上约有一半的日子是在家放牛，直至解放。1950年，因父亲病重，我只好停学（半年多）在家干农活。1951年春在老师动员下，才去复学，还是边上学边放牛。1953年考入正谊中学。

我上初中仅一个多月，父亲病亡，接着又于1954年初，三兄弟分家，我和多病的母亲在一起，又一次面临失学的危险，但在慈母支持下，我边上学边劳动，过着半农半读的生活。我家离学校约13里路，我经常回家种田、砍柴，靠自己劳动获得的粮食和青菜之类，带到学校里，每餐放到陶瓷瓶中蒸熟充饥。学校虽有助学金可缴学费，但书簿费和柴火费等还是无着落，因此，我有时就帮人做零工。有一次

帮人割稻子，中午收工时需空肚子挑一担近二百斤的稻谷回来，虽然咬紧牙关挑回来，不幸的是压伤了我的脊椎骨，留下了隐患，就是这样一天十多个小时强劳动，工钱却只有二升半米（不到四市斤）。生活虽然限难、困苦，我能承受，可初一这一年，只因回家干活，而常被老师批评，学年品德得了个“丙”，为此，我一度失去了上学的信心。1954年夏秋，我准备停学，与人约好去江西谋生。不巧，就外出之前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已误了外出机会。九月初开学时，听说已换了班主任，我一高兴又去报了到，仍过着我的半农半读生涯。

办低级社后，是靠土地分租加劳动分红，那时，我除了砍柴，每年能做劳动工分1300多分，年终分红，每10分工分只有一角多钱，只够分口粮，书簿费等还得另想办法。是年，十七、八岁的我却挑着与大人一样的重担翻越黄榆岭去磐安县安文，或过苍岭去壶镇等地卖铁，企望赚几个脚钱，却又不走运。有时只好勒紧裤腰带，卖些口粮以应付缴费关。初二、初三的二年中，班主任杨文康老师时常到各村家访，当他了解我家境况后，对我特别同情，不仅没批评我，而且经常鼓励我抓紧学习，使我坚定了学习信心。初中三年中，我没有棉被过冬（冬天找人拼铺），尽管吃不饱，穿不暖，终于熬到了头。毕业前夕，听说读师范不用愁生活费，当时我是多么想进师范啊！然而，有远见的杨文康老师却偏偏保送我入高中。当姊姊得知我被保送升学，就把自己结婚时一条棉被送给我。这样，我就于1956年9月初进入了仙居中学高中部（首届）读书，当时学校不仅减免了我的学费和书簿费，而且有助学金可缴伙食费。1957年6月，母亲病亡，我就孤身一人，以校为家，用功读书。

高一第二学期开始，同学们推选我这个乡巴佬当班生产委员。当时只有一些菜地，农事不多，到“大跃进”年代，确实忙得我不可开交。当时我们班有水田十五、六亩，新垦溪滩地10多亩，又养有耕牛、肉猪和兔子等，我们班虽有同学50多人，可是能耕、耙、平田和田间管理等全套农活的却寥寥无几。所以，我这个生产委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离校四、五里路的小南门外（黄坦树村附近）干农活或田间管理。那年粮食作物获得了丰收，然而，新垦种的溪滩地，被大水冲淹后的花生却歉收。

1958年秋收刚过，就开始全民“大办钢铁”了。我们班的任务是炼铁。我们请来师傅指导，经砌炉、担炭、洗运铁砂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于初冬开炉炼铁，经轮流拉风箱並日以继夜的奋战，终于流出了百多斤铁水，这得不偿失的收获，却使我们高兴的不得了，並得到了校领导的肯定和祝贺。紧接着学校里又把“炼钢”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班。我们在张天敏老师指导下，经过个把月的摸索，终算在隆冬腊月炼成了一块“中碳钢”，而张老师却一氧化碳中毒，晕倒在炉旁。

1959年，我高中阶段最后一学期，县卫生局为在仙居推广中草药，首先在我等三人身上试治，结果药一入口就不省人事。痉挛、休克间断发生，经县医院全力抢救，我们三人都得救了。不过，当我知道自己是躺在医院里时，已是第四天了。人虽救回来了，但身体很虚弱，旧课未补上，新课又耽误，高考将近，真是急煞人。当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去临海应考。

1959年8月14日，喜从天降，华东水利学院（今已改为河海大学）按第一志愿录取了我。同年9月初，我又

背着那条破烂不堪的旧棉被，土里土气地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进校后不久，就进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那时，我们班有少量土地种菜，以补充学校部分蔬菜。学校还在江宁县办有农场，其中有一养猪场。这既是学生学农的基地，又可为学校解决部分农副食品，一举两得。从第二学期开始，同学们推选我为班生活委员，兼管生产。

我们“水电站动力装置”是新办专业，原定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学工学农时间并不多，前三年每个学期有二、三个星期集中劳动实习。有在校农场学农，有在校实习工厂或南京有关工厂学工。四、五年级时，是到新安江、黄坛口等水电站进行专业实习。

1962年困难时期，“南大”等高校中曾因营养不良，浮肿而死了二名大学生，震动了南京城，从而引起了校领导重视，并把体育课改为学太极拳，考试改为考查等等。其实，像我这样的半农民大学生，反而感到条件已很优越，学习也有劲，至1964年6月，学完所有课程，经毕业设计、答辩，以优异成绩毕业了。

1964年8月，我来到新安江水电工程局（即现在的水电十二局）报到，开始分配在局竣工组描图三个月，接着调局机电处，参加新安江水电站二号水轮发电机组安装见习，至1965年6月，抽调去搞“四清”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回到局机电处。不久组织上又派我到“局文革办公室”、“清阶办公室”搞调查工作等，其间数次要求回原单位搞技术工作都未得同意，白白地浪费了十来年的“黄金时代”，直到1977年才回到局机电处搞我的本行，当时在衢县乌溪江水电站工地，我负责水轮发电机组安装的技术和质量终检工作。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制造质量极

差（接近报废）的水轮发电机组得以起死回生，从1979年投产以来，已正常发电10多年，为我省工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质而廉价的动力。尔后，我于1981年8月晋升为工程师。

1983年初，我转移到云和县紧水滩水电站工地工作。1984年，我局先行改革试点，撤销了机电处、安检处、调度室等处室，同时成立了施工管理处，我任机电科科长，1988年任副总工程师，同年9月经水电部水电总局评审，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在改革的局机关，我重点抓质量监督，加强质量管理工作。经过4年多的不断努力，使紧水滩水电站工程四千多吨永久的金属结构制造、安装质量全部合格，其中80%以上达到了优良级；电厂内的六台水轮发电机组安装质量全部达到了优良级。为这座大型电站的优质工程打下了基础。又为本省提供了30万瓩优质电力，为电网增加了宝贵的300MW调峰容量。

我在紧水滩水电工程建设期间，除了完成质量监督等工作外，又主动承担了以下一些临时工程项目的设计工作：

1985年初，与人共同完成了紧水滩水电站大坝泄洪中孔临时防洪闸门的改造设计，利用原乌溪江水电站回收的旧闸门，经改造代替了原设计的钢筋混凝土防洪闸门。这不仅确保了当年的防洪要求，而且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比预算节约投资50万元左右；

1985年夏秋，又与另一同志分工协作，改造设计了紧水滩水电工程施工导流洞的截流闸门。我们再次利用了回收的旧闸门，改制后的截流闸门，自重170多吨，能承受1.1万多吨水压力，与原设计闸门比较，节省新钢材近百

吨和五、六万元费用；

我们推荐的截流闸门沉放方案，经原设计单位同意后，由我设计、实施，并于1986年6月，将170多吨重的截流闸门顺利、安全地沉放到设计位置，保证了水库按时蓄水。此方案与原设计的方案比较，不仅方便易行，而且为国家节省了约10万元费用，也节约了不少“三材”；

1989年夏，又以二扇旧闸门改造设计了一扇石堆水电站的施工用闸门，满足了机组进水口的施工，从而保证了石堆水电站按时发电，此项目也节约了10多吨新钢材和数万元费用；

1983年至1985年间，我参加了GB8564—88《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技术规范》的修改工作，该规范是以原水电部部颁标准为基础，几经修改，终于统一意见，按“国标”颁发；

在水电机组安装施工中，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些简单易行的新方法，不断提高机组安装质量，并已成文推广，如《水轮发电机组动平衡的简捷方法》、《水轮机座环安装变形的控制》等文，已先后在《水电站机电技术》——全国水利水电机电技术情报网网刊上发表。

1989年我转移到局后方基地工作，1990年10月因工伤左手致半残。今在局质量管理处搞些质量管理方面的基础工作。在当前新形势下，正在着手制定水电系统质量检验评定表等质量管理用表，以强化水电施工质量管理工作。

我生在旧社会，成长在红旗下，是党和人民一手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我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向家乡人民汇报。并且至今还没有为故乡建设献计、出力。但我时刻想念着哺育过我的故乡，我愿为故乡的水电建设事业尽微薄之力。

电气专家张子南

化工部第八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子南是百岁辛亥革命老人张任天先生的儿子。张子南1939年于仙居竞西小学毕业后，在仙居县立中学读了一年，转入台州中学就读初、高中，最后于1945年7月在绍兴完成高中学业，遂又考入英士大学工学院。解放后，张子南转入浙大就读，因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而提前毕业。于1949年11月被分配到东北化工局基建处，1950年5月调到锦西化工厂任技术员、工程师。1965年8月调到成都化工部第八设计院，直至现在。

翻开张子南的个人档案，可以发现一大叠红彤彤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化工部第八设计院1981年度先进工作者；四川省省级机关委员会1986年优秀党员；四川省化工厅直属机关党委1987年、1988年优秀党员；成都化工工程公司1986年、1987年、1988年先进工作者标兵；1988年化工部重大贡献荣誉证书；1991年成都电工技术学会优秀科技论文证书及四川省建设委、建筑业联合协会授予的30年以上优异成绩荣誉证书等等。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电机工程学会会员的张子南，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科技事业，请看他的工作足迹——

1949年至1951年，担任多阳极水银整流器（日立型）修复设计小组组长；1952年至1953年，任22KV变电所、架空线、配电设计引进滚焊机电气设计、试车

的设计人；1954年负责多阳极水银整流器（AEG型）修复的设计工作；1956年负责9台苏式单阳极水银整流器（PWHB—500X12）的试制工作；1956年至1957年，参与锦西化工厂扩建工程设计工作；1958年至1959年为大连、郑州、哈尔滨、新疆各厂指导整流所设计，任技术负责人；1959年负责整流所的技术工作；1961年至1964年，任工厂填平补齐公用工程部分工作综合组副组长；1965年至1966年为重庆、兰州的有关企业配电，任长寿、沙市、自贡、合江烧碱厂电气设计人；1967年至1969年为四川、山西、邵阳农药厂等企业电气设计；1970至1971年为四川、自贡树脂厂电气设计。负责南阳酒精厂整流所施工、试车设计工作；1972年任晨光烧碱整流方案设计人，编写氯碱工业设计手册整流部分；1973年至1975年任川农110KV变电所、援越、吉化、鸿化、合化等烧碱车间扩建或新建工程电气设计人；1976年至1978年，担任年产3万吨、7500吨烧碱复用设计电气部分设计人及吉化、云化烧碱扩建工程设计人；1978年至1985年参加齐鲁30万吨乙烯、20万吨烧碱引进工程的电气谈判、设计联络（赴日、美等国）、设计审核、国内配套设计（电气部分），任专业负责人；1985年至1991年，参加上海30万吨乙烯吴泾工程、15万吨离子膜烧碱引进工程的电气谈判、设计联络（赴日本）、设计审核、施工图设计（电气部分）、国内配套工程方案设计等，任专业负责人。

（吴 巍 整理）

高科技应造福于人民

——记杭州大学充电机械研究所副教授应成仁

应 建 红

应成仁，1935年11月出生于仙居县下各镇。解放初，只有十四五岁的他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直到17岁才有机会进入仙居中学初中部学习。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支部中年龄最小的党员。1957年他以优异成绩从临海一中高中部毕业，同年考入了杭州大学物理系。

尽管家境十分贫寒，但扼制不住应成仁一颗渴求知识的心。他接过叔叔给的3元钱，其余什么都没带，独自去闯外面的世界。当少年应成仁步行至临海时，钱已快化光，而且病得很重，临海到杭州的车票就需6元，何以能实现进大学的宿愿啊！在临海他碰到最赏识他且重才的临海一中校长陈文先生。陈校长看到他这种情况，当即拿出10元钱交给了他，让他赶快去治病，以便早日赴杭。为了早日跨进向往已久的大学校门，应成仁病也不治了，当即买了车票踏上了去杭的汽车。当他报到时已迟了好几天。当晚，应成仁连个席子都没有，更不用说辅盖、蚊帐。他光着膀子躺在床板上回想着半个多月来的艰辛，想着即将进入的科学王国，甜甜地入了梦乡。

1960年冬，仅读了三年半大学的应成仁因各方面表现突出，被保送入吉林大学进修，从师于我国金属物理学权

威、老学部委员余瑞璜教授，攻读金属物理专业研究生。在吉林大学期间他重点从事X光金属结构分析，研究物质结构和确定物质分子、原子位置等，还从事电子显微镜研制工作。原定二年的学习期一晃就过去了，他那敏捷的思维、很强的科研能力和他的勤奋、肯钻研精神深受导师余瑞璜教授的赏识。在余老教授的再三挽留下，他又在吉大学了二年。

1964年8月，他回到了杭州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因当时全校搞金属物理专业仅他一人，这样他又被迫转而从事半导体大功率管研究，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今天以激光、集成电路、生物工程为代表的高科技又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

1976年，应成仁转到了白手起家的杭大激光研究所工作，边筹建、边学习、边搞科研。为了挽回文革十年的损失，跟上现代高科技发展的步伐，他每天坚持学习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工作。

造水库对大坝高度、坡度及大坝拱形弧度选择要求很高，选择时主要考虑水对坝的静压力造成的大坝变形情况，为此，他与王绍纪教授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研制出激光测坝装置，应用于松花江上的小丰满电站、广东丰树坝电站、中朝边境附近的太平哨电站等许多大中型水库大坝监测。大大提高了测坝工作效率和测量精度，减轻了工作强度，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下游几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项科研成果获我省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成果四等奖。

——1983年他们又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制了一台具国内先进水平的固体激光器；

——1984年参加了“列阵光学”理论研究到产品开发的一系列工作，制成产品广泛应用于交通路标、交通工具指示，为保障交通安全作出了贡献，该成果获1986年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1984年他独自研究出激光酒陈化技术。新醋、新酒一般需经过几年到几十年地窖储藏才能变陈。而该技术，只要将新醋、新酒通过有关流水线，只需经过一分钟激光处理，一次即可将30~50公斤新酒变成醇香扑鼻的陈年佳酿。该项技术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他将中西医原理相结合，研制成功“负压红外理疗器”，为广大病患者解除了痛苦。该发明获国家专利；

——1989年他还研制了He—Ne激光治疗仪，广泛应用于针灸、眼科、皮肤等诸多疾病治疗；

——最近他又研制成功激光全息图象，并投入批量生产。他们生产的激光全息图象工艺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应成仁还与浙农大联合搞激光育种工作。现又与省计经委洽谈激光唱盘国产化科研项目。今年1月，他担任了下属有十几个研究室的杭大光电机械研究所副所长，负责全所科研以及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工作。

“业未竟而鬓已秋”，应成仁谦逊地说：想起自己短短的30年中竟转换了三个专业，并为一生中思维最敏捷、最成熟，精力最旺盛的年华被浪费了，而深感可惜。现在只有靠努力来赶上时代的发展。他在研制激光酒陈化仪时，连续三天三夜蹲在杭大物理系的地下实验室中，饿了吃点干粮，渴

了喝杯凉水，为了获得一个数据彻夜做实验、查资料，这当中包含了他多少汗水和心血啊！

这一切也凝聚着他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作为一个科学家的高度责任感。

我的简述

宁波水表厂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叶显苍

我于1940年7月3日出生在仙居横溪镇。1953年至1956年在正谊中学读初中；1956年至1959年在仙居中学读高中；1959年至1964年在浙江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宁波水表厂工作，一直从事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曾任工艺科长、技术厂长（兼总工程师和总质量师），技术职称为高级工程师。

宁波水表厂是全国水表行业主导厂，规模最大、力量最强、品种最全、出口最多。现有职工1500人，年产值在4000~5000万元，在技术开发、技术攻关和技术管理方面需代表全国行业水平，体现行业排头兵的地位。许多工作比其它兄弟单位需先走一步。近10来，在行业中，我所分管开发的产品在同行业第一家创部优、国优。我厂是第一家创机电部质量管理奖单位和第一家计量达国家一级单位。

1984年12月，我率4人赴叙利亚考察，为期一个月余。主要是为叙利亚国家建设一个水表厂而作技术考察。参加人员中一人是聘请的阿拉伯语翻译，一人是兵器部五院设计师，另一名是我厂的模具车间技术主任。

叙利亚国防部军工局请我国兵器部为他们建设水表工厂，由于我厂是全国水表行业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主导厂，任务就落在我们厂里。叙方试图在军工厂里搞一个生产水表的民用工厂，在和平环境里也可以为社会生产一些民

品。我们一行在叙方军工局人员的陪同下，在山里山、湾里湾的军工厂里考察后，拿出2个年产10万台水表的工厂设计方案，供叙方选择。经过双方技术专家的多次会谈磋商，最后基本上达成了协议。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中方代表是我，叙方代表是叙国防部军工局局长）。协议中明确由我厂承担技术输出方面的产品、工艺、试验装置和工艺装备的设计和制造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技术指导。我国兵器部五院承担工厂厂房土木建筑工程设计和建设。

我们充分利用叙方军工局工厂的现有条件和技术力量，根据因地制宜的方针和投资少、见效快的原则为叙方提供了设计的总体方案和书面资料。

我们于1985年1月中旬回国，由于叙方政局不稳，在我们回国后不久就发生战争，直到现在该项目尚未实施……。

在社会工作方面，我担任了中国机械企协理事、浙江省机械质协常务理事、省机械价值工程协会副会长、宁波市机械质协副理事长等职。

三十年如一日

——记高级工程师王焕德

王 仁 臣

大哥王焕德生于1918年4月，毕业于安洲小学，13岁赴杭州进安定初级中学，高中在大陆高级测量学校毕业，时值1937年6月。后缀学二年，于1939年考入英士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于1942年毕业。进入社会后，分别在大陆高测及宁波高工教书六年，在杭州市工务局任副工程师兼测量队队长两年。在解放前进杭县任技正，解放后由于大哥积极工作，及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才需求，他先后任杭县水利工程师，水利股长，区水利委员会主任，及杭县一、三、四届人民代表，四届政府委员。1958年后调杭州市林水局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五、六届市人民代表，六届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常委，市水利学会一、二届副理事长，三、四届理事长，五届名誉理事长及市水电勘测设计室副主任等，是杭州市水利技术方面负责人，于1985年退休，在水利战线上前后奋战了36年。

大哥自幼木讷寡言，对己要求严格，勤于思考，钻研学问，孜孜不倦，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在事业上力求上进，一丝不苟。这些与家庭教育有密切关系。父亲王友风是仙居颇为知名的教育工作者，曾多年任中、小学教师。我们一家有兄弟姊妹八人，经济负担很重。大哥自高中至大学，一直以工读为主，在高中时每利用假日住在校中给学校做点事，

以求得伙食费的供应。他学习成绩优良，在测量技术中常有独特见解、有所创新。如测量技术中有一种叫三点法的计算，因条件关系不能检验测量中的误差，大哥创造了四点法，使测量中发生的误差可以校对，时年只18岁。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发现三角图根方差计算中的公式推导，采用高等数学，中学水平的学生不易领会，不能应用，大哥用代数上的待定系数法，对其作了推导，得到同样结果，从而改写了这一部分教材，使学生易于学习领会。

大哥在旧社会平日不善钻营奔走，因此不被重视，曾遭失业之苦。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正发挥大哥的才智。举凡堤塘抢修，涵闸圳坝兴建，培训人才等等，特别是防洪抗旱时，他都奋不顾身，战斗在一线工地，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直至完成任务，曾两次被用担架抬回，住院治疗。由于积极工作，深得群众拥护，在杭县时期，被选为人民代表、政府委员。

进入杭州市后，作为地区水利技术负责人，任务更为繁重。机关同事反映，大哥每月大半时间在农村跑，在机关时一进办公室，便埋头工作，从不喝茶谈天，略有空暇，便学习业务，翻阅资料。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大哥有译文、论文20余篇，或发表于杂志，或被情报单位作内部资料交流。这些文字大多在深夜中完成。由于工作认真、对事业的执著钻研，在科学技术上有多次发明创造，曾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市三等奖一个。如论文中关于重力坝的滑动稳定分析，把相沿至今用反复试算只能得到近似值的计算方法推进了一步。又如钢纤维钢筋混凝土梁的计算，提出这一课题的计算公式，比国外专家的计算方法、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实用性更强，这些都先后发表在国家公开发行的杂志上，并获优

秀论文奖。他的著作有1985年水利出版社出版的《钢纤维混凝土》一书，现已列入《中国学术著作总提要》建筑科学部份。

大哥在水利上的长期锻炼，技术全面，举凡水工程的设计施工规划及水文计算，均有独到之处。平生从事水利工程40余处，较大工程如淳安枫树岭水电站，坝高64米，大哥在设计阶段担任扩大初设组组长。该项目现已竣工。

大哥平日待人诚恳，对兄弟亦甚关怀爱护，我们兄弟姊妹众多，父亲王友风一生以教书为业，家庭少有财产，故教育我们要奋发上进。大哥身为长子，奖掖弟辈，起了良好作用，现诸弟等在新社会都有一定的事业与地位。如二弟王仁臣为美术副教授，工国画，其创作，已流入国外，外人以高价收购。三弟焕祥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亦有诸多科技成果，专纺织印染。四弟焕佑学炼钢，是山东钢铁厂高级工程师。五弟焕祐在仙居曾任乡镇企业厂长，为人精明能干，作风正派。小弟焕定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长于电算、结构力学，创造了立体多层桁架的计算，获建筑部劳动模范称号，我们兄弟的这些成就是党给我们创造了良好条件所致，在家庭中，父亲王友风的教育亦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培养了我

新疆电力设计院测量主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朱向明

我于1933年12月出生在仙居县原田市区李宅乡里坎头村。该村位于风景秀丽的“景星望月”东侧山下，蜿蜒小溪自南向北从村旁西侧流过，经谷岙至水口山并入永安溪。抬头是山，迈步是岭，山多地瘠，农作路远，童年就在这里度过。初小在本村（龙溪小学），高小在柯思中心小学，离家约五华里，每天走读，中午自己做饭，晚上打地铺寄宿，老师由学生轮流供饭，每学期都要轮到1~2次，1947年初参加全县会考毕业，同时考入仙居县立初级中学（现仙居中学），校址在山青水秀的南峰山，学费和伙食费都缴实物（米、黄豆、芋）。在旧社会农家子弟上学不易，山沟人更难，生活拮据，连拍毕业证书的照片时都要借别人衣服，校服靠母亲手纺织土布用野柴叶染黄做成，晚习用柏油灯，放假务农，锄草、挑粪、砍柴、放牧，以减轻父母劳累。由于本乡为游击区，离村数百米距谷岙望星桥就是国民党保安队防守处，本村是个拉锯之地，有人向国民党告密：朱中圣私通共产党。父亲买共产党粮被押李宅，敲骨吸髓。我眼看上学无望，但父母深知文盲之苦，为争口气，遂千方百计刻苦勤俭扶学，借钱给我上学。

刚解放时仙居无高中，我与同班几位同学一道赴临海考入回浦中学。我还同时考取振华中学和台师，乡亲们说：穷

山沟出秀才。但临海毕竟离家100多里路，各种费用较大，由于经济困难，高兴之余上学又趋为难之中，父母主张到台师读，因其免费且供伙食。我选择了当时勤工俭学的振华中学（后并入台中），边垦荒边学习。去学校时铺盖自己挑。而解放初临海境内太尉殿附近崎岖小路不时还有土匪出没，就是破烂衣衫小个子的我也提心吊胆。记得仙居同学有一次被劫持，幸亏被路过的解放军发现救回。记得在台中时缴不起学费时要辍学，后来老师给我担保得以继续就读，足见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和期望。中学时代一被一席手臂当枕，哪有蚊帐？可同舍都有，蚊子集中叮咬成疾，高考来临之际病危，校方立即送台州医院抢救，并及时通知父母，报名、体检都在病中办理。在大学，由于课程重学时多，学习过于繁重劳累，身患肺炎重病，又是校方帮助治愈，真是爹亲娘亲共产党最亲。

难忘的一夜：当时浙江只有少数几个考区，临海没有，台州划归温州，校方关怀备至，由同学陪送乘车到温州，我带病入考场，另外同学利用黑夜乘船偷渡（当时台州湾大陈岛被国民党占据）到考区。按预先约定考试最后一天在考场与兄相会，从山路接回，傍晚从温州乘小火轮，拂晓上岸经岩坦，翻越丛山峻岭的括苍山脉，带病的我在崎岖山路上难行，两腿发抖，傍晚下山时遇暴雨，小坑只数米宽，由于山洪，差几分钟过不去，但有人利用树枝摆过去，眼看对面村庄只好露宿祠堂，稻草当盖，饥寒交迫，兄弟俩靠身对夜，待天亮时发现身旁就是棺木，不寒而栗。又经翻山越岭，终于到丛山中数户小村远房亲友家住宿。艰难的旅程使人难以忘却，至今尤历历在目。只是那年国家正值教育改革发榜晚些，按第一志愿被录取在上海同济大学土木系。乡亲们说：

山沟出了金凤凰。父亲又送儿一程，带干粮翻苍岭，夜宿苍岭最高村时谆谆教诲：今天能送你到上海读大学，全靠共产党，不解放做梦别想，天下哪有农民子弟上大学。

上海，过去是冒险家的乐园，而今人民当家作主，学校对农家子弟新同学也格外亲，同学们享受人民助学金，困难还有照顾。当时适逢院系调整，为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才培养，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服从组织调配，从土木系改到测量系，由建筑土木设计师改当测量师，学习工程测量专业，两年内把本科主要课程学完，毕业分配时来不及回家，也没有想到留大城市。“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从南方到东北，走北闯南，先到哈尔滨建设101厂，后随单位南迁，在湖南建设601厂和株州冶炼厂，在156项中直接参加三项工程，现在又在西北边陲新疆扎根，从事电力建设，先后担任数十个较大工程的勘测负责人。1978年恢复职称评定时为本系统首批工程师，1988年经西北电管局评定为高级工程师，同年同济大学证明为本科学历。

近40年从事勘测生涯，没有做出惊人的成绩，到过祖国的许多地区，教过书，放过线，为工长和干校学员授课，过去搞施工测量，现在做工程建设前期工作。先在冶金部门，后在电力部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建设默默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先后获得水电部八五年颁发的“献身电力勘测事业三十三年荣誉证书”；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颁发的“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国家测绘总局颁发的“长期从事测绘事业荣誉证书”；八六年获“新疆电力局双文明先进个人光荣称号”。写有论文和总结，在《新疆测绘》1991年第3期上发表，编写能源部电力系统《电力工程勘测手册》专项工

程》第三章，将于明年出版。兼任省院联合会勘测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CAD鉴定委员；新疆测绘质协理事和诊断师；中国测绘资深会员。1988年入了党，1991年被编入《建筑勘测设计科技人名录》，三个子女都考上大学并获学位证书。总结过去的历程，我的成长全靠党的领导，同新中国紧紧相连，我决心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经济建设。

我的测量生涯

广西电力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沈在俭

我于1927年10月出生在原横溪区溪头村，1935年入溪头小学读书。1942年考入民生初级中学。后就读于安定中学高中部。因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我与一些同学和老师遭到开除和解雇。后来，我东奔西跑，分别到临海、温岭报考宁波高工和林业学校，被两校录取，我选择了宁波高工土木科，于1948年毕业。毕业后，我挑着行李狼狈不堪地从宁波，经奉化、新昌、天台，翻山越岭步行回家，参加农业劳动。

1949年2月，经人介绍，我赴宁波地籍整理处测量队任实习生，不到二个月即遭遣散回家。仙居解放后，我在正谊中学和附小任教。此间，仙居局势十分混乱，常有土匪骚扰。到1951年8月同学和老师来信，谈及技术人员归队的事。经有关领导同意，我到南京长江下游工程局测量队任实习生，完成南京防洪堤工程的长江河道大断面测量。9月，为支援淮河建设，我被调到治淮委员会工程部测量队。

翌年，为解决皖江两省在徐州段的水利纠纷问题，我负责测量出可靠的天文地理座标和地形图，参加和负责佛子岭水利工程的测量工作及为皖北其他工程提供各种测量资料。在治淮委员会的7年时间里，曾到过河南、安徽、江苏的许多地方，负责大中小水电工程数十项的测量工作。

1954年，组织上送我到水利部淮委办的测量理论干

部培训班深造半年。结业后到第四地形测量队任技术指导员。不久，我被评为队先进生产者，任技术员。

1957年，水利部调我到广州水电勘测设计院测量队工作，参加和负责海南岛松涛灌区坝址及雷州半岛运河工程的测量工作。1958年，我被调到广西勘测设计院工作，参加了西津、红水河等大型电站规划工程及广西17个大中型工程的测量工作；代表水电厅到龟石等水电站处理库区农村的搬迁问题；应自治区邀请参加全广西的一些测量项目的检查验收工作；编写《广西水利水电测量细则》；参加西津至柳州输电线路测量。

1970年，我因设计院撤消而被下放到武鸣县工作，1974年回到恢复后的设计院工作，主持大化、岩滩和合山等大中型水电站、火力发电站及各级送、变电工程的测量工作。1979年我被评为工程师。此后，经常参加各种鉴定会、技术交流会及审（定）稿会议。还当选为广西测绘学会二届、三届理事和常务理事及水利学会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88年被广西建委评选为优秀勘察和优秀设计项目特邀代表，并多次被评为设计院先进生产者。

踏遍千山万水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高级工程师 陈淳福

1930年，农历6月29日，我出生于仙居县清口园村。该村三面环永安溪，一面傍山，山青水秀，风景秀丽，离县城约10华里。家里世代务农。家有地1.5亩，租入水田一亩，养牛羊猪，家庭成员勤劳，生活尚可。父亲饱尝文盲之苦，我七岁时被送到本村私立环溪初小读书，1943年春考入台州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该校原来由临海迁入仙居石板路村，离我家五里。我读书较用功，成绩优秀。

1944年底同时报考仙居县立初级中学和台州农校，结果均被录取。选那所学校呢？仙居中学，每学期需交38斤大米作为学费，食宿书费全部自理，开支较大，但离家近，有困难很快可得到家庭照应。当接到仙居中学录取通知后，家父向别人借来38斤大米，作为学费。我挑米到学校缴费，总务科长打开袋子一看说：“这米太糙不白净，不能收，需拿白米来”。无法，将38斤米挑回家，心想这米还是借来的，你却嫌太糙，一气之下，将米还给人家。此时恰巧台州农校录取通知到了。该校是一所农业职业学校，每周有三个下午参加校农场生产劳动，每个学生发给35斤大米，不交学费，只交书籍费，住校只交菜金，这样比仙居中学省多了。只要有书读就行。就这样于1945年2月，进入台州农校初中部读书。该校生活比较艰苦，一般富家子弟，是很少入该校的。我初农毕业时，本校不招收高中新

生，需等秋季才招。为了能继续升学，父亲托人把我介绍到磐安县东山头村私立初小教书，半年400斤稻谷作为薪金。于1948年秋继续考入台农高中部，直到1949年11月毕业。

全国解放后，同学们纷纷参加工作，同班30多人，最后只剩下7人，正值1949年11月台州专署实业科拟在本校招收6名学生，参加台州专署实业科举办的兽医讲习班学习。我毅然决定参加该讲习班，从此开始了革命工作。学习结束后，直接为农民的猪牛治病，並参加工作组，去农村搞调查，减租减息等。为充实台州各县的农业科技和管理力量，我被分配到黄岩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工作。我以高度负责精神从事每项工作，开始为办事员，继为科员。以后科长抽去任土改工作队队长，科里各项工作由我负责完成。虽然当时我们机关干部报酬很低，心中却欣喜若狂。看到前程灿烂似锦，信心倍增。

1952年5月，是我职业开始转变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在全国抽调一批高中毕业或相当高中文化程度的在职干部升入高等院校，进行专业知识培养。5—8月全省抽调升学的机关干部集中，补习高中数理化基础课程，然后升入各大学。我认为国家最缺乏最急需的是地质专业人才，所以志愿升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地质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贵州西部赫威水五〇九队，担任第一分队队长，搞野外普查找矿工作。经过4个月的努力，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水城找到铅锌矿床，初勘设计，得到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的好评，並确定1955年转入勘探。11月，我被评为五〇九队劳动模范，出席贵州省首次工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12月，中央人事部、地质部，重工业部（即冶金部前

身)，联合发出调令，调我和其他5位同学到沈阳重工业部东北地质勘探公司工作。

1957年我被调到吉林省冶金研究所工作。1949年到1957年底，全国铁、铜、铅、锌、钨、锡、钼的涵量增长很快。但是对于上述主要金属矿床中伴生的稀有元素资源，则一无所知、涵量亦不清，综合利用无从下手。所以，地质部门对伴生的稀有金属元素打算进行查定和综合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开拓性工作，无现成的方法可循和经验可鉴，需要边研究边摸索。就这样我承担了该项工作的一个课题，任组长，有4名成员。对某铅锌矿稀有元素进行研究。自1958年4月开始至1959年2月结束，经过取样分选、分析、计算稀有元素涵量，取得成果。共计算出8种贵重稀有金属涵量，同时提出一套查定办法。该研究呈报全国地质资料馆，以“绝密”资料保存，同时受到吉林省冶金局高度重视，由冶金局长亲自主持，在铅锌矿区召开现场会。从此吉林省各地质队和矿山都开展了此项工作。1958年我被吉林省冶金局和吉林省冶金研究所评为先进工作者。1959、1960年又连续两次被评为吉林研究所先进工作者。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提高理论水平，1961年9月到1963年5月，我被送入长春地质学院进修两年。

1963年6月，我担任课题组长，对某矿的闭矿问题进行研究。该矿开采已有百年历史，1962年勘探队作出了全面论述闭矿的报告，并经该队上级机关批准。当课题组进驻时，该矿的设备已经有一半拆迁运往他矿，同时大量地裁减人员。面临宣判死刑的该金矿，研究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我领导全组人员，经过极其艰苦的深入调查研究，于

1964年4月提出两组构造成矿规律，进一步圈出五处成矿预测区。某勘探队自1964年夏天开始验证，至八十年代，在五处预测区验证结果，全部见矿，使一个宣判死刑的金矿，变成全国特大型金矿之一。

我于1964年1月被提为研究所第一研究室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主持行政和技术领导工作。1965年1月成立中国黄金矿产公司，吉林冶金研究所改为长春黄金研究所。8月，中国黄金矿产公司任命我为“地质工程师”，仍主持第一研究室工作。

1966年4月，我因病住院，7月份出院回到家里时，“文革”已经硝烟四起，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和迫害。直至1968年解放军进驻研究所以后，我才恢复了工作。

对于金矿床的研究，较其他各种矿床难度大得多。除少数金矿床肉眼能见到少量自然金矿物外，多数金矿床中自然金必须借助显微镜才能窥见。但显微镜不能准确得知化学成份。为了既能观察到自然金，又能知其化学成份，我提出研制“液体激光显微光谱仪”，于是我担任研制组组长，负责组内全面工作和激光及显微描准工作，全组由5人组成，协作单位为科学院和长春光学仪器厂。自1971年2月开始，至1972年5月研制成功，由我编写成果报告。使用后效果极佳。例如，某铜矿中的硫铋铜矿，14年来被错误地定为辉铋矿，使用该仪器仅一次，就准确地定出名称，真是如虎添翼。1973年夏，国家科委指定将该仪器送广州参加“全国激光仪器展览会”展出，直到1976年才运回长春，后定名为“YJGI型激光微区光谱仪”，并投入小批量生产。1977年12月，冶金部授予重要科技成果奖；

1978年4月，吉林省委和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授予该研制组为省先进集体。

1973年12月，冶金部委托长春黄金所和昆明贵金属所，召开全国贵金属科研会议。我为贵金属资源组组长，由贵金属所、广东有色院、桂林矿地院派人参加，调查全国贵金属资源。1974年1月，我代表资源组报告全国贵金属资源调查状况，並得到好评。以后还发表一篇题为《我国金矿成矿地质特征》论文。

1974年11月调往冶金部第一勘探公司工作。

冶金部第一勘探公司主要工作地区，是内蒙集宁——二连铁路线以东，直至满洲里。面积65万平方公里（相当6个浙江省的面积），对去各矿种、各矿区、各勘探区和普查区，都是孤立的，互不联系，为了全面掌握情况，了解不同金属矿床有不同的成矿带，能直接指导找矿、勘探和科研工作，我们自1981年2月份开始编制“内蒙东部金属矿产图”及说明书，用一年时间，完成该项目。由于全部矿床都标有大、中、小规模，所以该成果为机密级的。完成后经冶金部专家审定，认为质量较好，既为普查、勘探、科研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又能起战略指导作用，被冶金部评为三等奖。当1983年获奖时，我已调到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工作了。

至1983年我已逐渐趋向老年。经过几十年拼搏，所获得的实际经验，需要经过系统总结，上升到理论。以这种有关实践作为根据的理论，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想将这种知识传授给下一辈。年初，我被调到桂林冶金地质学院任教，担任矿床教学工作，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尊敬。

1983年，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成立，由我负责翻译

和出版西德的《偏光显微镜原理、仪器和应用》一书，向全国各系统地质测试部门发行，该书是一本先进的工具书。新书上市一抢而空。1988年，我被聘为高级工程师。

1989年5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技局聘请我为总公司系统的“科技成果奖评审委员”，承担总公司地质系统科技成果奖的评审工作。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今年7月已年满60岁，宣告退休，但我打算在有生之年继续发挥余热，为冶金地质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誓为四化建设贡献毕生

张崇法

一

1922年我出生于仙居县城的西张。祖辈耕种为生，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弟弟、妹妹和我——一家7口，生活尚可自给自足。父亲年少时随祖父下田劳动，后来改农从商。我婚后，几代同堂，省吃俭用，生活可以维持。

我五、六岁时上学，15岁时考入杭州大陆高级测量学校，1938年毕业后，做了3年测量技术工作，又在仙居县田粮处干了2年事务性工作。

1938年，父亲因患肺结核，过早辞世。祖父于1946年年迈而终，化了大量医药丧葬费，因而家庭经济拮据，又因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衰颓，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个人收入微薄，家境每况愈下，困顿不安，有了对三座大山压迫的感受，萌生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1946年后，我在家务农，体验了生活的困苦和劳动的艰辛，养成了艰苦持家，不畏苦难的性情。

二

1949年秋仙居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先后在县粮政科、中粮公司等单位干了3年的临时工作。1952年末考入中央燃料工业部华东煤矿管理局，分配在地质勘探处测量

队，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工作的岗位，成了地质队伍中的一员。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就随测量队跨进了山东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区，到蒙阴汶南进行地形测量。第二年，即1954年，调地质队参加新汶矿区野外地质调查，正值隆冬季节，我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

在艰苦的环境里，在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敢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以青年人的热情和上进精神，刻苦钻研地质技术，翻阅书刊资料，力求尽快提高自身业务素质。1955年初，上级抽调我到北京燃料工业部煤矿地质勘探总局，向苏联专家工作室报到。当时，新中国地质事业刚开始起步，在地质领域方面，勘探方法、地质制图还缺乏研究，在依凡诺夫专家的指导下，根据专家的手稿，绘制了苏联专家建议的标准图纸一套，共20余张，介绍煤田地质勘探方法和地质报告图纸的编制，经过艰苦奋战，及时地完成了任务，在全国地质勘探会议上得以推广。

1956年，我调到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分配在局总工程师室，1956年至1957年间，主要参加野外地质调查，协助地质勘探队编制地质报告，参加了徐州青山泉煤矿、安徽淮南谢家集煤矿等地质报告的编制，在几个月的工作中，真是不分昼夜，经常通宵达旦倾注在平面图、剖面图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全副精力专注于曲线、直线的世界。又接受局长的布置，在吴光荣总工程师的指导下，对山东省的煤田地质资料进行研究分析，编制了山东省煤田远景规划图，为山东省煤炭工业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决策的参考。图中特别预测了山东西部、鲁西南—兖州、滕县、济宁等地下资源可能十分丰富，是很有希望的重要含煤

区，这和现在的勘采事实是基本吻合的。

三

1958年煤矿管理体制改变，我被调到山东省大力开展地质科研，编制煤田预测图，山东省抽调了10多名技术人员，指定我负责主编。这是一项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紧锣密鼓的干了1年，完成了一份内容翔实丰富的资料，计有1：20万山东省煤田预测图、1：20万山东省煤田地质图、1：50万大地构造图、1：50万煤种煤质图、地层对比图、地质剖面图、地层综合柱状图等，并附有详细的地质说明书，这项成果受到了煤炭部和山东省煤管局的嘉奖。

1959年，煤炭部集中各省地质人员，汇编《中国分省煤田预测图》图册，部里责成我负责山东分幅的编制，并兼华东分组组长。图册完成后，煤炭部钟子云副部长聘请有关地质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家进行评审，得以通过，正式印刷，内部使用。

四

1960年，山东省煤管局提升我为工程师。

1961年，地质界老前辈中科院学部委员、煤炭部地质总工程师王竹泉同志和地质司赵静涛司长电召有关省局地质总工程师和主要技术人员，组织编制《煤田地质标准图例》，并指定我负责主编。经过数月紧张的辛勤劳动，三易其稿，由有关科研单位专家审查通过，经煤炭部批准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统一发行。

1964年华东各省煤管局合并，成立华东煤矿总公

司，我被调到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参加安徽宿县东部和山东兖州矿区地质大会战，我负责参与指挥部的资料研究分析和指导地质图的编绘工作，为会战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

1965年底，公司成立制图印刷厂，该厂主要承接印刷华东煤矿系统的地质资料，由我负责生产调度和技术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厂领导班子靠边站，我也下到车间劳动。

1971年，煤炭、石油、化工三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华东煤炭总公司撤销，制印厂调迁河北保定，归属石油六四六厂（即现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恢复了我的技术负责工作，并兼理全厂的生产调度。

1973年成立煤炭部地质局，徐州建立地质普查大队，我调到普查大队任生产技术组组长。

1975年普查大队筹建制图印刷厂，大队指派我为筹建负责人，经对多方努力，合理调度，到1978年完成了设备的购置、机器的安装和技工的培训，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作业线，开始承担印刷任务，并面向全国服务。

在普查大队制印厂的历史上，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制印设计工作。1979年我在制印厂担任生产技术负责人时，承接了新编华东区煤田预测图7种图纸资料的印刷任务。其中特别是煤田地质图的内容复杂，要求印制颜色多、色层多、精密度高，制版印刷操作难度大，还缺乏工艺设计的经验和操作实践经验，然而任务紧急，势在必行，我们根据《中国地质图》的印刷成图和国外资料，畅开思路，大胆

探索，通过数十次的摸索、实践、总结，终于攻克难关，完成了多颜色、多层次、高精度、高质量的地质图。

六

1983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今年我已69岁，虽年事已高从第一线退休下来，然而心系事业，还得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让余热充分发光。

在铁道线上奔忙

通化铁路分局副总工程师 张光央

我于1924年3月出生于仙居县埠头乡十都英村。1937年考入浙江省立杭州中学，因日寇侵华、抗战爆发后就读于仙居民生中学、仙居中学、黄岩中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最后，1944年2月我在黄岩高中毕业。1944年2月至1945年8月先后在仙居县简易师范及仙居榆溪小学任教员，1945年8月考入北洋工学院及浙江大学，最后选择了北洋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后并入英士大学），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同年6月进入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班。学习结束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志愿报名由中共华东局分配到东北局，再由东北局分配到哈尔滨铁路总局。1949年9月再分配到吉林铁路局工务处任工程师。1954年3月至1962年3月任吉林铁路工务段段长（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1962年至1970年2月任吉林铁路局线路科长。1970年3月至1978年6月下放通化铁路分局劳动，实际上在搞工程、设计及组织领导施工工作；1978年7月至1980年6月任通化铁路分局工务科长。1980年7月至1986年12月任通化铁路分局副总工程师。曾连任三届通化市政协委员。

建国初期在原吉林铁路局，为重建被破坏的铁路做出成

绩。曾推行苏联新技术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先后总结出版了《吉局捣固法》、《枕木养护法》、《养路半机械化捣固法》、《道岔综合维修法》、《垫砂起道法》等並推广到全路；组织吉林局第一个养路机械化工队；在严寒地区最早进行了无缝线路及整体道床等新技术试验，为提高中国铁路线路养护维修质量作出贡献。在任吉林铁路工务段长期间作为推行中长铁路经验的基点单位，对提高全局工务经营管理水平贡献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我个人政治生命处在最困难的时刻，不让我参与领导管理工作，但我还是主动负责去设计並施工 16 个站场扩建；新建车站及客技站工程各一处；梅集干线落坡改线及大站驼峰线工程各一处以及 10 多条较大专用线新建工程，直接为铁路建设服务为扩能做贡献。在通化铁路分局期间使设备质量由吉林局最差而变成最好。因此先后获吉林局、沈阳局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知识分子称号。

1987 年初离休后，我即当选为通化铁路分局科协常务副主席並兼任科技咨询服务部负责人，这期间组织並直接参加 37 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项目，创经济效益达 2 亿 2 千多万元。其中获吉林省优秀咨询项目特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因此，四年来连续被通化市、吉林省科协评为科技和科技咨询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並于 1989 年荣获了中国科协颁发的科技咨询扶持中小乡镇企业工作先进个人“金牛奖”。

历经坎坷路 拳拳报国心

——记浙江省建材设计院主任、高级工程师王东章

胡铁云

1991年10月17日，在浙江省建材行业微机推广应用研讨会上，有位衣着朴素、头发过早谢顶的中年人健步走向讲台，宣读他的题为《微机在浙江省建材行业中应用及发展趋势》的论文。他的发言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会后，大家翘起大姆指向他祝贺：你写的论文看得见、用得着，这样切实可行的论文，我们佩服。

他，就是浙江省建材设计院主任、高级工程师王东章。

王东章今年只有50多岁，由于他过度地操劳，两鬓白霜。额头上深深的皱纹，记录着他辛勤耕耘的实迹；满脸亲切坦诚的笑容，显示出他无私无畏和乐于奉献的宽广胸怀。是什么力量使这位科技人员的生命放射出如此灿烂的火花？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请教这位德高望重的高级工程师。在我们一再请求下，王东章激情满怀，感慨万千地追忆了他30多年来令人感动的某些片断。

王东章出生在仙居官路镇石井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从小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1957年毕业于台州中学。当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他准备入学之时，父母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王东章也被无辜牵连而取消了入学资格。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王东章并没有从此消沉。他面对现实积极参加当地白岭脚水库劳动。在劳动中他早出晚归，挖渠挑土，开山放炮，样样工作干在别人前头，并为水库工地办了许多实事，受到了工地指挥部的表彰和奖励。

第二年，当地干部和群众一致推荐王东章再次报考大学。这一年，他果然不负众望，又以遥遥领先的高分被录取第一志愿——浙江大学化工系自动化专业。在大学的5年历程中，王东章仍然牢记自己是个农民的儿子。在校期间，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学习上惜时如金，分秒必争。他是全校品学兼优的佼佼者，被选为校学生会劳动委员，在修建半山钢铁厂的铁路工程中，他被评选为劳动积极分子受到了表彰。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3年，全校要在300多名毕业生中，挑选两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国防单位工作。王东章就是其中的一名。他满怀献身国防事业的豪情壮志，走进了二机部第一设计院。从此，王东章与核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当我国核工业起步之时，苏联专家撤走了。他们带走所有的技术资料，给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是迎难而上，还是止步不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王东章和一批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当仁不让地挑起建设核军工272厂的重任。在此期间，他刻苦钻研，虚心请教，进步很快。经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摸索，王东章便能独当一面地工作了。

1967年初，不到30岁的王东章便已在核工业战线上小有名气了。那一年，国防工业要在广西、湖南、贵州三省选择核工业生产最佳厂址。这项工程投资5000万，年

处理矿石40万吨，对三线核工业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组织上任命王东章为这个项目工程设计总负责人。

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王东章先示范，带头实干，处处表现了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1966年底，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只有几天，工地急需他回去，有人劝说他这次回家怎么也得过个团圆年再走。王东章看着产后虚弱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婴孩，何尝不想在家多住几天，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呢？可是，在公与私的天平上，老王还是说服了妻子和亲人，提前返回工作岗位。

在项目建设的日日夜夜里，王东章身先士卒，一心扑在工作上，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1968年冬季的一天，为了摸清地下水源情况，他第一个下到100多米深的大溶洞实地勘察。这个洞奇形怪状，传说洞内有毒蛇猛兽和鬼怪，且从来没人下去过，王东章却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一马当先进入此洞。洞内不仅寒气袭人，而且臭气难闻，洞顶支离破碎，随时都有塌方的可能。尽管如此，王东章和几个探险者连续四次下洞，每次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终于把洞内的水文地质情况搞得一清二楚，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赞扬。

王东章常年工作在交通闭塞的贵州山区。那时，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市场上很难买到农副产品。一次，他部下的一名队员买了几个鸡蛋，被说成不割资本主义尾巴，而责令王东章写出深刻检查。在此期间，由于营养的严重不足，王东章得了乙型肝炎。但为了工作，他还是日以继夜，奔波于广西、湖南、贵州三省，或徒步勘探，或乘直升飞机在空中察看，从中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撰写整理出厂址选择报告和有关重要文件资料，及时上报国家计委。并于

1968年12月，带领有关人员向国防办主任张爱萍、二机部负责人、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等有关领导汇报。王东章以翔实的资料、精确的数据，胸有成竹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赞扬。最后，大家一致通过在乌江边建立厂址，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为确保水源不受污染，王东章又陪同有关领导，多次风尘扑扑地跋隘的山寨留下了他深深的脚印，洒下了他爱国爱民的汗水。经多方面努力，终于把污水排放到乌江下游100公里无人取水的地方。为保护自然环境和保证人民群众卫生饮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建设276工程的日子，王东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身体力行、带头实干的可贵精神，受到国防部张爱萍上将等领导人多次赞扬。这项工程被评为国家级优秀设计奖、先进工艺流程一等奖。初战的胜利，并没有使他陶醉。每一个工程完毕后，他来不及洗涤身上的尘埃，又马不停蹄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漫长的22年工作中，王东章象一头默默无闻的老黄牛，在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乐于奉献，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除了任276工程总负责外，他还先后负责、设计、审核验收了许多高效、优质工程。如广东翁县七四厂，江西721—20厂，广东、四川、新疆等许多省市自治区工程。在这些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中，充分显示出他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和敢作敢为的开拓精神。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在22年工作中，王东章获国家级优质工程设计和厂房验收一等奖4次，二等奖7次，三等奖19次。1985年底，核工业部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对他为国家核工业做出的贡献进行了肯

定。

1985年，王东章被调到浙江建材设计院，被任命为主任，高级工程师。他身居要职，却处处以普通公仆的身份严于律己、不徇私情、勤奋工作，为发展我省建材事业，他不顾个人年老体弱，仍然保持和发扬过去那么一股热情，奋发向上，勇于拼搏，深入全省各地调查研究，把科学技术送到边远的山沟村寨，为他们发展建材事业排忧解难。近年来，王东章撰写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分别在全国和省级报刊上发表。1988年，他被聘任为浙江省自动化设计专业委员会委员。

王东章这个离开家乡30多年的游子，对家乡仍然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曾为家乡发展建材事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他说，今后家乡建设用得着他的话，他一定会乐意报效，全力以赴。

甘当绿叶扶红花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李汝火

1936年圣诞节的前夜，我出生在仙居县大战乡峡岭坑村的一户贫农家里。我们村的土地大部份位于山坡上，非常贫瘠，产量极低，亩产不到外村的40%。全村只有四十来户。祖父留下的只有两分田，父亲租了十几亩田，还常出去打短工，辛勤劳动一年也不够我们全家六口人吃的，尽管母亲很俭省，也常常上顿不接下顿。每到青黄不接时，都要借些粮，或吃些麦碎粥，只有秋收时，才能吃上几顿饱饭。村里没有学校，大部分人是文盲。经济状况稍好一点的人家，也想叫儿子读书，就是没地方读，只好到五里以外的“格洋堂”去。去格洋堂要经过“车头村”。车头地主多，地主的孩子们看见我们“山头人”就要欺侮，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敢去。村里一些有点志气的人也实在忍受不下去，都觉得越是没有文化，越要受人欺侮。为了使下一代能识几个字，在人家面前能抬起头来，1944年村民们在祠堂里办起了“民办”小学，请本村一位读过几年私塾的人当教师。小学里各个年级都有，大家都坐在同一厢房里，老师念完课文就去干活，学生们也是边念书边放牛、干农活，就这样我度过了五年的童年学习生活。1949年，因仙居县社会混乱，土匪横行霸道，我的启蒙学校被迫停办了。我辍学在家务农，不久仙居就解放了，我才开始过着美好的生活。

解放后，我当上了村文书，参加了斗地主、土地改革等

等一系列群众运动，还参加了扫盲工作。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碰到了重重困难，所以又萌生了求学的念头，决心学好本领，更好地报效祖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952年春季我考上私立临海回浦中学。从我家到临海有一百里路程，要走一天。在回浦中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品学兼优，二年半的初中学习，三次得到学校甲级学习优秀奖。1953年加入共青团，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1954年考上台州中学高中部。1957年考上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机械专业。1958年化工系成立硅酸盐专业，我在新专业学习，经过五年，于1963年毕业。在高中与大学期间，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大学期间，除学好36门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选修了日语，自学了俄语和德语，一般的科技文章能看得懂。

1963年我被分配到东北建筑设计院，正遇上大力加强技术情报工作，于是把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派去搞科技情报，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不愿意搞情报，认为我是学技术的，而情报是为别人服务，只是技术工作的后勤，而且各行各业的技术都要通晓，知识量大，更新快，实在受不了。但静下来仔细一想，觉得我能有今天，是党的功劳，是人民用助学金把我培养成的。要不然，现在还不知是哪个地主家的长工呢。所以我该学习雷锋，一切听从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甘做绿叶扶红花。那时，国家规定新毕业的大学生要下基层劳动锻炼一年。1964年我去北京塑料制品厂跟班劳动，在空余时间收集一些塑料建筑材料方面的技术文献。1965年在北京参加我国轻质建筑材料的第一个引进项目——北京清河加气硅厂的设计翻译工作，并收集了塑料屋面瓦及硅管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汇

编成专题技术资料三册。

在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期间，我也收集了不少国外的技术资料。1972年翻译了日文《粉体输送技术》一书，约30万字，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正式出版。

八十年代，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遵照“洋为中用”的原则，我更加如饥似渴地收集大量对我国建工、建材行业有用的国外先进技术资料，每年出的资料都在10万字以上，为我国建工行业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贡献了一点微小的力量。如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日本为修建青森到涵馆的海底隧道即青涵隧道，打破了传统的砼生产工艺，发明了一种叫做“水泥裹砂法”的先进搅拌工艺，不仅大大地提高砼的性能和施工质量，而且还能节约30%左右的水泥用量。我一发现这种先进技术，就大量地收集这种生产技术及设备，在《施工技术》等全国性著名刊物上连续发表有关文章，并汇编成册，印出《水泥裹砂砼的工艺、性能及应用》专题技术资料四册，这些资料被设计院评为“优秀科研论文”。此后，水泥裹砂砼技术很快在全国推广应用，可以说，这是砼搅技术的一次大的革命。

八十年代，能源紧张、电力普遍缺乏。1986年因节能的需要，我编译了《电气节能技术》一书，约65万字，1987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外文翻译95%由我完成，并结合我国情况，编辑而成。

美国著名建筑师约翰·波特曼推出的新型建筑——中庭建筑，即在城市的商业大厦及高层宾馆的中心部位直通天顶的巨大共享空间，在空间的顶部设玻璃采光屋顶，在底部种植树木，设置水景及休息用咖啡茶座，在中庭四周各楼层设回马廊或平台，栽种花草形成立体绿化，有的中庭还设观景

电梯，使与自然隔绝而深感烦恼的城市居民能享受清新优美的人造大自然风光。七十年代后，这种建筑在外国已成为城市高楼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末国外开始普及。我国也开始设计这种建筑。不过要设计好，还需要解决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特别是防火问题，不是一般建筑师都能轻易解决的。为了系统介绍这种建筑，我根据美国的《中庭建筑》和日本的《建筑技术》编译七篇“中庭建筑”的文章，其中五篇连载在《新建筑》杂志上。另一篇《中庭建筑的防火安全设计》被建设部评为优秀论文。

由于我积极肯干，成果显著，八十年代四次被评为设计院先进生产者，两次受到奖励。八十年代初，建设部开始评定职称，我被评为工程师，1987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几年来，我在近十种全国性学术刊物如《施工技术》、《建筑技术》、《建材工业信息》等等发表了将近40万字的译文或编译文章。因此《施工技术及建材工业信息》特约我为通讯员。1991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建筑学会正式成立。由于我积极参加学会活动，介绍国外建筑界的新动态，对发展我国建筑技术，提高设计人员的理论水平有一定贡献，学会吸收我为会员。今年开始，学会创办小报《辽沈建筑师》，报导学会活动情况及国外建筑动态，特聘我为编辑。

皮革专家张 扬

中国早期皮革大师张铨之子张扬，祖籍仙居城关西门村。他于1929年4月20日出生在杭州市的外婆家中，满月不久即随父母回北京燕京大学校外冰窖胡同7号父亲的私宅生活。在燕京大学附小毕业后，张扬随母亲和弟弟于1940年6月去天津乘船经上海去香港，7月份父亲到香港后一家人经海防（越南）老河口、昆明、贵阳、重庆，于11月份到达成都。中学先后在济川中学（现在的16中）和华西协合高中（现在的13中）就读。1950年7月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二年后随父亲调至泸州市四川化工学院建立皮革专业。1954年化工学院并入成都工学院（1978年改为成都科技大学），1956年夏迁回成都，从此定居成都至今。1956年11月至1981年5月他担任成都工学院、成都科技大学皮革专业讲师，其间（1957年～1960年）完成成都工学院皮革专业研究生学业。1981年5月，他被评聘为成都科大皮革专业副教授，7年后的6月份，又被评聘为科大皮革系教授。

张扬学承父业，从事皮革专业的教学科研40多年，培养的学生遍布除台湾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其中很多人在事业上颇有成就。

十年动乱前，张扬作为父亲的助手，经常带学生生产和

毕业实习，辅导工艺学课程，指导毕业论文，开出制革工艺概论、制革工艺学、皮蛋白质化学等课程，写出了许多讲义。科研方面主要从事铬——植结合鞣法、铅盐鞣革、鞣革快速理论、土法制红矾等研究，发表论文8篇。1956年冬他被吸收为九三学社成员。

“文革”时期，皮革专业一度被取消。1972年恢复专业后，张扬重返教坛，到企业搞科研，开始皮革化学品的学习与研究。1974年在合肥制革厂参加酶脱毛制革新工艺及氨基树脂鞣剂研究。1977年在合肥进行多金属鞣制剂等研究，完成报告、论文4篇。参加编写书二本，其中《黄牛皮革酶脱毛新工艺》研究获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

三中全会后，科技的春天真正到来，是张扬从事皮革事业的鼎盛期。父亲张铨博士和另一位老教授的相继去世，使张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亲自动手编写教材《皮革化学及工艺学》（第1、5章），为学生讲授皮革化工材料课程，先后给研究生开出“胶原化学”和“制革化学”、“专业英语”等课程。从1979年到现在，经他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已有8人毕业，4人在校。这些毕业生被分配到上海皮革研究所、化工部成都有机硅中心、中科院成都有机所等单位，都已成为皮革化学品制革工艺研究的骨干。

尽管教学工作十分繁重，张扬的科研成果仍十分卓著，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皮蛋白的接枝改性研究。他的《胶原硬组织改性研究》获1983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从事大量的医用材料的基础研究工作；进行“明胶接枝改性”、“羽毛蛋白接枝改性”的研究。这是四川省、国家经委“八、五”

皮化材料攻关课题，现已取得重大进展；从事胶原与丙烯酸类单体接枝共聚研究，这是开发皮革复合材料的新方向。

二是皮革化学品研究。在聚合物复鞣剂、芳族合成鞣剂方面，张扬与高分子化合、有机化学教师合作开展系列研究。他主持的“CAR型丙烯酸树脂复鞣剂”研究是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已在4家化工厂生产，并在国内很多制革厂应用于高档革、白色革生产。其研究成果获国家教委1991年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三等奖。1982年开始，张扬担任成都地区皮革化工产品协作组顾问，带领成都市化工局和有关工厂的同志到国家科委、化工部争取项目，在成都建立皮革化工材料应用中心。他还积极为化工厂、有机化学所的同志讲课，指导亭江、泸州等皮革化工厂生产，规划四川省皮化材料发展等等，为四川省成为全国的皮革化学品科研、生产基地作出重大的贡献。1984年张扬担任精细化工学会会员以来，主持筹备了两届全国皮革化学品学术讨论、技术交流会（1989年和1991年），对全国皮革化学品的开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制革工艺及应用理论研究。1988年，张扬承担了国家“国产化13条龙”之一的“运动鞋生产国产化”一条龙的子课题“用国产皮化材料生产黄牛软面革”的研究，现已被列为1992年国家重点推广项目，在山西省的临汾、曲沃两家制革厂推广生产；1991年，张扬承担了四川省“八·五”攻关项目“高档猪箱包革研制”和“筛选国产皮化材料生产白色猪软面革”两个课题，分别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应用理论方面，《AP丙烯酸聚合物复鞣性能研究》论文获1989年中国化工学会优秀论文奖，并被同年10月15日在美国费城召开的国际皮革工艺学家和化工

学家联合会第20届大会选中，在大会上宣读并收入学术论文集中（英文）。这期间，张扬共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其中《合成加脂剂》获四川省科协1986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除了大量的科研论文外，他还出版了许多专著。如《制革技术革新》（1978年3月轻工出版社出版）；《国外皮革工业概况》专题介绍（1975年9月中国皮革工业科技情报站编印）；《皮革化学及工艺学》（部分）；《世界精细化工手册（续编）》（1986年化工部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篇》皮革用化学品项等等。

张扬教授曾多次出国考察。1984年他代表成都科大参加轻工部组织的皮革科技考察团考察有关大学、中专、研究所和生产皮革化学品的化工公司；1986年考察香港中文大学；1988年再度赴港参观香港皮革博览会；1990年赴西德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带回了许多样品与样本；1991年赴新加坡考察一家大型皮革生产公司等等。每次考察，都有重大收获，回来后积极撰写文章，把外国的经验介绍国内的同行，促进我国皮革事业的发展。

张教授除了教学与科研外，社会事务也很繁忙。他是成都科大与广州市人民制革厂创办的《皮革科学与工程》杂志的主编；轻工部皮革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轻工学会皮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工学会精细化工学会会员；四川省皮革学会理事、名誉理事。

自1983年1月始直到目前，张教授连任四川省政协第五、六两届委员。

现在，高大、爽朗、健壮的张扬教授仍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继续为我国的皮革事业不断作出新贡献。

（编者按：张扬教授的父亲张铨先生的事迹，《仙居文史资料》第二辑曾以《现代制革专家张铨博士》为题作了介绍。张铨（1899—1977），字克刚，仙居城关西门村人，一级教授，是我国现代制革事业的前驱和宗师。张铨192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7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1941年发表重要论文，为发展植物鞣革科学作出重要贡献。解放后任华西大学化学系主任兼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化工学院皮革研究室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林业部植物鞣料研究室主任、高等院校皮革工艺专业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负责筹建了新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皮革、毛皮及鞣皮剂专业。1959年率中国皮革专家组赴莫斯科参加学术交流会议，宣读了《中国皮革涂饰剂生产、应用和研究的概况》的论文，博得各国专家赞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吴 巍整理）

为石油工业建设奋斗终生

绍兴市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郑纪明

我于1926年8月9日出生在仙居县步路乡西炉村，父亲郑锦耀是农民。当时家庭经济条件尚好，幼年生活优裕。四岁时父亲病故，9岁母亡。此后，少年生活辗转于亲戚中，后三哥接我回家，并由他供给学习费用。童年的艰苦历程，使我懂得了生活艰辛，立志求学，决心奋进。

小学在仙居安洲小学度过。初高中就读于台州中学，因日寇入侵，学校一度迁至临海县显恩寺和张家渡。抗战胜利后迁回海门。1950年高中毕业，为了继续求学，于同年考入石油管理总局办的石油中级技术人员培训班，学制三年，10月赴锦州学习。1953年毕业。

为迎接苏联专家的援助，培养懂技术的翻译人员，石油管理总局选送我校四名同学（我是其中之一），到北京外语专修学校学俄语。1955年底毕业，回石油工业部专家工作室工作。

1956年为我国第一套润滑油生产装置能胜利投产，并能生产出高质量的各种润滑油，邀请了苏联润滑油专家凡尔特别达夫来大连石油七厂的高级润滑油车间工作。

对年轻的人民中国来说，润滑油生产还是一片处女地。再说，润滑油生产较其他油品复杂得多。翻译工作中不仅要传递双方的意图，学习专家的技术，生活上还要给专家以帮助和方便，维护中苏友谊；同时又要无损中国人民的形象和

独立自主的尊严，因此要求很严格。在和苏联专家近二年的共事中，我学习到不少知识。通过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我国广大石油工人的奋发努力，建立起自己的润滑油生产工业，结束了依靠外国进口的处境，并为后来生产更多更好的润滑油创造了条件。

嗣后中苏关系恶化，1957年开始撤走苏联专家。我于1958年调到北京石油研究院二室搞润滑油研究工作。为配合在国庆十周年发射人造卫星“东方一号”工程，我们研制成功数种凝固点在 -80°C 的高级润滑油，于1959年向国防部献礼。1961年为了支援内地建设，我被调往成都市石油工业部四川设计院。

1964年至1965年我参加四川南充炼油厂的扩建工程设计，先后完成了从川中原油的渣油中生产80#地蜡的62—2工程、润滑油白土精制装置和酸矸精制等装置的设计和建设，为川中原油的利用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1966年后，文化革命开始。此时，人心浮动，生产停顿。我和数十位同志到威远脱硫一厂工地搞现场设计。这是一家我国首次自行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天然气脱硫厂。当时，我们缺乏技术资料和设计数据。经短期试验，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终于按时完成设计。我负责克劳斯硫磺回收装置的设计，经试运转硫磺回收率达80%，其纯度为99.99%，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1971年前后，为了四川的气田建设，我率三、四十名设计人员，参加威远脱硫二厂的现场三结合设计。该厂具有处理能力较强的脱硫装置、相配套的硫磺回收，及水、电、汽等辅助设备，是我国第二座大型天然气脱硫厂，其脱硫采用先进的溶剂，吸收塔和解吸塔引用高效的浮线塔盘，与

同样塔径的设备相比，可提高处理能力约30%。经半年多的奋战，顺利地完成任务，于72年交四川油建一大队施工。经过近二年的建设，于74年底起进行数月的试运转，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其后转入正常生产。

威远气田两座大型天然气脱硫厂的建成，为我国气体脱硫工业建设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积累了设计建设经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天然气和各种石油气体的脱硫工业先进国家之一。为此，获得了全国第一届科技大会的奖状（集体）。

1959年为了提高基础理论知识，我考入北京石油学校炼制系（夜大）本科，学习系统的理论知识。经5年边工作边学习的不懈努力，于1966年毕业。

1976年参加石油工业部《气田防火规定》编写工作。我负责起草天然气净化工厂部分，历时近半年。经数次修改、审批，已正式出版，发全国试行。同年，为系统地总结气田建设经验，满足天然气开采、净化、储运职工和技术人员的学习需要，及为设计工作者提供计算方法和设计参数，四川石油管理局组织编写大型工具书《天然气工程手册》。我负责编写第六章，即《天然气净化厂工艺过程计算》，约15万字。在该章中详尽地叙述了天然气净化厂各装置的工艺过程和原理，各工艺设备的计算方法，以及较切合实际的经验数据。这些方法和数据均在四川气田的大型生产性装置上经过考验、证明，能满足生产要求。

1978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调浙江省绍兴市石化厂筹建处，参加扩初设计。后由于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该工程下马，1979年初转到绍兴市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化工所工作，任副组长，参加聚乙烯（PE）高发泡泡沫塑料的研制。历时三年许，小试已通过省级鉴定。1981年被授

予化工工程师称号。1988年晋升为化工高级工程师。

在35年的工作中，如果说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一点成绩，那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我只是尽了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我于1987年退休。因身体尚好，精力充沛，愿再为祖国建设贡献余热。

心，永远憧憬着明天

——尹相泉和他的事业追求

管 乐 张良铎

尹相泉何许人也？对此，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对许多人，特别是那批股票投资者和那些对股票投资跃跃欲试的人们来说，恐怕没有一人不知道“凤凰化工股票”。事实上，尹相泉与“凤凰化工股票”密不可分，因为，他就是“凤凰化工股票”的创始人——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漫长的三十年，他为振兴我国的日化工业上下求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业绩，登上了一个又一个荣誉的阶梯，他曾先后荣获轻工业部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称号，轻工业部劳动模范、浙江省优秀企业家称号，是浙江省十位“万人赞厂长”之一。这是党和人民对他业绩的肯定，然而这个心永远憧憬着明天的人，更是把已取得的成绩作为新的起点，执着地向新的高峰攀登。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10月，其前身是兰溪化工总厂。它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成立的股份制企业，也是全国首家股票异地上市的公司。1992年7月20日至22日，我们采访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相泉时，首先的话题，自然是他当初怎么会想起搞股份制的？

股份制的设想，早在1987年就萦绕在尹相泉的脑海。当时，已担任了六年厂长的他感到，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企业改革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两次利改税、落实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六个阶段，但从总体上看，这一系列改革仍只是停留在浅表层次，企业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和权利。因而他认为，“企业改革必须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改革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和转换经营形式与机制，促进企业内部财产多元化、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把承包制转换为社会主义的股份制。

然而，股份制在当时仍不过是经济理论界研究讨论的一个话题，真正要实行，不能不考虑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诸种因素。尹相泉有着自己的信念：“作为一名厂长，很强的责任感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强烈的开拓精神。”尹相泉不是一个安分守己者，为了企业的明天，为了企业光辉的发展，他必须抓住时机，大力开拓。

时机终于来了。

1988年春节前夕，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和副省长柴松岳来兰溪视察，“兰化”厂长尹相泉提出本厂资金、能源紧张与原材料涨价三大问题，说工厂一年为此要增支二千万元。省长问：你想怎么办？尹相泉毫不犹豫地说：实行股份制。省长对这位貌不惊人的厂长的意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天晚上与第二天都与他促膝详谈，最后，“兰化”实行股份制的计划被初步定了下来。

又经过一段紧锣密鼓的筹备，1988年10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兰化”改造成“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份分为国家、企业法人、职工、社会自然人四

种。总股本2427万元，其中国家股1365万元，企业股562万元，向社会公开发行500万元。

在企业内部职工的股份问题上，公司规定：每个职工至多可购20股，每股为100元。可令人惊奇的是，仅仅在头四天里，全厂一下子就有250多人各自认购了20股，有的老职工竟然把一生的积蓄统统拿了出来！最后，整个公司1300多名职工有70%的人都认购了20股，要知道，当时职工们可并不知道以后每股“凤凰化工”值三四千元啊！

那么，500万元公开发行的股票又该如何推销出去呢？当时国家并没有具体的关于股票上市的文件，如果这500万元推销不出去，那它们将是一堆废纸；如果推销出去了，弄不好可要背“黑锅”！尹相泉此时已豁出去了，他上杭州、奔上海，几乎是一家一家挨门挨户去推销。至今，他仍不能忘记当年一人手提84万元股票，徘徊在上海街头的一幕幕……

是的，二年后，仅仅是二年后，股票便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以致于1992年初，每百元面值的“凤凰化工”在上海证券市场的成交价竟高达4000多元！然而，除了公司的广大职工，外界又有几人能想象出当初尹相泉和他的助手们推销股票的种种艰辛呢？！

股份制今天已受到肯定，也受到愈来愈多的企业家和理论家的赏识。股份制当然也不是尹相泉的发明，甚至当时能认识到股份制长处并想推行股份制的，在中国也决不仅仅只有几个人。但是，当时在全中国真正敢于推行股份制的企业家却只有尹相泉一人！我们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具有的决不单单是勇气，而更重要的乃是那种献身他人、献身社

会进步的崇高牺牲精神。试想，倘若尹相泉当初只尽职尽责做一个厂长而不推行股份制，广大职工也仍然会拥护他。因为当时的“兰化”已是一个很不错的企业，而尹相泉也早已是有名的浙江省十大“万人赞”厂长之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尹相泉只按部就班地做一个稳当厂长，那么公司今天26万平方米的新厂房决不会拔地而起，那座耗资3300万元现代化的脂肪醇厂决不会使同行震惊！

“想干的，就一定要干成”

尹相泉中等身材，外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只要你听他谈话，谈改革，谈“凤凰”的明天，他言语里无形中散发出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就会使你的情绪不知不觉地受到强烈的感染。

1934年农历正月，尹相泉出生在浙江省仙居县一个山村。因家境贫寒，他十多岁才上学。1958年丽水林业学校毕业后，由于品学兼优，被保送到浙江天目林学院化工系深造。1962年毕业后，他先后放弃可留杭州、金华等市内的选择，主动要求只身来到专业对口的兰溪化工厂。那时，他心底就有一个希望——他要在这个浙江西部工业重镇中，开拓一片新的天地！

兰溪化工厂的历史虽然可追溯到1914年，但当大学生尹相泉1962年到来时，它还只是一个规模极小的公私合营工厂。生产主要还是“肩扛、脚踏、肚皮挺”的手工劳动，产品也仅仅是普通的家用洗衣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年轻的尹相泉开始了他一生中的艰辛历程。从此，他一辈子与“兰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进厂，尹相泉便与工人们汗水洒成一片。但作为一名

大学生，一名技术员，他还要刻苦钻研技术。当时，他从“爱美是人的天性”思想出发，提出大力生产美容化妆品的建议。不幸的是随之而来的十年浩劫，不仅粉碎了他的梦想，而且还使他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尹相泉本来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农家子弟，在打击面前，他并没有消沉下去。相反，他运用以前自学的中医知识，开始为附近的人们看病，并且，还学会了钓鱼。从此以后，业余为人看病和垂钓竟成了他业余的两大乐趣。

1978年10月的一声惊雷，使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尹相泉重新振作起来。1981年，他被提为副厂长。1982年，“兰化”改选厂长，尹相泉终于以他的忘我工作精神、技术水平和敢做敢为的魄力，赢得了广大职工的信赖，他被推上了厂长的位置。从1962年到1982年，整整二十年，尹相泉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从技术员到生产调度员到生产技术科长，再到副厂长、厂长，这一步一个台阶的发展，除了这一表面上位置的升迁，是否还孕育着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历程？

昨天没干的事，今天一定得干成！尹相泉一上任，便把他六十年代初发展美容化妆品设想付诸实施。于是，在他任厂长的最初几年里，“兰化”美容系列产品竞相而出：珍珠美容皂、康康健肤皂、花粉香皂、花粉美容霜等新产品一个接一个地试制、生产出来。有的新产品，一投入市场就风行全国。有一位国际同行用了尹相泉送的“康康”健肤皂，竟连声表示佩服，认为它与国际同类产品相比毫不逊色。就这样，在尹相泉任厂长的头五年，“兰化”新产品创造的利润达到1022万元，占全厂利润总额的四成多。

王 国 的 扩 张

八十年代中期，有人来到兰溪，看到当时“兰化”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曾誉之为“兰江畔的化工王国”。

但尹相泉没有丝毫的满足，他一刻也没有停止“王国”的扩张。他扩张的魅力，在企业“三级跳”式的发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第一跳——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尹相泉深信企业管理之道，他认为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科学的内部管理。于是，他一任厂长，就实行了以车间为单位的计件工资制，把工厂经济大目标分成许多小指标落实到人，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厂特色的“一个挂钩”（工资总额与单位产品产量浮动挂钩），“二个否定”（工资总额受质量、消耗系数否定），“八项考核”（质量、安全、计量能源、责任成本、文明生产、遵章守纪、职工教育、设备管理等八项综合考核）的计件承包责任制。科学的管理，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企业的产值、利润和职工收入全面大幅度上升，“兰化”由此开始了真正的腾飞。

第二跳——成立兰溪化工总厂。企业间的竞争，除了产品和技术的竞争，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体现为规模上的竞争。为了“兰化”的明天，在尹相泉任厂长的最初三年，“兰化”不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内部管理改革，而且在具体的技术开发和产品结构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和调整，从而使产品种类由原来的洗衣皂等四类产品40多个品种，迅速发展 to 拥有化妆、洗涤、油化等九大类100多个品种。

企业发展已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985年1月，“兰化”终于通过内联外引，成立了兰溪化工总厂，下设六个分

厂，五个直属车间，拥有职工1300多人，“兰化”一下子成为全国日化系统中唯一的一家产品门类齐全的日用化工大厂。

这两“跳”，使“兰化”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昔日的小厂，经过这两“跳”到1988年实行股份制前，企业固定资产的原值猛升到1518万元，净值达1051万元。

“兰化”由此而成为轻工业部日用化工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在改革开放短短的头十年里，“兰化”产值每年以19.59%递增强劲势头迅猛发展，上交国家利税每年也以17.68%比率递增。十年，弹指一挥间，而尹相泉和“兰化”的职工们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已可建5个“兰溪化工总厂”！

尹相泉并没有陶醉，执着追求的个性使他永远不会停留在原来的基点上。他为过去划了一个句号，又开始了“第三跳”。

第三跳——在兰溪化工总厂的基础上，于1988年10月成立了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制的实行不仅解决了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大笔资金，更重要的是企业基本上获得了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同时，尹相泉的担子也更重了，他不仅要为公司的2000余名职工负责，还要为社会上具有广大影响的“凤凰化工”的股东们负责。股份制也使“王国”的扩张显得更有力。

公司一成立，尹相泉便根据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及时对机构重新进行了组合。整个公司下设7个事业部，分别归口管理25个科室、8个直属车间、8个分厂、5个分公司、12个经营部和2个日化科研所、1个汽车运输公司。在管理上，尹相泉又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以经营战略为核心，以市场、科技、生产为中心环节的“循环经营”理

论，使公司经营形成了“以市场为先导，以科技为支柱，以生产为基础，促进市场、科技、生产良性循环”的特色。

为多方位开拓市场，公司在北京、上海、石家庄、厦门、南昌、成都、海口等地设立了经营部；并在海口、深圳、杭州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同时，公司还开展了广泛的横向联系，在宁波与镇海港埠公司、马来西亚循循油厂有限公司合资兴建了年吞量为20万吨的葆金油脂储罐有限公司；在兰溪市与香港合资兴建了华宝化工有限公司；在海口市与香港环球信息交流公司合资兴建了环球金笔公司；海口分公司还创办了海南南华日用化学厂，而规模更大的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裕祥分公司不日也将在海口成立。此外，公司还在房地产诸多方面开始了初步有益的尝试。

尹相泉的眼界更宽更高了，他和2000余名“凤凰”人，正着意描绘更加辉煌的明天。

明天会更好

1992年6月15日，轻工业部徐荣凯副部长等六位领导视察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他说公司有三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改革走在前头。在我们轻工系统，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从1988年成立以来，经受了1989年“六·四”风波等曲折的考验，坚持了下来，而且有了稳步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二是产品门类齐全，是大型综合企业，打破了计划经济单一产品生产的模式，形成了自己的系列产品；三是领导班子团结开拓，拓展了“凤凰”企业，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敢于改革，敢于实践，走出了一条路子。”徐副部长还表示：“总之，部里把凤凰公司作为一个点，希望出经验，

带动全面。”他还说：“凤凰公司的尹老总或其他人到部里办事，我一定把其他事情放下，优先办理……即使不是我们部范围内的事，我们也愿意帮助解决。”

有了轻工业部领导的支持，有了广大职工的拥护，还有广大“凤凰化工”股东的帮助，尹相泉对明天充满了信心。

现在，公司26万多平方米的新区厂房已全部落成，现代化的替代进口的脂肪醇工程也即将投产，各分公司、分厂和经营部的业务也正在全面拓展。公司产品也已扩大到包括洗衣皂、香透皂、硬脂酸、甘油、油酸、泡花碱、洗涤剂、洗衣粉、化妆品、硬化油、香精香料、脂肪醇表面活性剂及包装用品等14类160多个品种，预计公司今年产值可达1.9亿元。尹相泉满怀信心地说，到“八五”末期，公司年产值将达到6至8亿元，年创税利超1亿元，年创外汇超1000万美元。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尹相泉和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明天会更好！

〔编者按：现任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尹相泉先生，1935年9月21日出生于仙居县安岭乡金坑口村，1962年毕业于天目林学院化工专业，历任兰溪化工厂技术员、生产技术科长、技术副厂长、厂长等职及至现职。1984年被评为浙江省“万人赞厂长”十人之一；1987年被推选为浙江省企业家作家联谊会副会长；金华市企业家协会与兰溪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1988年任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兰溪市化工协会、中国洗涤协会常务理事；1989年被评为兰溪市化学专家、全国

轻工业劳动模范，同年荣获科、工、贸三角循环金华市特等奖、浙江省一等奖、国家二等奖、浙江省优秀企业家称号，并被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聘为教导委员，又兼任省日化协会副会长；1990年被评选为轻工部中青年科技管理专家、国家体改委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1991年被评选为金华市科技拔尖人才，同年兼任《厂长经理报》常务理事、副会长，又兼任海南裕祥股份实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外合资华宝实业公司董事长。1985年曾参加国家科委组织的赴美考察活动；1988年参加省经济委组织的赴西德考察团考察活动；1990年赴墨西哥、美国进行产品展销及考察。

尹先生是仙居籍在外地工作最有成就的实业家。现将《海南特区报》1992年12月26日登载的《心，永远憧憬着明天》一文转载，以飨读者。原文较长，略有删节。】

化工行业高级工程师陈赫西

陈赫西同志1937年2月出生于仙居下各黄梁陈村。中学分别就读于仙居中学和台州中学。196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自动化专业，同年被分配到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工作，直到现在。

分配工作的第二年，陈赫西同志被化工部北京化工设计院借用去参加从法国进口的281工程设计。“281”当时是保密的。该产品于1967年在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投产。陈赫西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采用英国经验公式，解决了小流量测量与自动调节中的一些难度较大的技术问题，受到同事和专家们的好评。

回原单位后，他一直潜心于专业研究工作。1974年参加化工部会战项目TAC—01型载体活性氧化铝的研制。该项目1977年受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表彰，1979年获化工部三等奖。

之后，他又参加三聚氰胺催化剂氧化铝的研究，该项目于1980年获天津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在这两个项目之间，他还负责于1978年在沈阳红升化工厂进行的“活性氧化铝中和工序PH自动控制”项目的研究。该项目是1978年天津化工研究院一项工业化科研成果。

此外，他还负责由自己研究、自己设计、安装及调试的“水质稳定剂动态考核自动控制装置。”这套装置是目前全国水质稳定剂考核最先进的一套装置。

陈赫西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撰写专业论文和有关著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论文《PH自动控制在制备活性氧化铝中的应用》（《无机盐工业》1979年第二期）；

论文《浅淡水的磁场处理及前景》（《工业水处理》1984年第五期）；

编辑出版《工厂用防爆电器造型手册》（1985年）；

编辑出版《工厂用防爆电机造型手册》（1988年）；

编辑出版《工厂用防爆仪表造型手册》（1990年）。

目前，陈赫西同志在研究院第八研究室工作。八室就是仪表自动化研究室。1985年开始以八室为主成立了化工部电气仪表防爆监测中心。该中心承担全国防爆电器、仪表的监测工作。他负责本质安全电气仪表的检测工作，简称“本安室”，担任本安室主任、高级工程师。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6年开始，研究院陆续举办了12期全国性的防爆电气技术培训班。他负责讲授本安电气仪表的课程。仙居化工厂也曾派员参加学习。后来他还多次赴广州等地授课。

现在，陈赫西同志仍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工作，争取为国家多做贡献。

（吴 巍整理）

春蚕到死丝方尽

——悼念亡夫陈封亮副教授

应桂华

1992年6月19日下午4时，我最亲密的伴侣陈封亮带着振兴家乡的未完夙愿离开了人世，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回首往事，不禁泪雨潸然。

封亮于1933年9月出生于仙居嵛滩乡万竹口村，自小聪慧，6岁入学，在本村及嵛滩小学、正谊中学、台州中学读书时成绩优秀。1956年9月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分配至安徽合肥工业大学任教至今（1958年——1964年曾调安徽省农机二厂设计科工作），毕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数十年平凡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作出了许多不平凡的业绩。

他到合肥工大后，一直在理论力学教研室任教，三十多年如一日，认真备课，认真改作业，没有缺过一次课，没有迟到过一次，即使病得最重时也是如此，有好多次都是带病坚持上课，课后才去医院挂瓶。尽管他教学经验比较丰富，但他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故步自封，认真钻研教材内容，力求精益求精，在很多方面有自己见解，如写了《静力学新体系的探索》、《加速度合成定理新的论证》等，尤其是编写的《理论力学》教材，得到著名专家的好评，1984年10月在黄山召开的“全国理论力学教材研讨会”上，力学编委主任、理论力学编委组长、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沈沅教授

在会议总结中说：“……希望大家写不同风格的教材，到现在只发现合肥工业大学陈封亮同志写了一本具不同风格的教材……。”该教材曾先后与上海交大、安徽出版社联系，均因经费问题无法解决（要学校付5000元，共5本书，校方不同意，我们自己又无能力）而搁浅，后由校方推荐给机械工业出版社（经机工部部长秘书林铁夫同志批示），目前听说正在审稿，不知能否如愿出版。

封亮的工作态度极为认真负责，敢于挑重担，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从不讨价还价。如污水处理课题的关键设备——轴套式引电器的设计与试制，国内没有做过，又无样品、图纸、资料，难度大，时间紧，他敢于接受重任，圆满完成了任务。又如复合材料机械性能课题，同教研室一位教师虽学习进修了五、六年，但到具体课题任务下来时却因故推辞，领导要封亮干，他虽从未接触过复合材料，为了工作需要，他二话没说，接受了重任，并圆满完成。

他既搞教学又搞科研，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许多教师业务进修是常事，他却一次也未脱产进修过，连坐下来写点文章的时间都很难挤出。以近两年为例，每年上课120课时，还写了两本30万字的讲义及多篇论文，一人足以完成两人的工作量。

封亮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主要有下列几项：

- 1、国家建委下达“泵型叶轮课题”，他负责该项目的关键设备轴套式引电器的设计与试验。该设备国内没做过，且责任重大（全国十几个大单位在上海金山石化厂、上海印染厂等污水处理测试），他却知难而上，积极攻关，自己设计、装配。圆满完成任务，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奖。

- 2、1980年，他负责提供“中国环流器一号”

(451工程)主机整套材料机械性能实验数据(国家计委下达的课题)。接受此项任务后,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做实验,实验次数数以万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提供的数据准确可靠,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环流器一号”的主机设计作出了贡献,核工业部代表极为满意,曾到我家看望他并表示感谢。该主机现已点火物理试验成功。

3、合肥轻工机械厂挤压机的测验,他负责设计500吨压力传感器,参加汽车环铰的测试等应力测试的分析。

4、安徽宁国水泥厂进口日本三菱公司原料磨、水泥磨等设备发现质量问题,日方却不承认。他负责质量分析,写出《关于日方复函的见解》,有理有据,终使日方承认了质量问题,并承担全部责任,涉及金额2000多万美元。

封亮在从事教学、科研的同时,还写了不少论文和学术著作,主要有:

《理论力学讲义》,约40万字,校印刷厂印刷;《振动测试技术讲义》,上下册,校印刷厂印刷;《理论力学教材》,校内已试用三届,现正由出版社审定。

论文《介质系复合运动力学一种方法的探讨》、《NL方程初探》、《对偶矢量在理论力学中的应用》、《静力学新体系的探索》等十余篇先后在《合肥工业大学学报》和国家教委召开的重庆会议、广州会议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宣读。

尽管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他还是挤时间进修外语,目前他精通俄语,并能阅读德语、英语(曾义务为华东办事处翻译70万字的资料)。1978年他被评为讲师,1986年5月晋升为副教授。

封亮虽然长期在外地工作,但心连故里,情系家乡,为

仙居经济发展悉心尽力，死而后已。

去年3月他回到故乡，县领导十分器重他，他不顾体弱多病，四处奔波，考察调查了城内和乡下几家工厂，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设想和方案，县领导和有关部门、厂家十分赞赏，并具体商谈了协作意向。他非常高兴，赶回合肥后，动员我一起回家乡，对我说：“家乡人好、空气好、水好，你回去可能病也会好，我也可安心地为老家工业发展而干了。”他为自己晚年能为家乡出力，有用武之地而激动欣慰。根据仙居几个工厂的现状和发展需要，他一次又一次登门拜访有关专家、教授，请机械系、无线电系、电气系、精密仪器专业等著名教授合力帮助仙居振兴经济，这些专家、教授为他的热情所感动，都愿意合作指导。他和我一起回到仙居，把合肥那边的落实情况向县和有关部门领导汇报。县里制定了具体计划，定于6月23日组织人员到合肥与各位教授见面洽谈项目。他为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6月13日就离家。我怕他路上太累，叫侄子送他到杭州买机票走，但到仙城他就打发侄子回来，17日县里派小车送他到杭州，因一时买不到机票，陪同去的造漆厂同志请他在杭多住几天，一定要为他买好机票再走，他觉得在杭化费太大，次日就坐汽车回去。杭州到合肥车程10多个小时，一路颠簸，夜里到合肥时已躺在三轮车上不能动弹，这时同车的儿子才发现是父亲，把他背到家后，马上送医院，19号早晨医生会诊是腹膜炎，已化浓，虽开刀动手术，但为时已晚，下午4时，停止了呼吸，永远离开了人世。

中共仙居县委、县人民政府为封亮的逝世致唁电深表哀悼，赞誉他“生前为振兴仙居家乡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家乡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县政府、财税局、二轻局、

造漆厂等有关领导还专程去合肥敬献花圈，参加封亮的追悼会。

我本病魔缠身，得此噩耗，犹如雪上加霜，虚弱之躯，怎能经得起如此沉重打击，当即卧床不起，只好在老家以泪洗面，悼念亡灵。直至今年3月6日，在深圳工作的女儿特至仙居接我，才离仙返皖。到家后看到终日相伴的人已成遗像一幅，泪下成串，目瞪口呆。忆及去年的春天，我俩形影相随同回故乡，喜悦和幸福的心情难以言表。时仅一年，今年的春天草木依旧，百花仍开，可我俩已不在同一个世界了。离合烟云，空蒙雾雨，我泣涕彷徨，怅快悲沧。唯有所慰者，是封亮一生正直，工作辛勤，师生共睹，众口皆碑，晚年又得到家乡领导器重，他如鱼得水，决心把余光奉献家乡建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封亮，你的儿女都已长大，他俩大学毕业后都为建设四化出力，家乡的建设也正在蒸蒸日上，九泉之下你若有知，定会含笑安息。

〔本文作者简介：应桂华，女，仙居埠头乡十都英村人，1950年7月毕业于浙江省立台州师范，同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连队文化教员，1952年考入南京航空学院，1955年毕业后分配至哈尔滨飞机制造厂，1965年因爱人关系调安徽省合肥市无线电一厂，1978年调合肥工业大学任教。1981年升为讲师，1987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生物学家王焕校

王焕校祖籍仙居县杨府乡坑口村。1933年农历5月出生于杨府断桥下宅的外婆家，曾在断桥小学读初小，五年级转到广严寺台师附小，后考入台州中学。1952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云南大学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5月赴东北大兴安岭开展落叶松林更新的半定位研究。1958年带本科毕业生到安徽省进行宜林地调研。同年10月底回云南大学生物系工作，并参加苏联专家在云大办的全国高校生态学师资培训班，在一年内到西双版纳、河口、丽江玉龙、雪山等地考察研究，增加了不少知识。

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王先生曾担任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生态平衡与自然保护、生态工程等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其中一些课程是由他在全中国率先开出的。

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王先生著书立说，硕果累累——他与吴玉树等合著《植物生态与植物群落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受教育部委托合编全国通用教材《植物生态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高教出版社1983年第二版）；单独编著全国第一本《污染生态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目前正在撰写的《生态工程》教科书即将完工付梓。

王先生长期从事植物生态和污染生态学方面的科研工作，先后承担云南省科委下达的“造林绿化净化大气”课

题、国家城建环保部的“铅在生态系统中迁移积累规律研究”的重点课题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铅、镉、锌在植物——动物中迁移、积累和毒害机理研究”等等。结合科研成果，王先生在国家级学报上发表论文20多篇，并获省科技三等奖（1980年）、一等奖（1983年）、二等奖（1991年）和云南大学科技奖多次。王先生还参加“三聚磷酸钠厂环境影响评价”、“开远地区环境影响评价及对策”研究、“湘、黔、桂、滇岩溶地区脱贫和经济振兴”综合研究等等，其出色的工作业绩，得到同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王先生于1978年被评为讲师，1981年任副教授，1986年任教授。他先后培养硕士生14名（尚有2名在读），他的专业于1991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授予点。他桃李满天下。学生们对他十分尊敬，其中不少官居省、厅、地（州）、市各级要职，仍与之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由于他的勤奋工作，他连续4次获云南大学教学优秀一等奖，省教学优秀二等奖。

王先生除了紧张的教学、科研工作，还兼任第二、三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和云南省环境学会副理事长、云南省六届政协委员及省科协第三、四届委员，昆明市经济、社会、科学顾问，云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王先生虽长期在外工作，乡情仍十分浓烈。他衷心祝愿家乡经济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吴巍整理）

生长在山区 服务于农业

高级农艺师 徐顺宝

1932年7月，我出生于仙居县原三桥乡（解放前为船山乡）。该村座落在城南小南门外5华里的一座小山脚下，解放前全村不满25户人家，除一户地主外，基本上都是贫苦农家。

解放前，我家共8口人。父母全系文盲，是一对勤劳俭朴的劳动者。家无分毫田地，仅靠租种7.8亩土地和轮种的1.5亩祖坟地为生，其余别无收入。一年的辛勤劳动，达不到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水平，还必须靠“倍利点青”（即在当季庄稼种下去时，按常年产量估计亩产400斤稻谷，向地主借200斤稻谷，到秋收时这亩稻谷全归地主收入）来糊口，每年都是寅吃卯粮。

我们村里与我同龄或差不多年纪的10多位伙伴至今还戴着文盲或半文盲的帽子，而我能获得读书的机会确是幸运。主要是我父母亲思想开通，目光远大。他（她）俩为了摆脱祖祖辈辈做文盲受人欺压的苦楚，宁可自己盐当菜蔬，汤充饥，省吃俭用把我们兄妹送入校门。我1939年入学（中途停学一年），1946年小学毕业。因家境贫寒，为了使弟妹能读完小学，我只得在家劳动一年半，至1947年秋又勉强参加了初中升学考试，在考试期间因发生疟疾而停考。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由于得到亲戚、朋友的热情帮助，我有了一个进入初中试读的机会，由于我勤奋学习，成绩优良而作为正式学生留下学习。直至1950年毕业时，

获全班第二名。毕业时，县文教科同志找我谈，初中毕业成绩优秀者可以保送升学，有三个学校，可供我挑选，即：台州中学、台州师范和台州农校。因前二所学校费用较大，家贫无法负担，而台州农校可以免费就读，我又考虑家住农村，农业知识较实用，所以我选择了台州农校，被保送入该校读书。1953年秋毕业，获得全班第三名成绩。

毕业后，分配到省农业厅干训班，进行工作前培训。后因工作需要转入省商业厅干训班进行物价专业培训，1954年分配至浙江化工原料公司物价科工作，下半年因嘉兴成立化工原料分公司，我也随之调到嘉兴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省委互助合作化工作团到海盐县，以后一直留任海盐县委农工部和组织部任组织干事、人事秘书股长等职，直至1958年考入浙江农业大学土化系读书时才离开海盐县委。1962年毕业后，分配至浙江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任农资商品质量检验员和科科长至今。

至于促使我勤奋读书的动力，实事求是讲，解放前主要是为了报答父母的恩德，想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此外还有三个正、反面因素：

一是读小学时，有一次轮到我家给老师送菜蔬，因质量差，遭到先生的训斥，说“家穷为什么要读书？回家放牛不是很好吗？……”似乎穷人的孩子天生的是放牛娃，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进入校门，想起来很气人。

二是读初中一年级缴学费时，我父亲向地主借稻谷，得到的回答是：“我家也无余粮。儿子个子比你高，家里无钱就不要读书，在家劳动不是可以吃饱吗！”结果借粮未成反遭教训！

三是受到王洪鑫和朱福同先生的关怀帮助，使我有机会进入初中求学，这是关键的一步。否则，就无法再深造了。为此我内心感激不已，终生难忘。

解放后，我受到党的教育，思想认识提高了，明确了学习、工作主要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因而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在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积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进步。在业务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有：

一、由出版社公开发行的论著：

- 1、《现用化肥性能与用法》（浙江科技出版社）
- 2、《现用农药性能与用法》（ “ ” ）
- 3、《化学肥料基础知识》（商业部教育司）
- 4、《化学农药基础知识》（ “ ” ）
- 5、《怎样用好化肥挂图二幅》（农业出版社出版）
- 6、《手动农业药械结构使用挂图四幅》（农业出版社出版）
- 7、《化肥和农药》电视科教片（商业部教育司）

二、省内供销社系统内部发行的有：

- 1、《供销合作社系统初级业务员应知业务常识》，其中的化肥、农药、农膜部份章节。
- 2、《农资业务学习资料》
- 3、《化肥、农药使用简介》
- 4、《手动农业药械》
- 5、《化肥、农药、药械商品知识》

由于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于1983年被评为“农艺师”，1988年晋升为“高级农艺师”。

今后我还将继续努力学习、工作，为党的事业贡献毕生。

崎岖奋进的路

江西省万年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王均淦

我于1963年毕业于江西共大总校林学系，被分配到江西省万年县马家垦殖场任技术员，1981年晋升为林业工程师，后调县林业局搞林业技术推广工作，1989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1937年夏，我出生在仙居县杨府乡坑口村。优厚的生活培养了我的娇气，在广严小学时糊里糊涂地度过五、六年。此时正值仙居解放前夕，乡下土匪乱，我转安洲小学读了一年后缀学在家。解放后回广严小学复学，1952年总算小学毕业，但考初中未被录取。1953年又回广严小学复读毕业，考仙中仍然名落孙山。我便约同村数人步行近百里赴临海县考入私立振华中学初中部就读。在新环境里，我学到了做人的道理，接受了新知识。

由于小学的挫折，我悟出一个道理：先天不足后天补。从此，我便加倍努力攻读，由落榜生一跃成为全校初中部的尖子。这样，1956年初中毕业时很容易地考入临海第一高级中学（即台州中学）。当时，虽然生活较艰苦，但我仍雄心壮志，努力攻读，决心将来为祖国做一番事业。事与愿违，1958年在东阳农业局工作的哥哥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有些想不通。带着这个问题，我在班务会上向全班师生表白，却被扣上“对阶级敌人”的哥哥“界线不清”的帽子，结果连参加民兵的资格亦被剥夺了。1959年高中毕

业时，当然也被取消高考的资格。我欲继续升学的希望变成泡影，忍不住痛哭了一场。离校时，班主任送我一本书——《可爱的中国》，这本书给了我力量，我决心继续求学。在好友介绍下离仙赴赣，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到南昌后并不顺利，一时求学无门，而带去的40元钱将化尽，为解决吃饭问题，只好睡大街，后转到省海员俱乐部住数晚，终于被录取到江西共大总校（即现在的江西农业大学）就读。在这里我学到不少专业知识，给今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3年从江西共大总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最基层单位——江西省万年县马家垦殖场任林业技术员。当时该县松毛虫危害十分严重，大片松林如火焚。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遂利用学到的知识引进土法生产微生物农药——白僵菌防治松毛虫，取得较好效果，得到省林业厅的好评。在1984年至1987年任县林业局业务副局长期间，由于综合防治松毛虫工作抓得出色，使该县大片松林免受灾害；因而，该县连年被评为省森防工作先进单位；在封山育林方面亦曾得到林业部的好评。

1985年6月18日是我人生道路中的转折点，我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共党员。从此，我这个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转变成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是党给我的荣誉，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入人心的结果。我衷心地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与培养，决心将毕生精力献给党的科技事业。

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已年过半百，虽没能为家乡人民作过贡献而感到渐愧，但愿在有生之年能为家乡人民尽微薄之力，祝愿家乡人民繁荣昌盛、万事如意。

人权理论新秀——董云虎

应建红

在当今意识形态领域中，被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颠倒得最厉害，弄得最为扑朔迷离的理论问题，莫过于人权问题。长期以来，西方某些国家以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推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工具，并以此为突破口，一再攻击中国政府，做了不少“文章”。国内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也以西方人权观为标准极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在人权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理论混乱，也的确迷惑欺骗了不少人，特别是对何为人权这个问题了解不多或一知半解的青年学生。

面对某些国家对我国发动的人权攻势，我国政府也提出了“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论题，但一时又苦于缺乏有关资料 and 理论依据。正当此时，中央党校青年教师董云虎在其妻刘武萍的协助下，用了几年时间编写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一书，由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作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这部150万字的巨著，不仅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基本内容及其与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根本区别，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人权的历史渊源、逻辑演变及其在当代国际社会的发展作了详尽阐述。这些具有开拓性和深刻性的理论，为人们从事人权问题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发动的“人权攻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

器。该书还收录了英、美、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东欧各国及中国建国前后和国际社会有关人权的宣言、条例、约法和宪法的有关人权章节，为理论界从各方面、多角度深入研究人权问题提供了详实而系统的资料和有益帮助。

这部我国建国后第一部人权研究领域的大型编著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学术界一致认为该书“填补了我国社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揭开了我国人权研究的序幕，代表了我国迄今为止在人权问题上达到的一个高峰”（外交部国际司主管人权事务副司长王学贤语），并“全面系统地提供了人权问题研究指南，对于推动我国广泛开展人权研究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全面正确地理解人权观念，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书评）。此书还引起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李鹏总理表示“一定要好好读读这本书。”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称它确实是一部好书。外交部国际司致函党校研究所和科研部充分肯定此书“为我国人权研究作出杰出贡献”。该部一次就购买了数百册，分发给驻外使馆及有关机构。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经济参考报》、《文汇读书周报》、《书讯报》、《社会科学研究》、《求是》杂志、《博览群书》、《现代法学》杂志和《党校科研简讯》等报刊及中央电视台纷纷撰文报道、播放和刊载了该书出版的消息及长篇书评。称之为“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编著”、“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把人权问题系统地提到了哲学高度，不失为一篇人权哲学概论”。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也专门介绍了此书。香港《经济日报》等好几家报纸作了专门介绍。影响波及到海内外，董云虎也成了新闻

人物。

该书编撰者董云虎，1962年12月出生，是仙居县溪港乡曹溪村人。自幼家贫，父母为了养活他们兄弟姐妹九人，吃尽了人间的苦，受尽了世间种种委曲。董云虎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上学了，他是勤奋好学的学生；放学了，他成了家庭的好帮手。这样也自小培养出他刻苦自强精神。

他虽是乡里远近闻名的优等生，但在那动乱的岁月里，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恶浪席卷全国，种种人为的因素使他初中毕业之后未能跨入正式高中的大门。1976年，对知识如饥似渴的他进入了溪港乡办的“五·七”农业高中。那里条件十分简陋，师资力量薄弱，且只开语文、数学两门课程。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节衣缩食，一边卖柴、一边读书，时常只靠吃霉干菜、糠饼维生。尽管如此，在老师的悉心传授和他本人的努力下，1978年董云虎参加高考时取得了离录取线仅差3分的好成绩，引起了县教育局领导的重视。此后，董云虎又去埠头乡中学继续学习了一年，于1979年考入了杭州大学哲学系，成了那一年横溪区文科考生中唯一考入大学本科的学生，也是曹溪村这块穷乡僻壤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

叩开大学之门，对于这位从仙居边远山村出来的年轻人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他深深懂得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于是乎，他发愤努力，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政治、历史、文学以及其他各方面知识，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1983年，董云虎大学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从师冒从虎教授，主攻西方哲学，成为当时全班唯一考入外校硕士研究生的人。

进入南大后，他在专业上狠下功夫，不但阅读了大量原著，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功底，而且练就了深刻分析的能力，得到了导师和其他老师的赏识。由于他基础扎实，反应敏捷，年仅20来岁，所以在同学中赢得了“小神童”的美誉。聪明、谦虚、扎实，是大学老师对他的一致评价，也是他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

1986年，董云虎研究生毕业后，经组织上挑选，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工作以来，他先后担任过进修部组织员、党支部副书记、书记等职务。参加过中央机关讲师团的支教工作，现任中央党校研究所党总支宣传委员、支部书记和室副主任等职务。尽管董云虎的家庭处境至今仍然十分艰难，但是他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党和人民孜孜不倦地工作。

从大学读书时起，董云虎便对人权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进行了深入思考，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我国理论界一直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人权问题成了理论界不敢涉足的“雷区”。这种状况给我国在国际斗争中造成了严重的被动挨打局面。针对这种情况，董云虎对“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讲不讲人权”，以及“如何讲人权”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为此他排除了外界环境干扰，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查阅有关资料，撰写论文，独自开始对人权问题的研究。从1989年开始，他集中精力编写《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直到1990年4月成书。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央领导意识到人权问题关系重大。1990年底，江泽民总书记指出，人权问题回避不了，应予认真对付一下。与此同时，李鹏总理指示，对于美国借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应予重视，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此，中央决定搞一个人权白皮书，以反击西方的“人权攻势”，并点名董云虎参加起草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国内外公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一4.5万字的白皮书回顾了中国人权的历史，以大量事实全面介绍了中国人权状况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历史性进步，阐述了我国政府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借“人权”之名掀起的反华浪潮，为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得了主动权。这其中也凝聚了主要执笔人董云虎的心血和贡献。

人权白皮书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关注。香港《大公报》发表题为《中国高举维护人权旗帜》社论，《文汇报》发表《中国将人权政策昭告天下》社论，《商报》发表题为《基于国情的人权观》社评，一致认为中国发表人权白皮书意义深远，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成绩不容抹煞，并提出坚决反对少数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西方某些国家对我国发动的“人权攻势”势头顿弱，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权确有进步”。由于董云虎在人权问题上的突出贡献，香港报纸以“北京出现政治神童”为题对他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1990年至1991年，董云虎出席了由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等单位举行的20多次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在此期间，他还在《科学社会主义》、《高校理论战线》、《党校科研信息》、《阵地》等社科杂志上发表了《西方人权问题的提出和演变》、《人权观是有阶级性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基本立场》、《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观剖析》、《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马克

思主义人权观》等十多篇人权研究论文。白皮书发表后，《人民日报》特设“人权论坛”专栏，各民主党派和人权理论界专家发表人权讨论文章。1991年12月13日“人权论坛”刊登了他的《事实胜于雄辩》的署名文章。红旗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他和其他同志合编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学习材料》和《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问答》。此外，他还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最近，《中国青年报》也连续刊登了他的《人权大于主权吗？》文章。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他就白皮书中的理论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讲人权的民主国家！

董云虎还参加了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和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的会谈，就人权问题与他们进行了平等的讨论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他还应邀先后去外交部、国家安全部、河北省、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等地作有关人权问题的报告，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

去年12月，年仅29岁的董云虎被中央党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成为目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年轻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最近，他还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的“青年社会科学基金”奖。董云虎现在是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人权问题委员会六名委员之一，并负责着中央党校人权研究机构筹建工作。“三十而立”，他成了我国的人权问题专家和理论权威。

董云虎为人朴实、谦虚，对家乡具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因此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也应归功于党和人民。我是在仙居长大的，是仙居山山水水养育了我。我所取得的一切也应归功于仙居县的各级领

导和人民。我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并请转达我对家乡父老的诚挚问候！我衷心祝愿家乡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迅速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改善生活条件。”

游子的赤诚之心，始终记挂着故乡母亲！

平凡人的路

陈乾翔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走过的路自然也是平凡的，回顾前半生，使我最难忘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恩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代中国，没有党的培养教育，也没有我的成长和今天。

1934年9月，我出生于仙居县黄梁陈村一户世代务农的家庭。解放前，过着贫穷的生活，我家上几代没有一个人读过象样的书。政治上受欺压，经济上受宰割，深深地触动我幼小的心灵。自我懂事那一天起，我就暗下决心，要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苦难而不堪承受的处境。我虚龄6岁就开始牧童生涯，每天不是骑在牛背上，就是去田野割草，再不就是上山砍柴，当我看到其他小伙伴们背着书包上学时，我是多么的羡慕。我常常牵着牛到祠堂（学校）门前转悠，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多么想踏进那扇大门。我经常向爷爷、父母亲哀求让我读书，他们总是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我，却又摇头叹息。直到我11岁那年，不知是家里经济状况稍有改善呢抑或父母亲受我多次哀求的感动，同意让我进了本村小学。从此，我开始了半读半农的五年学生生涯。我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特别刻苦用功，每次考试总是在前3名，但小学毕业后，家里实在无力再供我升学了。

1949年夏天，家乡得到解放，父亲加入农会，母亲担任村妇女会干部，我虚岁虽只16岁也参加了基干民兵，扛起枪杆保卫胜利果实。

1950年秋，在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仙居的国民党残余、地主及流氓土匪勾结在一起，挑起了“红白旗派”之乱，他们把主要矛头对着人民政权及乡村基层干部，穷凶极恶，罪行累累。1950年底解放军浙江警备六旅开进仙居剿匪，黄梁陈是红白旗的老窝，是剿匪的重点村之一，因此部队专门派驻了一个班，深入做群众工作。我对土匪深恶痛绝，就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伙伴毅然报名参了军。我因熟悉家乡情况，经常带路出击，为剿匪做了有益的工作，受到上级的赞扬。

1951年初，我部奉命进驻温岭县北门镇海防，当时，国民党还占据着上、下大陈和一江山等沿海岛屿，为了完成守边任务，部队扩编改番号为三十五军一〇四师，我在所属三一〇团三营营部当通讯员，后到机炮连当文书。在规模较大的北港山岛战斗中，我军以两个团的兵力，用木帆船渡海登陆作战，全歼岛上敌军500多人，在此次战斗中，我胜利地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记功一次。

在紧张的海防战斗生活中，领导不忘组织战士学习文化，连队也开办速成班，当时部队成员文化程度都很低，我这个小学毕业生竟成了小知识分子，连队聘我当小教员。部队条件差，没有专门营房，分住在老百姓家里，点的是豆油灯，没有桌凳，同志们就用背包当坐椅，膝盖当桌子，战士们学得很认真，我也在边教边学中得到了提高。

1953年初，我部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部队，先担负修建国防机场的任务，后又参加“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在此期间，我两次出席团的庆功大会，并两次荣记三等功。1952年12月，我在上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我随部队转业到建工部直属的西北金属结构厂（在西安市），先在材料科担任保管员、采购员，后又调到保卫科和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曾抽出去搞西安市统一组织的肃反审干外调工作两年多。

五十年代中期，是我国文化科学事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国家提倡青年人要向科学文化进军，对在职人员有保送和优先录取高校等规定，我也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我曾多次向厂党委要求送我上学，但都由于“工作离不开”而未批准，1958年初，我再次提出要求，领导总算允应。我暗下决心，拼命复习中学基础课程，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年夏，我考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西北大学是西北地区重点大学之一，招生名额少，考取很不容易，厂党委书记看到录取通知书后深为佩服，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并欢迎我毕业后再回厂工作。

我是调干生，又是党员，同学们都把我看成“老大哥”，开学时，我被选为班长和党支部委员，一干就是4年。虽然日常工作很多，我原有的文化基础又较差，但我很好强，决心在学习成绩上迎头赶上。外语我从未读过，老师曾允许我免修，然而我坚决不同意，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本科毕业生。我以自己的毅力完成了学业，成绩在全年级60多人中列为前5名，4年间我还3次被评为“五好”学生。

毕业分配时，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全国重点名牌大学中挑选学生参军，选生的同志知道我当过兵，就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再到部队，我对古典文学很有兴趣，本想今后能干出点业绩，但首先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分配。就这样，我被总参召回部队。

到总参谋部后，先去63军当兵锻炼1年，后分配在总

参三部机关和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工作。

为解决部队缺乏电子对抗技术人才的问题，1978年总参决定建立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我奉命参加筹建工作。筹建初期，主要是选校址、选人才（教员），我们筹备组的同志夜以继日，走南闯北，先后到过四川、北京、江苏、浙江等许多地方，历经半年之久，最后选定在安徽合肥西郊建校。选人才更是不易，到有关部门，费了不少唇舌，经过多次周折，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其中由我经办的，就请了20多位。第二年，我被任命为该院政治部保卫处处长，1984年越级提升为该院一系政委（正师）。除正常思想政治工作外，学生毕业分配算是个难题，部分学生不愿去艰苦或边远地区，我就逐个找他们谈心，有一年连续七天七夜，才全部做通工作，毕业分配全部顺利完成。现在，从我系毕业的学生已遍布全军，我为自己一生中能为青年的成长成才出力而感到无限的欣慰。1988年我被授于大校军衔。

1990年10月我奉命退休，总参政治部保卫部聘我为主编，编写了一本15万字的《基层党支部保卫委员培训教材》，总参谋长迟浩田为此书题词，该书已内部发行到总参各基层单位和全军的保卫部门。不久，《谋略》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聘请我为编委，并约我撰写有关篇章，1990年和1991年已先后出版发行《谋略库》和《谋略论》两卷，李瑞环等中央首长为此书题了词。目前，我正在为《谋略家》一书加紧编撰工作，今年将成书出版。我要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余热。

我以自己平凡的一生向家乡父老汇报，祝仙居乘改革之风更加繁荣昌盛！

孜孜游子念乡情

吴金荣

阔别四十年，悠悠念乡土。仙居，哺育我的母亲！葱茏群山叠嶂，蜿蜒溪水东流，一幅人间仙境的画面，怎不让游子思念！我作为一名师级干部并被授予“胜利”功勋章的军人，虽离休就地安排于首都过晚年生活，然而，情系仙乡，时刻忘不了仙居慈祥的父老和勤劳的人民。

童年生涯

1932年隆冬，我出生于仙居县城南仅9户人家的小山村——石壁。佃农的家庭，增加一个孩子，加重一份负担。这个村，从无一个读书人，只有到我辈才有这份福气。由于我爸妈思想比较开明，愿意自己多熬点苦也要给我识几个字，于是我八岁开始念书，每天翻山越岭10多里，先后就读于溪头祠堂、石板路小学、县城槃光小学。尤其使我难忘的是，石板路村离我家虽仅5里地，但是，山高路陡、石仓洞前的一段是悬崖峭壁，简直不是走路，而是爬行。至今回想起来，犹心有余悸。由于穷家的孩子早懂事，读书之余，常为家里干些活，甚至到县城卖柴挣几个钱缴学费、买书簿。因我多年受疟疾摧残，体质弱，个子矮，往往挑不动柴在路上流泪，幸亏世上多有好心人，常出力相助。最使我难忘的是，抗战期间槃光小学来了一位林校长，他体恤民情，常为学生讲述抗日救国道理。当他获悉我每个星期天来城卖柴后，特地亲赴察看，相遇后，嘱我把柴担到他家等

候。不一会他手拿一包纸、笔、墨向我递来，告诫我：“小小年纪不要再卖柴了，免得坏了身体”，并且宣布下学期起，不必再交学费。从此以后，我更加勤奋地学习，终于在高小毕业全县会考时名列前茅。

1946年，我考入南峰山仙居县中，学校离家十多里，中午饭自带，每天起早落晚，翻山越岭步行二十多里。姐姐给做的一双布鞋，不舍得穿，于是赤足行路直至南峰山脚下溪坑里洗好脚，穿上鞋，然后进入校门。初中读书期间，为减轻家庭负担，课本如语文、历史、地理、动植物等或借或抄，一张纸用几遍，大字旁边写小字，小字上面写大字，正面写过再用背面写，真可谓惜纸、惜墨如金。好不容易熬过三个春秋，1948年冬，初中毕业后考入黄岩农校。

弃 学 从 戎

1949年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胜利的消息传遍江南大地，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却和社会上匪霸勾结在一起肆意横行，社会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眼看读书没有用，也读不成了。

怎么办呢？这时村上来了两位年轻人，他们滔滔不绝地向村民讲起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提出要打倒土豪劣绅，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些话为我播下了一颗种子——毅然决定投奔游击队，寻找解放之路。

一天早上，我告诉父母要到新庄村项洪品同学家玩一下，实际上是约他一起投奔上张游击区。经两人长谈一夜后，第二天一早动身，当天到上张，十分幸运地见到了我村

一年前神秘出走的徐君实，他已是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的一位干部了。当我们向他提出志愿后，他却说，你们来这里，我们很欢迎，但这里推荐的青训班人数已满额。目前，解放军已过长江，仙居解放指日可待，解放后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大批有志青年参加革命队伍，现在正在做准备进城工作，进城后，你们即可去找。这几天先回家等候，尽量配合武工队做些宣传工作。

从上张回来后，见到亲戚朋友和同学，我就把在革命根据地所见所闻和没有完全理解的革命道理向他们宣传。

两个月过去了。这年农历六月十五这一天使我终生难忘。

深夜，一群土匪荷枪闯入我们的小山村，把全村洗劫一空，我被作“财神”绑去。连推带拖出村，涉水穿过永安溪，爬上鸡笼山，半山腰有一户人家，他们在这里歇脚吃饭，把我绑在一株树上，还威胁说：“不老实就给你毙在这里。”过了许久，他们吃饱喝足，又带我继续往上爬，不时扬言：“这小子通共产党，毙了他”。到了山顶，天已蒙亮，就用黑布把我双眼蒙上，两个土匪架起我往前跑，最后进入一个山洞。我的手被反绑着，两脚之间穿着绳子，我被推入草堆，由于折腾一夜，又累又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这个洞里我被关了四天。他们白天睡觉，晚上除少数留守，大部分外出活动，彼此之间以绰号称呼。他们说话做事都避开我，但偶尔也被我隐约听见，如说我姐夫是共产党，再关几天如拿不到钱就毙了我，先割下耳朵送到我家里去……。我深知家里没有钱可以赎我回去，惊恐之余，就思索着逃跑求生。为此，我强装老实，不看、不问，呆呆地坐在草堆上。这样过了十多天，他们看我胆小，对我松绑了，我就进一步

思考着逃跑的方案。根据当时情况，监看我的，夜里二个人，把我安在中间睡。白天一个人，听说是个“书记官”。此人约四十开外，爱睡觉，睡前用绳子一头绑着我，一头穿着他。一天吃过中饭，他警告我说：“我不用绑你，外边都是我们人，我打打盹，你只要一动我就知道的。”说罢他照常睡了，我先试了一试，看他没有反映，即刻屏住呼吸，鼓足勇气，轻轻地向洞口挪动，回望洞内一切安详，便迅速窜出洞外，直往山上爬。一股生与死搏斗的力量，征服层层悬崖峭壁和多少丛生荆棘。约半小时后，我已逃到山顶，举头可望及家乡，但是，关押过我的洞边却响起了喊声和枪声。死神在威胁我，但我並不气馁，宁可在悬崖跌死，也决不再次被俘。我虽然个子小，体力差，但可以在草木丛中钻过，大约化了二个小时，总算跑出艰难的山坡和坑洼，到了永安溪边，我混在人群中上了渡船，一下船，拔腿跑回家里，由于精疲力尽，进门就瘫在地上，不一会，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叫了声“爸、妈，这不是做梦吧！”于是，全家人悲喜交加，抱头痛哭。

为了防止土匪追来，我们全家进城寄居。那时县城已经解放，由原地下工作者张谷扬——我姐夫的大哥，介绍我到县政府工作，任秘书科通信员，工作时间不长，尚可记忆的是“仙居县人民政府”的第一块牌子是由我自告奋勇地跑到岭下张请张小八先生写的。

仙居刚解放时，国民党溃散部队和地方惯匪勾结，他们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残杀乡村干部，破坏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建设。我怀着对土匪的深仇大恨，向县大队部领导诉说自己的遭遇和报仇雪恨的决心，要求背枪当兵。经组织协调，调我到县大队当卫生员。1949年8月15日，我带着县

大队介绍信到台州军分区卫训班报到，从此跨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在诉苦大会上，我谈了自己的经历，痛哭流涕，“为吴金荣同志报仇！”响亮的口号震撼会场、短短二个月的学习，使我深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学习回来后，哪个中队出发剿匪，就跟那个中队走。1950年1月，田市区中队在白岩洞包围了一股土匪，我奉命跟着部队出发支援。此洞易守难攻，土匪气焰嚣张，最后，在火力掩护下送上炸药包，冲进洞里活捉了匪首柯老霸。在这次战斗中，我抢救了两名伤员。同年三月，我老家的民兵发现河埠一条船上隐藏着一个土匪小头目，副大队长命令我带领通讯员、炊事员各一名，前去捕捉该匪。我们跑步到了河埠，与埋伏在那里的十几个民兵接头后，我等三个上船，岸边民兵喊话，这个土匪刚露头，我即以左手抓住他的衣领，右手用枪眼一击，未曾开枪，却使他满脸淌血，当他挣扎着去拿起一把大柴刀时，已被我们三人逮住了。

1950年秋，全军精简，县大队和区中队都整编，编余人员到台州军分区学习，从此，我踏上了离开仙居之路。学习后，我被分配在军分区门诊部当卫生员。1952年，全军掀起文化学习高潮，军分区送我到省文训队学习速成识字教学，三个月结业，于1952年6月被分配到浙江省军区第一海防大队当文化教员，1953年4月调至公安16师任该师尹德光政委的专职文化教员。

主 要 业 绩

我这一生主要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船艇部队建设服务。这是一支不大的穿陆军衣服驾驶船艇执行水上任务的陆军水兵部队。早在1952年，当我在浙江省军区第一海防

大队当文化教员时，就已在这个部队中工作了一年多。那时我们驾着“士兵舰”，即机帆船上用沙袋架一门战防炮，在沿海执行交通运输、巡逻剿匪、护渔护航等任务。文化教员随执勤船队到海岛执勤点，组织官兵学习文化。我从山乡来到海边，对大海、大船很感兴趣，一方面帮助船员们学文化，一方面向他们学习驶帆、掌舵、开机器等技术。1954年10月，我出差在宁波，突然接到本部队通知，要我立即赴上海到指定地点集中，准备去大连第一海军学校（现为海军指挥学院）学习。到上海后才知道，公安军已开始建立公安海军，急需舰艇指挥干部，故从各师抽调一批优秀的连、排干部送海校培训，海校要求极严，除身体条件外，首先补习几个月文化，然后考试，不及格者就退回去。接下来公安军去的同志和海军同志混合编班。我们专科班学习时间虽短，但学习内容很多很全面。其间有不少人难以适应这样严格的训练而中途退学，一年半后毕业时，学员只剩下一半左右了。1956年春，我们去青岛海军练习舰实习，在最后一次远航时，学员队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书。毕业时，我被该校授予优秀学员光荣称号，获得荣誉证、奖学金和纪念品等，学校还向仙居我的家中报了喜。严格的军校生活，使我得到了全面的锻炼，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体格也强健了，为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

1956年8月，我从第一海军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公安干校海上巡逻系当教员。那时海上巡逻系刚组建不久，条件很差，为尽快培养公安海军干部，教员们自编讲义、自制教具，边建设边招生，到1958年已具有一定的规模。随着公安军的撤销，公安干校也撤销了。1958年4月，总后勤部从该系选调了四人到总后运输部船管处工

作，我是其中一个。作为高级军事领导机关的助理员，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出主意想办法，为领导决策提供详尽可靠的资料。当调动命令下达后，未及去总后机关报到。在去总后机关报到前，领导决定让我先到一条较大的运输船上任代理船长，以便熟悉情况，并把学到的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经过半年时间，几十次驶船艇到舟、嵎各岛执勤，我熟悉了舟山海域复杂航运，积累了不少航行资料，不仅亲身体验了陆军船艇部队的工作和生活，而且交了许多船员朋友，这些对以后开展本身的业务工作都大有裨益。

1958年9月底我到了总后船管处工作。不久即参与对陆军船艇部队的调查研究，开始把个人的理想与党的事业融在一起。当时，我的具体任务是负责起草《陆军船艇管理制度》一书，内容涉及船艇各项业务技术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在这个制度中，上要体现军委的方政策和军队三大条令精神，下要符合舰船部队实际，作出统一可行的规定。处领导亲自帮助我工作，我自己边学边干，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初稿写成再经几上几下征求意见，多次修改，终于写出一本比较满意的《陆军舰艇管理制度》，报经总后领导批准，于1960年6月颁发全军试行。本制度颁发后，接着就是抓贯彻落实。于是我和本处另外两个同志到浙江省军区台州军分区船运大队（原浙江省军区第一海防大队）蹲点试验，总结贯彻落实《制度》的经验。

试点结束后，在该大队召开第一次全军性的陆军船管工作会议，现场介绍了该队贯彻《陆军船艇管理制度》经验，研究船管工作现状和问题，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的措施。经各单位几年努力，陆军船艇管理工作逐步走向正规。

1962年，我和船队几个航海干部一起，从陆军船艇

的装备与任务的实际情况出发，联系陆军船艇航区特点和船艇部队多年积累的经验，编写了一本《航海教材》印发船艇部队，深受船员们的欢迎。

1963年8月，我因长期过度紧张、劳累，不幸胃穿孔，动了手术。1965年5月再次开刀，做胃大部切除手术。往后的12年，病魔交加，不详分述。1978年后，我的身体已基本恢复健康，可以进行正常的业务工作。此后我被提升为船管处副处长。为夺回失去的宝贵时间，我和全处同志一起制定新的船管工作规划和计划，下大力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规章制度。在原《陆军船艇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充实了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工提炼成《陆军船艇条例》于1978年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批准，以三个总部名义联合发文执行。

1979年我国首次召开航海学会代表大会，我作为陆军船艇部队代表参加大会，选入第一届理事会，任理事四年。

几十年来，我几乎走遍沿海一切有驻军的岛屿和所有的沿海和内河船队，每年约三分之二以上时间生活在基层，广大船艇勤务人员支持我的工作，我愿为陆军船艇部队建设服务到底。

离 休 以 后

1988年4月接到离休命令，这时我虽已超过55周岁，但身体尚好，还能继续为陆军船艇部队建设做点工作。几年来主要搞些资料工作，积极争取在《当代中国》丛书和《军事百科全书》中写进陆军船艇勤务有关内容，让世人后代能看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还有这样一支小小的特

种部队，这也是全体船艇勤务人员的共同愿望。陆军船艇勤务能不能在这二部巨著中占有一席之地，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努力。离休了，没有行政事务干扰，正可集中精力干这些在位时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在有关同志帮助下，查阅几百万字的档案资料，访问几十名船艇部队的老同志，经过几年努力，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整理编撰了一本《陆军船艇勤务大事记》。作内部资料，在军内发行。

——为《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卷撰写了陆军船艇部分的文稿，向其他部分提供了有关资料。本书于1990年出版，向国内外发行。

——《军事百科全书》中列入我所编撰的陆军船艇勤务方面十个条目，均按要求完成了送审稿，等待出书。

我虽已在北京安家，但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乡。前些年，我曾回到仙居石壁，石壁的面貌已大大改观，排排新房掩映在茂林秀竹中，禾苗茁壮，硕果累累。永安溪、石仓山，山水依旧，但是，精神面貌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和童年时代在一起放牛、砍柴的朋友从内心发出共鸣：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往事回忆

王纪中

(一)

我于1930年底出生在仙居县城关镇县前陈。因家境清贫，我父母把我送给大伯王钦雨为养子，此后我叫大伯为父亲。我少年时代，正值抗战，全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全家靠父亲一人经营小生意为生，经济比较困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逐渐养成“爱学习、勤劳动、早懂事”的习惯，求得父母的支持给我上小学读书，以后又勉强给我培养到初中毕业。此时父母已年逾花甲，体力渐衰，经济生活十分拮据，无力再供我继续求学，遂决定要我择业工作。我当时懂得，一个青年人要为社会和人民做事，仅具初中文化水平是远远不够的。我决心要继续设法求学，但在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一面坚决要求父母继续支持我求学，一面刻苦攻读，终于在1945年9月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商业学校，翌年又以优良成绩申请获准享受公费生待遇，得以继续在商校求学。1946年上半年商校从丽水碧湖迁回杭州。正值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时期，高商和杭高学生在地下党中共支部的统一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也是地下党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之一，曾先后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反对校方国民党员、训导主任迫害学生的活动；参加杭州市各界反饥饿、反迫害游行示威；参加杭州市学生

会对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浙大学生于子三的声讨活动；杭州市解放前夕，在商校地下党中共支部的领导下，参加护校、护城活动。

1949年5月3日杭州市终于得到解放。时值我毕业于浙江省高级商业学校会计专科。解放后，为了进一步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华，急需大量的干部。经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在高商校址建立浙江省财政经济干部学校，校长由当时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汪道涵同志兼任。我于1949年6月被商校组织推荐进入省财经干校学习。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起始，时年仅18周岁。我进入财经干校不久，学校组织又号召参军，我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到第七兵团供给部卷烟厂，主管计划、财务和统计工作。由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很快从战士到班长，后又升为排、连级干部，从一名普通的青年成为一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共党员。先后被评为七兵团供给部生产处先进工作者、优秀团支部的共青团书记，还立过三、四等功各一次。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军队组织号召部分军队集体转业到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于1952年8月响应组织号召，转业到地方工作。

（二）

从求学历程来看，我1949年商校毕业后，千方百计争取领导支持自己再进修深造，先后经过八次专业培训。

1949年9月结业于浙江省财经干校；1949年12月结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教导团；1953年2月结业于中共杭州市委党校；1954年结业于杭州市工业局厂级干部培训班；1981年7月结业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地

市计委主任轮训班；1982年6月又结业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县以上干部轮训班；1985年8月结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苏东体制改革研究班；1987年2月结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地市级干部体改研究班等等，学了不少课程。

在4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还自学了马克思哲学基本原理、国民经济计划学、统计学、会计学、中国工业经济和科技英语等。经过省、市有关组织考评，终于取得大专同等学历水平，结合我本人的学术论文和工作政绩，1982年经浙江省经济专业职称评审组织考评批准我为经济师。

(三)

1954年以前在杭州卷烟厂（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烟厂）工作期间，我先后担任主办会计、计划财务科长、生产副厂长等职。由于工作成绩显著，1954年被杭州市人民政府评为1953年度市级劳动模范，被授予奖章奖状，模范事迹被载入市级劳动模范史册。

1954年至1956年在杭州市工业局工作期间，主持计划、财务科工作，组织领导全科同志着重抓了企业计划管理和财务成本管理，促进了增产节约和生产力的发展，对全局1956年工业生产和企业利润的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

1956年后，分别在杭州市人委和市计委、计经委等单位工作，担任工业科长、计划综合科长、办公室主任、市计委党组副书记和市计委第一副主任。组织领导和组织了历年杭州市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两次调整计划和长远发展规划的编制，并组织参与了若干有价值的文件、报告的撰写工作，如《杭州市国民经济三年调整计划》、《各行各业支

援农业规划》、《杭州市今后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杭州地区农业基本情况和优势》、《杭州地区工业优势、短线产品和经济效益报告》等都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采纳。同时还组织参与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执笔撰写调查报告，如《杭州市工业企业计划管理暂行规定》、《杭州市新产品投产管理办法》、《杭州市人口增长情况和加强人口控制的报告》、《计划工作几个突出问题的调查》、《发展杭州市职业技术教育的报告》等都被市领导采纳并贯彻实施，对发展杭州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3年后，分别在市府办公厅、市体改办和市人民政府工作。任市政府秘书长、市府办党组书记、市体改办主任和副市长，在市委的领导下，组织和领导了经济综合管理、监督部门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行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杭州市生产力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杭州市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58.5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沈阳和苏州，居第七位；财政收入达到32.2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沈阳、武汉和重庆，居第八位。

紧张的工作之余，我还结合个人学习体会和工作实践，积极撰写文章，多次在全国或省市一级刊物上发表，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如《学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自觉清理“左”的影响》，刊登在浙江省计委《经济动态》1981年第20期；《从杭州经济建设看清理“左”的思想重要性》，刊登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实践》1981年第10期；《浅谈省辖市计划综合平衡工作》，刊登在《经济动

态》1982年第23期；《试谈省辖市计划综合平衡工作的客观必然性和指导思想》，刊登在浙江省经济学会1982年年刊上，此篇文章曾被浙江省未来学会1985年评为优秀论文奖、被杭州市社科联1985年评为优秀论文二等奖；《正确掌握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的关系》，刊登在全国《城市经济信息》1988年第18期；《试论所有制形式改革》，被国家体改委、中共中央党校编于《城乡改革实践的探索》一书中1987年出版发行，后被杭州市社科联评为优秀论文二等奖；《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刊登于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教学内参》1985年第6期，被杭州市社科联1985年评为优秀论文二等奖；《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关键》，刊登于《杭州经济研究》1986年第3期；《发展杭州经济的战略选择》，刊登于全国《经济信息报》1989年6月11日第一版上；《建立生养基金，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刊登于全国《工人日报》1990年1月11日；《社会劳动保险，事关长治久安》，刊登于《浙江日报》1991年2月2日，并获二等奖；《对整顿公司的几点意见》，刊登于全国《市长参考》1989年第14期；《谈谈农村救灾合作保险》，刊登于《杭州日报》1990年6月4日；《计划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论文，1982年被浙江省计委审定为较好的论文。

奋斗的足迹

——记台州行署副专员李相缪

一

李相缪同志于1939年农历5月13日出生在仙居县原寺前乡寺前村一个小商小农的家庭。相缪之名由其父取之于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赋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他从小受家乡水帘瀑布、景星望月等旖旎风光陶冶，得其山川灵气，敏慧聪颖、天真活泼。

抗战胜利后，他进入水帘小学（其前身是崇正小学，是仙居有名的“八正”之一）读书。他喜好文学、绘画、书法，更酷爱历史、地理。学校每每举办的讲演、美术、书法作文比赛，他经常占居鳌头。但就在他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奋发向上，健康成长的时候，他那纯洁可爱的心灵也曾受过挫伤，他曾缀学一年——到一位姓万的家里砍柴、放牛。后来总算回到自己的家，得以完成小学的学业。

1953年，他考取了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正谊中学。二年后，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秋升入仙中高中。在中学时代，他担任过少先队的中队长和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多次被评为学习积极分子和三好学生。

1959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一个山沟沟里成长的孩子终于沿着理想之路来到令人激动的伟大首都北京，自豪地步入中国的最高学府，神圣庄严的学术殿堂。五年饱学后，他的心底里又萌发了新

的追求。学海无涯，他立志在学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经一阶段的充分准备，他参加了196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以优等的成绩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研究生。他的导师鲍觉民教授，名望颇高，造诣极深。他在这位老先生指导下悉心研究外国经济地理，在学业上有了很大的长进。

1966年8月，他研究生毕业。1970年，他开始登台执教《外国经济地理》课程。两年后，他请调回乡在母校——仙居中学任教。1977年9月到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先后担任政史地教研员、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教育局副局长兼县科协副主席。期间多次被评为局年度先进工作者。198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当选县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秋任台州地区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1984年12月省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台州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二

“学习与研究”是李相缪前半生足迹的概括和总结。在步上政治舞台之前，他是在学习与研究中渡过的。他凭籍着顽强的求知信念，不屈不挠地走过了艰辛的求学之路，渐渐积累了勤、情、专、记、问、力、思、精的学研秘诀，好学不倦，勇于探索。1960年6月至8月，他刚读完大学一年级就接到一项任务。根据西北和内蒙六省第二次治沙会议的决定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由中科院、北大和宁夏综合勘察队组织的一支130人的治沙与规划队伍进驻银川。不久，他在徐兆堂老师的指导下，承担了余北子公社和王乐井公社的综合考察，并撰写了专业报告。后来又赴长城

脚下的盐池县，调查长城内外的自然环境及经济环境，为宁夏、盐池县的农业规划提供了基础资料，并编绘了盐池县治沙规划图，显示他初次独立工作的才能。

大学五年，他象一块海绵，贪婪地汲取着浩瀚的知识之水。他的毕业论文《印度河流域的农业地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论文答辩中获优等级。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又悉心研究美国、加拿大和大洋洲的经济地理，为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的同志们讲课，积攒了丰富的资料。1970年正式执教后，他与施精华合作主编了40多万字的《外国经济地理》讲义，作为校内教材。教学中，他注重研究教学规律，课讲得形象、生动，富有魅力，且严密而饱含哲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艺术特色。

1972年回乡任教、搞教研工作后，他又开始了新的努力和探索。一方面，他部署各学科的教研活动，制订教研计划，分期分批组织各科教师学习、掌握教学大纲，落实“双基”，对教材、教法进行改革、探讨。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苦下功夫钻研中学地理教学大纲，熟悉教材，剖析重点、难点，注重知识的系统化、综合性和空间的地域观念，突出地理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综合分析能力。每到高考复习阶段，他都下乡巡回辅导。此外，他在教研过程中总结教学心得，撰写地理教研论文，如《地理比较法应用一例》、《浅析地理教科书中的插图及其运用》、《地理复习管见》十余篇论文在《浙江教育》、《地理教育》等省级、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或在省、地地理教学研究会上交流。他编写的《仙居县简志》一文，被收入《浙江省分县简志》一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于他所作出的贡献，在省内中学地理教研领域里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1982年他被推选为台州地区中学地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1984年被推选为浙江省中学地理教学研究会（首届）副会长；1982年成为省地理学会理事；1988年为全国地理学会会员。1988年4月由省中学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审核批准为中学高级教师。

三

1983年，历史将李相缪这位知识分子推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虽然在此之前的1982年，他被任命为县教育局副局长，但主要精力仍从事教学研究，负责教学管理工作。1983年秋后的情况就不同了，他已由原来的业务型干部向行政管理型干部转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特别是1984年担任台州行署副专员以后，他又步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从政。随着职务的变化，党和人民给他的担子也逐步加重。但他暗暗下决心，变压力为动力，努力、勤奋工作，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秉公处事，严以律己，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处理好每一件事。

1986年夏天，他作为全国科协三大代表赴京出席了全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行署，他协助专员分管文化、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体育、广播电视、宗教、档案及信访工作。在他分管的范围内，他认真贯彻上级的有关方针、政策，并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抓科教文卫领域的改革；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及时推广；

工作抓住重点，带动一般，突破难点，讲求实效。这七、八年来，台州的文教科卫以及计划生育等面貌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倾注了他的一腔心血。

李相缪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要有强烈的责任心、事业心；要勤奋、脚踏实地，求真务实；要反复琢磨上级的文件精神和要求，摸清底情，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是他从政几年的深切体会。他谦虚地说：“我所做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谈不上有什么显著的成绩与贡献。如果说做了一点实际工作，那末与党和人民的期望还相差很远。我愿在今后有限的工作之年，发挥自己的才智，贡献我一份微薄的力量，以报效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为关心我、期待我做出更多业绩的家乡人民再增添一些光彩，再传一点佳音。”

李相缪的人生历程已逾半个世纪，工作也近30年了。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他的成功，离不开党的关怀和栽培，离不开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和培养，离不开朋友、同志的热诚帮助，更离不开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和妻子的一片爱心。

李相缪，这位山沟沟里走出来的“书生”，正沿着他的理想之路，坚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去。

（吴巍整理）

从事冶金建设管理工作的回顾

华东冶金学院副教授 杨 声

我于1925年2月出生在仙居县湫山乡上田村，儿童时边参加家里牧牛、砍柴劳动，边在我父亲杨儒风创办的上田开智初级小学读书。后来随父亲工作的变动转到城关安洲小学、横溪羊草山中山小学读书。1938年考入刚从杭州迁入缙云县壶镇的安定中学读书。由于日寇的不断侵犯，又先后转入仙居广度寺的台州中学、天台县的绍兴中学及盘安县的宁波中学读书。1945年7月考入刚从内地迁回杭州的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在校期间担任土木系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同志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担任纠察。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我们浙大应届毕业生，于6月初集体参加了中共浙江干部学校政治学习班（我于8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9月初学习结业后，我们理工科学员统一由华东局转送到东北局分配，我被分配到辽宁鞍山钢铁公司采矿部小房身铁矿工作，並兼任矿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初调入刚成立的鞍钢基本建设处设计室工作，参加了恢复第二球团矿厂房结构设计及木材加工厂建筑设计等工作，1950年冬奉命带领数人去眼前山矿测量地形，用以安放抗美援朝军用贮油罐。我认识到这是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的一次难得机会，于是团结同志，克服风雪严寒等困难，苦干了几个月，提前完成了测量任务，受到领导

表扬。1951年苏联设计专家来鞍钢，领导安排我为苏联专家搜集设计资料。由于日本人临走时拆除了设备，带走了设计图纸，我们面对空厂房，不得不逐项测绘厂房钢结构尺寸及所用钢材规格，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将从某些关键部位割下的钢材短块，进行物理试验和化学分析以取得有关的设计资料。

1952年初，鞍钢设计院成立后，我被留在鞍钢基建计划处搞计划管理工作，负责管理当时恢复鞍钢建设的三大工程之一的无缝钢管厂等工程计划的编制和检查工作。我发现金属结构厂制作的钢结构运到工地安装完后，再搭设脚手架进行多遍油漆，这样钢材容易生锈并造成浪费，于是提出了钢结构第一遍防锈油漆由金属结构厂制作完后即在厂内进行油漆，第二遍由安装公司运到现场安装后再进行油漆的合理化建议，被公司采纳后受到了通报表扬。后来我参加东北工业部编写冶金建筑安装工程施工验收规范时，将这条建议纳入了规范，经批准后在全国推广使用，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1953年首次由我组织编制了鞍建总公司1954年技术组织措施计划，使技措经济效益超过了冶金部下达的任务，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1954年我组织编制了鞍建总公司独立附属辅助企业的产品定额和单价，并铅印成书颁发执行，为全面推行企业计划管理创造了条件。1954年9月，我被借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四个月，负责编制全国的建筑安装工程中的金属结构制作安装定额。接着又参加了设计概算定额的编制。

1955年初，在施工现场检查钢材合格证时，发现钢筋的实际屈服强度大多高于设计屈服强度。为了利用这种潜力，我提出了以钢筋实际屈服强度重新计算施工图纸上的钢

筋用量，以节约钢筋消耗量这一合理化建议（并附有钢筋换算公式），得到乔石处长领导的技术处专家们的重视，同意在有条件的工地上试行，并受到乔石同志的表扬。1955年下半年，受冶金部建筑局的邀请，去北京管庄冶金部干部学校为工程队长、车间主任学习班讲授建筑企业施工、生产计划管理知识达三个月（自编讲义），在全国冶金系统加强计划管理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6年初我升为助理工程师，当年被评为鞍建计划系统先进计划工作者。1957年初又被评为鞍建总公司先进工作者，出席了表彰大会。1957年10月，冶金部决定由鞍建承建甘肃酒泉钢铁基地。我被调入酒钢筹备处负责建设的前期工作。1958年8月1日，酒泉钢铁公司正式成立后，转入计划处计划科工作（副科长），组织编制了酒钢1号高炉系统三年建成投产的建设规划及1958年基本建设计划。1960年末至1961年初，由于自然灾害，中央决定酒钢下马，队伍分散转移到外地四、五个钢厂。

1961年3月，我们全家四人随队伍转移到江西新余钢铁公司工程计划处工作。后来因新钢实际储量不足，被迫下马了。我们于1962年9月被调入安徽马钢建设公司计划处，仍负责计划科的施工计划管理工作。

1964年，酒钢第二次上马，根据冶金部调令我于10月下旬离家（爱人王文华带两个儿子仍留在马建工作）去嘉峪关酒钢计划处工作（副科长、工程师）。1966年3月，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中央领导来酒钢视察时，要求酒钢1971年全部建成。我们计划科组织编制了酒钢建设规划及出铁战役计划、年季月基建施工计划。我经常带领科内同志深入矿山和厂区工地，帮助组织力量进行关键项目

小会战，加快了工程进度。可是不久“文革”风暴刮到了嘉峪关市，工程进度缓慢了，完成的投资额逐年在下降。我虽然仍坚持每天上班，继续组织计划会议，但来开会的却很少，后来会议也开不成了，真是心急如焚。1970年初，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革委会成立嘉峪关地区总指挥部，决定组织军民大会战，力争酒钢高炉于10月1日出铁。我奉命调入总指挥部的工厂战区指挥部抓施工计划和工程管理工作。为了能及时掌握工地施工动态，当天我就搬到现场指挥棚住宿。除睡觉吃饭外，全部时间用在抓计划、批材料，促进度、保工程质量。我们编制的综合作业计划和月度作业计划，都由总指挥部郭军长亲自主持讨论，会上各项工程进度一经决定，就是军令，非完成不可，否则就要检讨甚至受处分。这样经过三万军民五个半月的团结奋战，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愿望终于实现了，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当夜在战区一连写了五封信，将这喜讯告诉在仙居和马鞍山的亲人们。

1972年6~11月，我被借到冶金部基建局工作，为主编审了《冶金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统计指标解释和计算方法》、《冶金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管理制度》及《冶金工业施工预算管理制度》，经部领导审批后印刷成册颁发试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被冶金部借到浙江冶金工业学校干部培训班讲授计划统计课程至1977年6月，后又参加冶金部驻马鞍山工作组，抓马钢三大重点工程工作。至1977年底，工作组完成任务后，我于1978年2月被调入新成立的马鞍山钢铁学院（即现在的华东冶金学院）基建处工作（副科长、工程师），为钢院新建了数万平方米的教学和实验用房后，又转入新成立的经济

管理系讲授冶金企业管理、冶金基建经济与管理、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统计及投入产出分析等课程。当时我是副教授、教研室负责人。

在教学期间，我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我30多年来从事冶金建设管理的经验与现代化科学管理理论相结合，编写补充讲义，认真讲解。并带领学生去马钢、宝钢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实习，深受学生（特别是冶金系统在职干部培训学员）的欢迎，曾被评为学院的先进工作者。

在做好 ze 教学工作的同时，我也比较重视科研工作。1980年撰写了《冶金基本建设计划管理》，后编入1981年出版的《冶金工业基本建设经济与管理》教材中；1982年又撰写了《投入产出法在基建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在1983年的《基建优化》杂志上发表；1984年编著了《我国1990~2000年的钢材预测平衡分析》，在1985年的《华东冶金学院学报》上发表；1985年撰写了《技术进步统计》、《综合平衡统计》及《统计预测》，被编入1986年出版的《冶金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统计》教材中，并负责该书的主编和总审工作；1987年撰写了《技术进步经济效益评价和预测》，在1988年《冶金统计》杂志上发表；1989年参加冶金部计划司组织《钢铁工业生产指标计算方法》及《冶金工业生产指标填报目录及说明》二书的编写，并负责总审修改定稿工作（已由冶金部印刷成书颁发执行）；1990年参加编写了《冶金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规范》及《固定资产投资统计问题解答》两书；1991年编写了《黄金工业生产指标计算方法》及《耐火材料和焦化回收工业生产指标计算方法》等，均已先后发表。

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兼任了中国冶金建设管理协会华东分会理事；中国钢铁基建统计学会顾问；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华冶院组长；上海宝钢冶金建布技术服务中心咨询员；冶金部高级统计职称评审委员；马钢公司统计职称评审委员、华东学院经济系列职称评审委员；华东冶金学校学报编委等。现在我虽已离休（享受地市级待遇），但仍为上述一些学会做些理论研究工作。

项保华副教授简介

浙大教师科供稿

1957年8月出生于浙江仙居。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电机专业，同年进入浙江大学管理系管理工程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留校任教，经在职学习于1991年获科技教育管理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该专业方向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博士。1989年10月赴加拿大进修后按期回国，现为管理系副系主任、副教授。

项保华主要从事科技管理、技术经济、企业战略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主持或参加完成浙江大学科学基金、浙江省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论技术进步经济效益的定量评估”，由于抓住学科发展前沿并具有独到见解，被收入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牵头主编的《技术进步的评价理论与实践》专题文集，受到国内同行的好评，先后有近十个单位与课题组专门来函或派人索取详细资料，目前这本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已成为我国该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发表在《光明日报》经济学专栏上“浅析两权分离的实质”一文的精辟见解，现已为我国近年的改革实践所证明。

在教学方面，已主讲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课程5门，主编或参编完成校内讲义4种，分别以第一作者、参编者、第三作者公开出版教材《现代西方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分析》、专著《技术评估——理论、方法与实践》并获浙江

大学教育研究成果二等奖、三等奖。近年来，还获得浙江大学科学技术奖，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优秀论文奖，浙江省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三等奖，浙江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奖、亿利达优秀教师奖等。目前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国家教委级青年专项研究课题、国家教委留学回国人员基金、浙江大学科学基金等5个项目的研究工作。

项保华思想活跃，工作大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他认为：学术上应该教学相长、学生超过老师；工作上应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为人上应襟怀坦白，真诚待人。

吴森林副教授简记

应建红

吴森林1934年5月出生于原田市乡吴桥下村，1948年从田市小学毕业后他升入了仙居中学，仅读了一年因解放初社会动荡而休学。在休学的二年中，他虽年仅十六七岁，却当上了村文书、村长和乡民兵联防队长。还参加土改工作。1951年他重返校园，跨入了横溪正谊中学校门。1953年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临海回浦中学。1956年考入了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科学学习。

那时正值高等教育大发展，急需大量高校教师。吴森林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出色的表现提前毕业，1957年9月留校，负责人事、保卫、团总支书记工作，由于他踏实肯干，1959年被评为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0年担任了数理系党支部副书记，并兼任物理科主任，着手创建温师院物理科。

1964年该校撤销，吴森林被调到杭州外国语专科学校工作，参加筹建英语专业，并担任校团委书记职务。在此期间，他努力钻研理论，勤奋好学，在《浙江团讯》等杂志上发表了許多文章。

1970年该校与杭大合并，吴森林转任杭大政工组组织办公室主任，1978年任杭大人事处副处长。1984

年机构改革后他当了5个月的学校统战部副部长。

1984年9月，杭州大学新开设了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吴森林担任该系总支书记兼系副主任，担负起筹建新系的重任。计算机系初建，困难重重，首先碰到的“硬件”问题——学校在原有老房上加一层，成了他们的办公、教学、实验场所。另一“硬件”就是机器，学校一时拿不出大量资金购买新计算机，他们就搬出原有机器整修后将就使用。这些都好说话，而最大困难莫过于“软件”——人才难寻。除了抽调本校计算数学专业、物理系无线电技术专业、计算中心等骨干教师外，他还不辞辛劳两次出差北京、天津、济南、南京等地物色人才。几经周折，计算机系总算搭起了架子。经过这些年不断努力，现在计算机系已初具规模，成了全省有计算机硕士学位授与权的两个计算机系之一。到目前为止，他们已送走六届本科毕业生，培养了五届研究生，该系成了广大考生向往的知识圣殿。

在30多年中，吴森林到过三所学校，参加过三个新专业筹建，从事过组织管理工作，也从事过党务、思想政治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了一辈子”。

1990年他被评为校优秀党员。1991年9月被聘任为副教授。最近他所指导的《海宁县计算机应用发展》社会调查论文又获得全校一等奖。

自学成才的副研究员李福民

应建红

李福民的学历不高，可他却硕果累累。凭着所完成的研究成果和作出的突出贡献，1988年10他获得了副研究员职称。他现任《浙江省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副主编、《浙江省科技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此外，他还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村能源研究会理事、浙江省科技情报协会理事、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省能源研究会理事。

1985年8月他还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聘请为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对于李福民来说，这一长串头衔是他能力和成就的最有力证明。

李福民，1929年3月出生在仙居县溪港乡一个叫上麻才（念āo音）田的仅1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抗战爆发那年，他进了缙云县仙都小学读书。三年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缙云，连日的空袭，迫使学校转移。李福民也回到了仙居溪港小学就读。194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湫山洋小学，同时升入仙居简易师范。

那时候李家很穷，李福民的两位哥哥过早挑起了帮助父母维持家计的重担，未能在校园里呆上一天。即使这样，父母还是养活不起他们兄弟五人，为生活所迫，他的两位弟弟被送给他人作了养子。李福民能读到师范毕业已是不易了。

困难再大也扼杀不了一颗渴求知识的心。缀学了二年之

后，1948年李福民独自背起了小行囊，离开家乡去报考杭州师范学校。因各种原因，他未能考上。为生计所迫1949年5月他进入杭州下城区职工子弟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边自学，边工作。

1953年李福民被调任刚成立的浙江省科普协会宣传组长，正式走上了搞科技普及与推广的道路。1956年任省科普协会宣传部副部长。

正当李福民顺顺当当地工作时，不测风云漫天卷过。1957年他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回来后向全省科技工作者传达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所作的关于重视知识分子的报告。在反右斗争中，李福民为此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以替代农业技术指导员为名，变相下放农村、畜牧场，当了猪倌。

此后，中宣部和中国科协联合组成调查组来浙江，调查“为何浙江省科普工作一落千丈？原先搞科普工作的人哪里去了？”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原科普这班人多数下放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去了，有的甚至当了猪倌。“这不行，要让李福民他们回来搞科普工作。”这就是调查组的结论。

1961年李福民回到了科普协会重新负责起科普工作。

1968年李福民被调到省科技局从事《科技简报》编辑工作。1970年转入新成立的浙江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经省科委党组研究决定，1978年李福民任省科委科技情报研究室主任。1990年浙江省科技编纂委员会成立，他挑起了科技志筹备、编写工作的重担。

40多年来，李福民不懈追求，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自学，并潜心于科技普及推广和科技情报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卓著成果，他先后参与完成了40多个研究课题，其中

32个项目获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16个科研成果获省、部、国家各类成果奖，并在全国各种出版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13篇，科普文章30多篇，总计逾50万字。

浙江是一个典型的缺能省，能源供应不足严重制约了浙江的经济发展。为此李福民通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与有关同志一起于1979年底完成了《浙江能源资源的评价及其对策》科研报告。薛驹省长作了批示，他们的意见被省委省府领导采纳，并被列入省府的“浙江经济发展纲要”中，同时得到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张定一的肯定。1980年他参加全国能源政策座谈会之后，给省委、省科委写了座谈会情况汇报，并针对我省实际提出了几点建议，受到省府和省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1983~1984年，李福民参加了全国乡镇工业用能调研课题组，进行“全国乡镇工业用能现状及本世纪末用能需求预测调研。”1985年该项目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李福民是该调查报告的主要执笔人。在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国家科委、计委、经委主持的，由中国能源研究会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能源技术政策》的制订工作。并是《新形势下的能源问题和对策》课题调研报告的主要执笔人。特别是在“乡镇企业用能现状分析”、“经济发达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合理化”等方面，为该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和观点，还是该专题的完成者。1988年4月《中国能源技术政策》获国家重大项目科技进步一等奖，该政策为国家领导人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985年，他与有关同志一起，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完成了《浙江省科技发展长远规划能源专题论证》科研项目，并通过省科委专家组论证鉴定，他写的该论证报告被列入

《浙江省科技长远规划》系列报告之中。

1986年李福民单独完成了《浙江能源调查与对策研究》科研报告，获得“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情报事业创建30周年纪念”评选的科技情报成果二等奖（证书编号科情86—2—042—1），同时以他为主完成了《浙江省“六五”部分获奖科技成果效益调查与评价》报告，该成果1988年获省科委科技成果四等奖。1986年《浙江日报》刊登他的《不用烧的砖》科普文章，获得了全国报刊广播优秀科普作品奖。

1987年他的《定量分析在情报研究中的应用》论文，在全国情报研究方法论学术讨论会上被评定为优秀论文二等奖，并被选入《全国科技情报研究学术论文集》，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还参加了介绍我国近40年来建设成就的“当代中国”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的浙江》（上、下）分册编写工作，完成了三万多字的第25章《面向经济建设的科学事业》的撰写工作。

1988年12月浙江省科委举办的浙江省科技情报成果评奖中，李福民领头完成的《浙江省能源开发利用现状和前景》课题获二等奖；《浙江省科技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获三等奖；他的《科技促进浙江纺织业结构转变对策研究》成果获浙江省科技情报成果二等奖。

目前，李福民正集中精力搞《浙江省科学技术志》一书的编纂工作。该书以述写近150年来浙江科技活动为主，还将上溯到7000多年前河姆渡文化科技史，涉及400多学科，是我省科技战线基本建设的一项大工程，受到省委省府领导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目前正处于资料收集整理、篇目设计、编写长篇阶段，现已积累了3000多万字的资

料，还需把它提炼成约160万字的著作，预计1995年可以完成。

凭着突出贡献和成就，1988年李福民被破格评聘为副研究员，成了科委中唯一没有大学文凭的高级知识分子。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副教授 李石民

一

1929年12月19日，我出生在原田市区寺前乡董岙村方宅。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即长期到外地谋职。父亲毕业于仙居旧制中学。叔伯们大都读过书，或教书或经商或种田，这在只有六、七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已是望族了。我的家，靠母亲一人支撑，我在高迁外婆家度过我的童年。外婆家在高迁也算一个望族。鼎盛时，开有药店、南货店、染布店、肉店，并有不少田地，外公有肺病，我幼年就生过淋巴结核，靠药罐保住命。外婆一家大小无不疼爱我，但我却滋生了寄人篱下之感。一次，发生了不顺意的事，我逃跑了。黑天，穿过令人丧魂落魄的坟坦松树林也不害怕，一直往外跑，到了田市已是上更时分，有心人见一个小孩单身一人在走，拉住我问，我说明身份，因为我外公名气大，便留我吃饭，后把我往外公家送，半路上与四处出来寻找的一支人马碰头。那时我才七岁，是反抗？是寻找自由还是倔强自主意识的表现？我不得而知。

在高迁读小学。第一年专爱闹爱玩。一次，石头甩破一个同学的头角，校长把我叫出来，用戒方狠狠的打。留了一年级。从二年级起，年年第一名。中学时我同时考取了台州中学和仙居中学，在台州中学读半年之后，堂哥约我同去考

锦堂师范。锦师三年，年年是班级前三名公费生之一。锦师的学术气氛很浓，他们办的《新文艺》杂志，连郭沫若的稿子都约来，我当推销员。在那里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

1946年8月，我靠了初中毕业文凭，改名李洪仙，考取临海师范普师科。在学生会里担任剧团团长。还代表学生，因奢米饭、腌菜汤吃不饱，到教育局向政府请愿。1948年春，转学到省立湘湖师范，那是陶行知创办的一所著名的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是一位教育家，许多教师都是知名学者，我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由地下通道，从香港搞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及苏联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我啃过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我把《白毛女》改编为话剧《年关》，由醒民剧团公开演出，自己还扮演了角色。1948年底，湘师师生遭大逮捕，有的老师和同学也转移避难。湘师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们也如惊弓之鸟。一个月明星稀之夜，陈泽深（仙居人）约我到操场的角落里，同我商量投奔革命的事。通过反复考虑决心出走，在地下交通线掩护下，到会稽山诸暨陈蔡，投奔浙东人民游击纵队。后来得知陈泽深被划为右派，至今不知其下落。

二

当年的陈蔡，人称“小延安”。京（南京）、沪、杭、甬、萧、绍、婺等地的知识青年，都把她当作革命摇篮，不顾生命危险，晓宿夜行，爬山涉水，纷纷投入她的怀抱。1949年4月，我从浙东燎原干校毕业后，到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当干事，曾是第一任浙东工委书记兼台属特委书记的刘清扬，此时任浙东行署秘书长，他得知我是仙居人之

后，便常常找我聊天，谈仙居在台属及浙东武装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他派我给警卫连的战士讲《城市政策》。这是我教学生涯的开端。

1949年5月7日，我随纵队司令部参加解放绍兴战斗，从此我就留在绍兴。我先是接管绍兴师范，后来从事青年运动，任团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市工厂民主改革工作队副队长，搞完民主改革之后，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党史教研室辅导员。1954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除了教学之外，精力都投入进修，搞了五年和十年规划，攻读博士学位，要求掌握两门外语。我先修俄语，空下来就背单词，翻着词典读俄文版《联共（布）党史》。

1956年，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搞试点工作，省领导定期听取汇报。我还到绍兴等地作农村调查。1958年以前，我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学习》杂志（浙江）和省委党校校刊《实践》上，发表论文、杂文、讲话等20多篇。省委宣传部召开理论座谈会，我作了《关于百家争鸣》重要发言。还应约为华东人民出版社撰写了思想修养读物《个人与集体》书稿。省委党校反右派运动是1958年5月补课的，在此之前我随省委工作队在衢县搞机关及反右和农村社教。由于我写了《和风细雨和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画像》以及批评干部工作缺点的《两种荒芜》等一系列杂文，补课中我成了重点斗争对象。他们编印了《李石民言论集》专册，并配有漫画，抄走书稿和笔记本。我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农村监督劳动”。

三

在逆境里，我的第一精神支柱，是我的伴侣。她始终如一地爱我，安慰我、鼓励我。她绝拒了一切“有心人”的劝告和警告，不和我离婚，只希望我能摘掉帽子，做一个白身人。我迟迟未能摘帽她也不抱怨。这种无私的真纯而崇高的爱就足以使我在任何环境下坚持下来。她叫章鹤珍，诸暨城关人。1962年我被遣送回乡后，她调回原籍，在偏远小镇的一所中学里，工作了12年。她一辈子教数学。她的人生格言是：勤勤恳恳工作，清清白白做人。

冬春两季，我都天未亮就起床，拾狗粪，无偿投给生产队。我为社员们针灸治病，为他们写信、记帐、抄佛经。总之，凡是我力所能及的，他们要什么我都给。一次我吃红头麦（在田间霉变的麦穗）麸糕食物中毒大出血，上吐下泻，乡亲们抬着我到白塔卫生院抢救。我体弱劳力差，他们帮我、教我、原谅我，是乡亲们的爱护和教导，才使我站立起来，在学校畜牧场时，我染上肺结核，体重只有70市斤，人称“活骷髅”，但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一直在想：不能死，得对历史有个交代。

回乡之后，我疯狂地读书。躲在小楼上，一盏青油灯，常常坐到半夜三更，独自问天问地问历史。我把《论共产党员修养》奉为经典，把新版和原版对照起来，一字一句反复咀嚼，我把村里三教九流的书都找来，把祖传的科举应试必读都借来读。我化了二年时间，写了一部长诗《龙潭三部曲》，写一支游击队斗争历史故事3000多行，也陆续写一些心得，有13篇，编为《杂文集》。我将它视为珍宝，连到诸暨探亲时，都随身带着，怕在家里被火烧了。我想，即使我死了，有这两样留下，也可明我的心迹了。“文革”中连同我的“改造日记”、读书笔记共九市斤均被造反派抄

走，改正后，我到有关部门查询，答复同是：早就烧了！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正决定中给我留下“有右派言论”这样一条尾巴，不给我恢复党籍，这个打击比当初划我为右派还要大。因此，我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到绍兴之前，就曾辗转执教于仙居城西、城东五七、诸暨红门、朱家站、湄池五所中学。对一个废弃了廿多年而且原来并非此专业的人，叫他立刻上台讲授高中毕业班的语文和历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我必须攻下这道难关，我拜张春林为师，与他一起备课；我用三斤棉花做了一件棉大衣，以便严冬熬夜，六年辛苦不寻常，我不仅熟悉了中学这两门课的全部教材，而且还通读了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有关教材，掌握了一定教学方法，在教坛上站住了脚，在此期间，我还写散文和小说。为了检验自己的思维能力、记忆能力、反应能力以及意志毅力和效率，看是否还能和年轻人并驾齐驱再干一场，我参加了首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按时毕业。我是全省年龄最大的一个，记者在我家里谈了半天，我劝他不要发稿，在我政治上走投无路的时候，老领导杨光给了我热情帮助。1983年，新的改正决定割去了尾巴，我恢复了党籍。

1984年暑假调到绍兴市委党校任教。1985年暑假到北京参加人民大学与北大联合举办的中国革命史讲习班进修。当时正是从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时候，我的讲课颇受学员们发自内心的共鸣与赞赏，这是我生平最大的慰藉。我被授于讲师职称。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发表了党史、党建、基层政权建设三方面的论文及回忆录共

20多篇。1989年底离休。离休后，应约主笔《绍兴市志·社会科学志》、《大事记》（上下七千年），撰写自夏禹、勾践至两晋南北朝人物传41人。还在《绍兴学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春秋越国考释》。我象老牛一样一口一口在反刍，梦想着为人民多挤几滴奶。

红色学者

——记杭州市委党校方荣湘副教授

应建红

方荣湘，1937年10月出生于原方宅乡方宅村，1947年初小毕业时因家贫失学，而当了放牛娃。

1951年方荣湘重新跨入方宅小学校门，1953年小学毕业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仙居中学，在中学里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历任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副书记等职。

1956年还是中学生的方荣湘成了县人大代表。1958年他考入了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同年被评为浙江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0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高等教育大发展，急需大量教师，方荣湘因品学兼优被提前毕业留校当了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1970年，浙师院分为台州、丽水、金华三个师专，他被分配到台州师专搞筹建工作。1972年他进入台州地委干部办公室工作。此后，因工作需要他当过杭八中政治教师，筹建杭州莫干山中学，也到过杭州市教育局、杭州市文教体卫办公室工作，还担任过杭州市委教卫部组织科副科长、市教卫体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市委组织部部委成员、办公室主任等职，1982年被评为市级机关优秀党员。

1985年7月，经杭州市委研究决定，方荣湘被调任

浙医大杭州分校担任党委书记职务，肩负重任，如何开展工作？方荣湘首先考虑从抓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入手，为此他确实是动了不少脑筋，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一年多努力，终于在分校培养了一支有战斗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并建立全方位立体化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全校出现了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学生奋发读书的可喜景象。1986年底，他总结了《收费走读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经验，在全国职业大学的第一届年会上作了交流，并被刊登在1987年第一期《高等职业教育》杂志上。

此外，他在该校的一些做法和取得的良好效果，很快受省委省府领导的重视。1987年7月省委省府办公厅《信息通报》向全省印发了《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分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文，并报送中央办公厅。全国性刊物《高教研究》、省委宣传部《宣传通讯》也撰文介绍了他们的经验。1987年8月9日《浙江日报》以《树人之计——浙医大杭州分校思想政治工作纪实》为题，9月3日《人民日报》以《学生上学虽自费，思想工作不自流 浙江医大杭州分校抓紧走读生教育》为题报道了他们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绩，同时《浙江教育报》也撰文予以报道，影响遍及全国。

1989年9月，经省、市委研究决定，方荣湘担任了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这职原来一直是由市委副书记兼任的）。这样他又担负起重要理论宣传阵地的的工作。通过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杭州市委党校面貌焕然一新，现在这里成了让市委、省委真正放心的地方。

他不仅是一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人，在学术上

他也有所建树。在1985年中央召开的全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会议上，方荣湘的《狠抓典型案例查处，把知识分子工作推向纵深发展》论文作了交流，并被印发至各省、市、自治区。1987年掀起医德教育，从本校实际出发写了《深化医德教育，造就合格人才》一文在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交流并被收录入《论文选集》中。第三期医大分校学报上刊登了他《谈谈深化医德教育》一文。同年七月他的《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努力培养合格人才》一文在浙江省高等专科学校教学质量检查总结会上作了交流。1987年10月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会年会上方荣湘宣读了《也谈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论文。第四期浙医大杭州分校学报还刊载了方荣湘与他人合作写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抓住根本》一文。1989年1月他被评为副教授。

近几年来，他还从事着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工作，并担任杭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职务。1991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一书，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杭州市进一步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

来学校工作后，他的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1991年第三期《浙江党史》发表了她的《反对和平演变与反腐败斗争》论文，同年7月29日《杭州日报》“学与思”专栏也刊登他这一文章。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和平演变》一文，在《教学内参》上发表，福建省委党校《教学参考资料》全文转载此文，同时成了杭州市委党校和福建省委党校反“和平演变”理论教材，该文同时也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领导参阅》全文转载，被中央党校《社科信息文萃》

列为反“和平演变”重要文章索引之一。此后，他还发表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启示》、《西方敌对势力为何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当今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主要形式》等一系列论文。今年7月，团结出版社又将出版他20万字《反“和平演变”研究》学术论著，向全国发行。

方荣湘是杭州市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共七届市党代会代表，1991年被评为杭州市优秀共产党员。

1991年9月他被浙江省委党校聘为全省党校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兼政治学科组成员。

骨科教授张光健简介

祖籍仙居的张光健1935年出生于上海市，195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现任上海医大骨科教授、上海医大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全国外科金属植入物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骨科学会会员、中国神经伤残康复研究会秘书长、上海市和徐汇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外医学》创伤分册杂志编委。

张先生技术全面，涉足于骨科、手外科和显微外科，成就卓著。他先后发表论著50篇（本），其内容为——编写骨科教科书和参考书；骨络血液供应的基础理论研究；异体骨的制备、保存和应用；骨膜切除术治疗早期类风湿性关节炎。该项目获1982年卫生部颁发的乙等奖；人工关节的临床应用和修正性手术的改进；显微外科技术应用于创伤外科，他率先施行急症皮瓣，获良好效果；还从事周围神经的修复与康复研究工作，成效显著。

张先生现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并参加博士研究生导师组。1985年与1989年两次赴埃及、瑞士参观学习与学术交流。曾先后两次被评为院、校级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评为上海市职工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并获上海市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十佳好事奖。”

（吴 巍 整理）

潜心探究 妙手回春

——记宁波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王文敏

吴 巍

身为主任医师、副院长的王文敏满头银丝、文文静静，很有学者风度。他十分谦虚，没有一般“学者”与“领导”的派头。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经历没什么可以写的，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事，后来在笔者的再三坚持下，才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

王文敏1932年出生于杭州，抗战爆发后，随父母逃难回到仙居老家。在山清水秀的横溪中山小学，他受完了启蒙教育。中学是在宁波念的。那辰光，他和千千万万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吃着干菜豆腐，在桐油灯下苦读求知。记得入学时，他肩挑包裹，从仙居的横溪步行到宁波，居然走了廿多天。那份辛酸，那份求学劲头，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难以置信。抗战胜利后，他的家又迁到了杭州。到他高中毕业时，刚好宁波解放。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而进入浙江医科大学。1954年7月，他以优秀成绩从浙医大本科内科系毕业。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宁波市第一医院工作。1961年6月调到第三医院任内科负责人，不久被任命为内科主任。1984年，他升任三院副院长，还兼了二年的内科主任。他在三院默默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1981年，他被评为副主任医师，一年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因其优异的业绩而被评聘为主任医师。

他还是七届、八届的市人大代表，浙江省医学会消化学会会员。

作为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他十分注重临床实践，为医院添置了许多贵重医疗仪器；建立了免疫实验室，对提高医疗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狠抓了医护人员的业务提高，以各种形式开展大量的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作为医生，他以“一切为了病人”的思想贯穿他的整个工作。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第一线工作。因为他认为，尽管设备是最先进的，但到目前为止仍逃不出经验医学，离不开临床实践。

因此，他不但经常到各医院和基层医疗单位会诊，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年届花甲的他仍然坚持每周下午看门诊、每周两次查房、一次亲自做胃镜。由于他的名气大，求医问药的病人特别多，因此不得不经常加班加点，但他并无半句怨言。

他原来搞普通内科，70年代中期他率先在市医学界使用纤维胃镜检查病人，从此他专门研究消化系统。目前宁波市消化系统的医疗、研究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地位，这其中离不开他的贡献。

若问他这一生挽救过多少生命，他只淡淡地一笑道，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这确实是普普通通的事，算不得什么。不过，他记忆深处的有些情景却仍很清晰。

一位老太太呕吐不止，消瘦，家人送她住进市区某医院，过了好些日子病情也不见好转，便忙着准备后事。不知怎的，有人七转八弯将老太转送给王文敏医师诊治。他仔细观察后，很快发觉老太肠梗阻明显，拍片结果发现，有胆石嵌在老人肠里，便立即施行了手术，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

回来。

有一次，他在查房时发觉一位年轻医生的诊断有误。一名老年病人已使用了一周止血药还不见效，他就分析病人得的可能不是一般的“消化道出血”，而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尽管得这种病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当时同行们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但防疫站的检测结论很快证实了他的判断是准确的。

他常常感慨地说，对病症诊断不明是医生最大的心事，为此，他常常为此寝食不安。有一年逾半百的女病人上腹部疼痛不已，门诊部医生把她当作胆道病处理。刚巧第4天碰到他看门诊，他仔细一看觉得不对劲，在病历卡上写下“胃潴留”与“胃癌”可疑，并立即将其送往病房。经X光拍片后，证明他所断不差。

王医师说，记起这几件事，只不过为了说明医生“谨慎诊断”的重要性。

从王医师的身上，可以发现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那种虚怀若谷、严谨治学、扎实工作，对事业极端负责的高尚品格。

几度辛酸几度甜

上海医药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王茶仙

1936年12月26日我出生于仙居县杨府乡坑口村。父亲是国民党法院法官。解放后我随父亲回到仙居，在仙居县中读初中。当时对共产党解放军崇拜之极。有位解放军军官常来学校，鼓励我“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自己选择，要听党话跟党走，与反动家庭坚决划清界线”。我深信不疑。在一篇《我的父亲》为命题的作文中，我写了我所知道的父亲和家庭的一切情况，无疑这是篇揭发材料。不料作文本子被父亲检查课时发觉，我成了家庭的内奸、叛逆和罪人，被打得几乎死去。不久，就为我找到婆家，将我嫁出，以防止进一步“祸害全家”。我曾经轻生，未成。当时我年仅14岁。

1952年我历尽艰辛来到杭州，考取浙江省立杭州女中读高中。这是所人才辈出的优秀学校。我为之激动万分，发誓要努力奋斗。三年来人民助学金哺育培养了我，我日以继夜刻苦学习，每逢节假日参加勤工俭学为老师和归侨同学洗衣被，做过保姆、家庭教师……，功夫不负有心人，1955年我以全优成绩毕业于杭女中。但由于家庭关系而没能考取大学。

1956年我到上海进煤矿设计院任练习生、助技等工作。1958年考取华东化工学院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并调至上海化工设计院工作（即目前工作单位——上海医药设计

院)。1963年由化工学院本科毕业。1978年第一批晋升为工程师。1985年第一批被评聘为高级工程师。1988年兼任副主任工程师工作。我曾先后去西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考察、做合作设计。

我曾担任和完成30多项国家大中型工厂的总体设计工作。其中北京同仁堂制药厂、珠海丽珠制药厂、四川长征制药厂及全国最大的中原制药厂和金山上海石化总厂等工程均分别获得设计院和国家级优秀奖。其中四川长征制药厂和上海石化总厂的设计还得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在培养新生力量上，我数次接受化工部培训中心的任务，编写教材，为全国化工系统年轻设计人员讲授专业课。在设计工作中也培养了年轻设计工作者，我的学生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多次出国考察，担任重大项目的专业设计负责人。为此我深感欣慰。

作为女人，我还有做母亲的责任。我有两个相依为命的女儿。大女儿陈慰，小女儿陈瑾，我因设计工作需要常年出差在外，年幼的孩子就托给邻居，稍大些后，姐妹俩颈上挂把钥匙，去里弄食堂吃饭，晚上由设计院阿姨们轮流作伴。我爱我的女儿，但我更爱我的事业。然而亦为女儿的苦楚深感内疚。出差一回来就把所有业余时间和精力给了我的女儿。

1976年以后，我为女儿们补习功课。我说“人生有限，必须自小努力”，我要求她们争气，“争气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我两个女儿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下成长了，大女儿陈慰1988年被国家公派去日本大阪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秀同年获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节约了国家开支。1986年，小女儿陈瑾也考取了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并获得最高奖学金。1991年12月13日

通过第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现已获得哈佛大学遗传学和医学双博士学位，今年初开始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陈瑾在第二博士论文的首页上写着“我谨以我的论文献给我敬爱的母亲，有母亲超人的远见、智慧、勇气和爱心激励我完成此篇论文”。我曾两次出国，去美国和日本探亲，看到女儿们在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增光，为我争气，我无比欣慰。

我是个极普通的人，但又是个终生努力奋斗的人；是个满怀爱心、视女儿高于自己生命的母亲。回首往事，真是几度辛酸几度甜！

人生“之”字路

唐山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王相水

我是仙居杨府乡人，出生于1934年正月，1942年上小学，1948年上仙居中学，1951年初考入台州中学高中部。同年7月，响应政府抗美援朝号召，参加解放军，先后在济南、合肥、南京、无锡等医校、医院、部队培训实习。1956年由部队复员，回家后将复员费还清父母欠生产队的债。经过一番努力，于同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大学5年生活过得飞快，1961年毕业，在北京朝阳医院外科工作。1972年被下放到陕西临潼，任陕西省炼化职工医院外科副主任。唐山一场毁灭性大地震后需要大量人才，1982年领导又将我全家调来唐山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外科工作至今。1978年升为主治医师，1987年升为外科副教授和副主任医师。

在部队时因学习努力，能团结帮助战友，曾立三等功三次，团内通报表扬一次，1984年因教学成绩好，被评为医学院先进工作者。我入团很早（1950年），入党很晚（1989年）。

工作以来，在国家级报刊杂志发表小论文5篇，省级9篇。发现了骑自行车与女性外阴部瘤样增生，穿高跟鞋与趾甲下出血关系。从生物力学观点研究膝关节结构与功能关系，较好地解释了某些膝关节疾病的发病机理。阐述了气葫芦症对腹部疾病的诊断意义，提出了腹部反跳痛的另一种解释。

1970年冬，云南建水、玉溪一带发生大地震，我参加北京医疗队，星夜兼程，飞抵云南灾区救灾工作达两个月。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参加陕西医疗队来唐山救灾一个月。1963年夏秋之交，河北省中部地区发生水灾，参加救灾工作一个月。因此，对灾害抢救工作获得了一些经验。

学医和从医工作40年来，一直热爱本职工作，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当医师是一门话到老学到老的职业，我的体会是，看病这个行当要认真，不能马虎不负责任，要一心一意为患者着想。

1956年当我拿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时很高兴，接着向本村一位健康漂亮的姑娘求爱成功。1960年冬，我从上海返回杨府，在女方家完婚。当年正值困难时期，无宴席，无婚礼，也无贺喜打闹的人群，买了2斤特批的猪肉，烧了几碗点心请客就算完事。当晚，还为村里写了半夜标语。转天，妻要去温州开运动会，我去修东岭水库。第三天，我返回上海。以后，我们有了4个孩子，二女二男。在北京11年，我是单身生活的。1972年，我从北京返回杨府，带着老母、妻子和4个子女西迁陕西临潼骊山脚下。从此，才算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1955年冬，在南京第六军医学校学习，正当满怀信心投入毕业考试时，我们十几个学员因各种各样问题突然被取消考试资格，只算结业，予以复员。35年后，即1991年，当年参军的100多名学员又汇聚南京开了一个同学联谊会，其中绝大部分已转到地方，只有三五个仍在

部队服役，官至大校。1956年后，该校改为南京铁道医学院，归地方所有。在老同学联谊会上，原老校长、政委也参加了，他们告之，总政卫生部为落实政策，给受错误处理的同学补发南京铁道医学院毕业证书。真是喜从天降。天哪，我念了两个医学院。

回顾以往，我从中学到大学，学习成绩在班里前五名，但工作后成绩平平，不出众，主要是缺少创新精神。所以我想学习好不值得自傲，学习差点不应自卑气馁。学习与工作既是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的。

如果说，“之”字上面一点，代表我呱呱落地，其下面弯曲的行程就是我走的人生之路。几进几出仙居，喜忧参半，心情复杂。俗语说，人往高处走，所以也可以说，“之”字上面一点象征滴着血的太阳，从东海冉冉升起。人自出生之后就沿着这条曲折的道路去迎接、拥抱太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历经磨难和坎坷，最后终于迎来改革开放，政通人和，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好时光！

仙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希望仙居与全国一样，共同繁荣、富足、昌盛，人民幸福！

作为医生，退休之后我还想返回家乡，继续为家乡发展做点工作。最后希望能将自己的骨灰与家乡的泥土混在一起。

把毕生献给边疆卫生事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麻醉科

副主任医师 应云和

我出生在仙居县双庙乡解放村，幼年就在那儿上学，中学就读于仙居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南峰山），毕业后考入临海台州医院护校，1953年初毕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服从统一分配来到祖国西北边疆乌鲁木齐。当时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与家人告别，从学校到杭州集中，由新疆卫生厅派人来接，我们一行20多人，来自台州、宁波、杭州等各个医院。那时火车只通到兰州，从兰州到乌鲁木齐要坐汽车，有4千多里路，而且是大蓬车，没有固定位置，臀下是行李，头上是车蓬，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杳无人烟，寸草不长，更谈不上森林田野。这里属于大陆性气候，早晚凉中午热，车内闷口又渴，路面尘土飞扬，车轮滚动，无风尤如一条龙，有风满天黄。头巾、风镜无法挡，每到傍晚下车时变成了泥人。在那艰苦的旅程中，由于长时间颠簸劳累过度，有人生了病很想家，但没有人中途返回，就是有病也坚持到底，大家不怕苦和累，也不怕风吹沙打，坚持再坚持，终于风尘仆仆到达目的地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解放初叫迪化市。作为自治区首府，没有一栋高楼大厦，人口虽有数十万，但柏油马路仅有数百米，公共汽车极少，以马代车，当地人叫“六根棍”，交通极为不便。我分配到省人民医院当护士，这是新疆最大的医院，它

分为一、二部，都是平房。全部职工数百人，床位二百张，医疗设备简陋。从南方来到这里工作的人，首先要克服生活关和语言关。饮食上，这里全是清真灶，以牛羊肉和面食为主，一周能吃上一餐米饭就算不错了。为了尊重民族习惯，难得吃猪肉也得背着人吃。烧锅不能共用，否则发生纠纷要受批评。在交往中语言不通，与病人讲话要翻释，所以到新疆来，就得向当地同志学习语言以便工作开展。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建设，随着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卫生事业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乌鲁木齐也变了样，如今高楼大厦林立，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成了现代化城市。我们医院也旧貌变新颜，现有职工1500多人，病床位1200张，各种医疗设备齐全、先进，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难、尖学科亦已开展，该院现被评为全国三级甲等成为现代化大型综合医院。1962年我从“业大”医学系专科毕业，由原护士长改任医生，从事麻醉工作，至今已整整30年了，1981年我被评为麻醉主治医师，1987年又被评为麻醉副主任医师。麻醉工作是外科领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病人手术治疗的成功是外科医生和麻醉师共同配合的结果，有人说麻醉师是无名英雄，出力不讨好，风险大责任重。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下班后被叫去抢救病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半夜来了两名被歹徒刺伤的病人，由于心脏刀伤，合并急性心包填塞、失血性休克，呼吸急促血压听不清，病情十分危重，我从家中匆匆进入病房，就立刻投入工作，由于及时抢救得法，手术成功，但病人出院后感谢的却是外科医生，真是绿叶衬红花，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然而每当抢救成功，我却为自己的成绩而自豪，也常受到医院领导和组织的表扬。

热爱本职工作，把一生献给边疆卫生事业，这是我的愿望。1959年结婚后完全可以调到南方工作，但我热爱边疆，热爱家庭，就再三动员爱人，从湖南调来新疆，为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由于扎根边疆、安心工作，我获得了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颁发的“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及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1985年颁发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我在医院近40年，没有显赫的成就，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努力钻研业务，在无影灯下，默默无闻地工作。麻醉工作不仅要有丰富的医学知识，而且要有熟练的操作技术。只要工作需要随叫随到，救死扶伤是我的神圣职责，因此多年来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1989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获得“自治区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在业务方面，获本院科技成果奖10多项，发表论文或总结经验10多篇。其中全国第五届麻醉学术会议发表《休克病人的麻醉》一文；第二次全国包虫病会议上发表论文一篇；西北五省麻醉会议发表论文二篇；自治区麻醉会议两篇；在院刊上发表多篇文章。成绩仅说明过去，这是党的培养和同志们帮助的结果。今后还需继续努力，不断进取。现在我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由于工作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还留在岗位上，发挥余热。我已将新疆当作第二故乡，愿把毕生的精力献给边疆卫生事业，为少数民族服务一辈子。同时也祝愿故乡人民生活更加美满。

扎根海岛，潜心医道

海军东海舰队第413医院副主任医师 徐顺土

我是仙居县城关镇石壁村人，出生于1938年1月。1955年入团，1960年入党，1964年毕业于温州医学院。1985年12月被批准为副主任医师，1988年9月1日经中央军委主席批准授予专业技术上校军衔，副师级，专业技术7级。现为413医院党委委员、放射理疗科主任、党支部书记。

解放前，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未能按时上学，家乡解放后，1950年我才有机会入学念书。仅化三年时间读完小学课程，于1953年7月毕业于仙居县城关第二中心小学，同年考入玉环县中学，1954年9月转入仙居中学读书，1959年7月高中毕业。

在仙中读书期间，我爱好体育运动，曾多次参加县、地运动会比赛，为校创了“五项全能”纪录。在学校里，我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多次被校评为“三好”学生。

在中学念书时，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我所在村里由于缺文化，无人记帐，我利用晚上时间主动义务担任村里的会计工作达四五年之久，受到群众的好评。

为落实毛主席关于全民皆兵的指示，1958年仙中组织民兵训练，我积极参加实弹射击，並以“三红心”获全校第一。同年底，参加了浙江省民兵训练检阅大会，由我们仙居县四人组成的代表队，在政治、军事、战术三项考核中，

成绩优秀，名列原温州专区第一。

1959年高中毕业前夕，祖国对应届高中毕业生进行“选飞”（飞行员）体检。全县就我一人初检合格，当时正值高考，我服从组织需要，前往专区复检，而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后因身体原因未能选中，此后组织决定保送我上大学，但为时已晚，因全国省级以上重点大学录取完毕，我只能在剩下的两所专科学校中选择了温州医学院。在大学期间，先后担任过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参加了学院组织的下乡助民劳动、除害灭病等工作，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64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东海舰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地方院校入伍者到基层锻炼一年的规定，我到了福建鼎沙堍独立高炮八营二连。在连长的重视和支持下，我积极发动全连同志大搞卫生，迅速改变了全连的卫生面貌，使连队由后进跃居为全营卫生先进单位。在此期间，因在卫生防病工作中成绩显著，被荣记三等功。

1965年8月结束了连队生活，被分配到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第413医院，从事临床内科工作3年。后因工作需要，于1968年调放射科工作。1971——1972年在上海华山医院放射科进修1年，回单位后，仿照进口设备，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制作了脑血管造影、气脑造影、颈椎空气造影等活动能拍片操作架，积极创造条件，于1973年顺利地开展了颅脑神经放射检查、诊断工作，为临床神经内、外科诊断及治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项工作，当时在海军同类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1978年，我在业务考核中成绩优秀，获舰队后勤部一等奖。1983年9月被提为放射科副主任，1984年

8月又被提为主任。在此期间，我充分调动科室人员的积极性，圆满完成医疗任务，放射科被基地评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我平时重视科室人员的知识更新，狠抓专业技术训练，1985年放射科获基后“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同年，我被评为“东海舰队优秀科技干部”。1986年底至1987年初，积极组织並亲自参加安装一台价值24万元的日本岛津产500毫安大型X线诊断机，为国家节约近万元的安装费，並能及时发挥机器作用，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也为此受到嘉奖。我们平时重视机器的使用、保养、维修工作，历年来为国家节约修理费5万余元，确保机器处于良好运转状态。1989年被海军后勤部评为“海军医疗设备管理工作先进科室”。1989年底，开展了肿瘤的介入放射诊断、治疗工作，为临床晚期癌症患者延缓寿命带来福音。

自1981年以来，我撰写论文和译文20余篇。其中在《中华放射杂志》等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的有5篇；在全国放射学术会议上交流的有3篇；在省、地（市）级刊物上发表或交流的9篇。其中被评为舟山市科技优秀论文三等奖的1篇。

因安心海岛工作，为海军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90年3月我被授予三等功，同时被东海舰队评为“优秀科技干部。”

艰难求学 献身广播电视

台州地区广播电视局高级工程师 朱寿亮

1936年4月8日我出生于仙居县原朱溪区朱家岸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听父亲讲，我刚满周岁时，不幸家中失了火，烧光房屋和家产，迫于生活，父母离开原籍，迁居到双庙乡车路头村亲友处谋生。

车路头村是一个不上百户的小山村，当时无小学，读点书真不容易，要步行5华里路去上王小学求学，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遇上下雨下雪天，无雨具。有时穿木屐拖上学。我九岁时，不幸母亲病故。从此失学，父子二人相依为命。那时，外祖母怕我不能长大成人，常在我母亲坟前啼哭。受生活所迫，在亲友的劝导下，父亲带我到继母家落户，我继母也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在我父亲的主张下，省吃俭用，继续供我上完小学。

1951年我小学毕业。在亲友的帮助下，约了几个同学去投考仙居初级中学。当时，5个同学在城关东门街租了一间屋，三餐自烧。往往早上烧好稀粥，连吃三餐。每逢周六回家取粮食，星期日下午担柴担菜返回学校。有时，星期天还要去北山担柴。初中三年学习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但我学习刻苦，成绩一直优异。

1954年我考入台州中学。入学注册需缴费12万元（即现在12元），因钱不够未注册，又失学回家。村干部到我家动员我说“目前你家中那么困难，只有父亲一个劳动

力，即使将来你能做官，现在也无法供你去上学。”我流着泪，为自己失学伤透心。时隔一个多月，台州中学发信到上王乡政府，由乡长转告我学校向工农开门方针，动员我再去上学。我父亲、继母在党的教育方针感召下卖了粮食、酒壶等，才凑足12万元学费。开学一个多月后，当我再次踏进台州中学大门时，心情很激动，至今还难以忘却。

高中阶段，助学金有限，我的经济仍相当困难。和初中时一样自己烧饭，从仙居带去的玉米粉，在台中食堂蒸饭，往往上清下澄。日常零用钱更困难，买牙膏牙刷，甚至寄信都无钱。我向大人表示：只要供给我口粮，衣服穿破点不要紧。后来终于挺过来了。

1957年高中毕业，多数人不能继续深造，由于我高中三年学习刻苦，成绩不错，被浙江大学电机系录取。

上大学，对我来说真是做梦一样。一个农村的孩子，个子矮小，穿着农村家织布缝制的对钮中式服装去浙大。在大学，我享受伙食甲级补助、生活甲级补助。勤工俭学还给我解决了穿衣问题。经济上负担减轻了，就更加专心学习。在校时我担任过团小组长，团支部副书记、班长等职务。

1962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电影电视部前身）。我工作很勤奋，积极参加了中广局29（甲）、29（乙）、6307工程，北京天安门机要工程，首都体育馆工程等建设，还投身于支援青海省台建设、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音馆和前线台731、732、734、735等工程建设。为填补我国调频广播空白，1970年我参加10千瓦调频广播发射机引进、研制、设计和生产，并负责研制成随机测量仪器，解决调频发射生产中指标测试问题。

在北京中广局工作期间，在有丰富工作经验，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留学生、老专家、高级工程师们的指导帮助下，我业务上成长较快，学到许许多多宝贵的知识。

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1973年底，我调回台州地区广播转播台工作。地县级中小功率中波台，由于经费限制，买不起贵重射频电桥仪器，因此我设计了“行波系数测量仪”，我台八座中波铁塔完成了调试任务。还为兄弟台提供仪器，解决中小功率中波天线调试问题。为了台州人民早日看到电视，我最早参加括苍山电视台定点测试、扩初设计、安装调试工作。此外受仙居广播局之托，还参加了仙居中波台定点测试、扩初设计，为家乡人民做了一点微薄工作。

大学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在广播战线上工作了30多年，我深感自己做的工作太少。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也应归功于党对我的培养。1985年后，我连续二届担任台州地区电子学会理事长、省电子学会三届四届理事。尽管能力有限，但我愿为振兴台州和家乡的经济，发展我区电子科技事业贡献一切力量。

做大自然之子

高级工艺美术师 崔沧日

1938年农历9月14日，我出生在仙居县原白塔乡下崔村上宅一个农民家庭，父赐名昌日，后以沧日行，自号括苍山人。

我家境清寒，9岁时，家母割下衣襟缝制书包，送我到下崔祠堂去读书。1953年考入羊草山中学（即横溪中学）。我家离横溪30里。那时学校用膳是自带粮食蒸饭吃的。我每隔两个星期回家挑一次粮食。米很少，多数是玉米粉和毛芋。幸好外婆家在白泉村，有时路过她家时，再讨些细的玉米粉和菜头条等用瓦罐蒸食。下崔这个地方是一块较为开阔的小平原，但土地贫瘠，种不起作物。解放前仙居流传一句俗话叫做“有因消不（不要嫁给）下崔垵，六月天落豆坛，沙罐粥烫肚肠，拗水拗断魂”。百姓生活很苦。我因家庭经济拮据，中途休学在家务农，四年时间才读完初中课程。1957年暑期考入仙居中学。高中也只读了半年，因叔父、祖父、祖母都相继去世，父亲体质不好，无法读完高中，只好办理肄业手续，回家种地、砍柴、放牛。追忆往昔，曾作一诗：“曾伐岩前竹，又栽溪后茶；骑牛初试马，登耙学驱车。”

家乡虽穷，但山川灵秀，就下崔而言，背山面水，风景甚美。诸如圳口“鹅冠头”，岩前山、鲫鱼坑，寺前“水帘洞”景星岩、北面的“龙头山”永安溪等都是天赋的具有诗

情画意的好景观。我从小受到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熏陶，逐渐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不知不觉间与山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几番游历了仙居八景，也描绘她的秀丽姿容，在贫寒的家境中自得其乐。仙居中学有一位语文教师蒋志启先生，他有一手好画，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作画道理，他对我也比较赏识，是我走向画坛的启蒙老师。1958年，浙江美术学院招生，一些热心的老师和同学劝我赴考，父母见我从小喜欢涂抹，并不强烈反对，我犹豫再三才赴临海应试，不想一举得中，从此定下我一生所走的事业道路。父母很高兴，乡邻也为我高兴，说我是解放后下崔第一个大学生。

浙江美院是一所著名的高等艺术学府，以前，学生多数是名门子弟，招生极少。这一年是向工农兵开门，才招收了一些农村学生。我被录取在中国画系，选修山水画科专业。我们班共十七人，有三分之一是农村来的。我常年穿着仙居土布做的衣服，城市同学还以为是风雅呢！我靠国家助学金读完本科学业。教我的老师有潘天寿、朱恒有、顾坤伯、陆俨少先生，主要是陆俨少先生。1963年毕业时正逢“小四清”运动，我在萧山西兴和城北参加一年之久的社教工作队。由于得了重症胃下垂疾病而提早分配。1964年10月由省教育厅分配我到青田县工作。在青田，我当过工艺美术公司经理、二轻局副局长、科委副主任等职。在艺术上，我有所追求，案头笔墨不干，数十年作画不辍。工作之余，就是作画做诗二件事。我的画多次在省内外展出，发表作品也较多。代表作《佳秋图》、《漓江春》分别发表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1988年出版的中国绘画研究季刊《朵云》上，并作了生平介绍。《浙江侨声报》、《广州日报》、《书与画》、《中国书画报》都有我的作品发表。国内十

几家书画收藏单位，如浙江展览馆、齐齐哈尔书画院、安徽颍洲西湖碑林、金鳌阁等收藏了我的作品。青田是侨乡，许多华侨慕名索画，作品流传到西德、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较多，也有不少画作被港、台、新加坡、日本书画爱好者购买。我的传略和作品被编入黄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书画家大辞典》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我喜作格律诗，有数十首发表在《浙江诗词》《当代诗人作品选》和《万首当代绝句》等书中。我的诗多描写自然风光和田园风物，借此抄录数首以请教乡里同好（附后）。目前我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浙江省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浙江省民间美术研究会会员、浙江省诗词学会会员、丽水地区文联委员、丽水地区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外艺术家联谊会会员、青田县文联主席、太鹤书画院院长。我1956年加入共青团，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经浙江省技术职称高级评委会评定为高级工艺美术师。

我非常思念故乡，当我偶而回籍省亲时，看到仙居工、农业发展之快，桑梓面貌变化之大，感到无限高兴。下崔垵通过改造，不再是穷乡僻壤了。前王水库灌溉着片片良田，旱涝保收；宽阔的公路四通八达，一个昔日贫穷如洗的村庄，现在高楼四起，和白塔镇连在一起，已变成车水马龙，繁华的小世界了。下崔人民勤劳俭朴、米面（米粉干）生意做遍全国，万元户也不算稀奇了。这是三中全会带来的好政策，改革开放好处在我家乡的具体体现。

仙居——生我育我的母亲，我热爱您，想念您，祝福您！

附诗：

油 茶

素花碧叶满山涯，硕果珠连尽物华。
但见千家夸色味，谁怜榨取泪如麻。

白 泉 村 外

春风捋柳暖，流水绕树迟。
芳草青牛醉，牧童去不知。

秋 韵

素花明绿叶，朱果耀高林。
薄雾羞遮面，秋山若美人。

8
K295.52624

144

封面

设计

王国振

题字

吴正方

工本费 2.50 元

仙居印刷厂印刷

K2